

جوڭگۇنىڭ

خۇدەئەم

جوڭگۇنىڭ چىڭ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

خۇدەئەمەنەسى

خۇدەئەمەنەسى  
خۇدەئەمەنەسى  
خۇدەئەمەنەسى  
خۇدەئەمەنەسى

شى چىڭ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

231

# 目 錄

## 專論

細說滿語動詞詞尾 <b>ㄉ</b> (-fi) .....	戈思明	
	潘玲娟	1

## 研究札記

《大唐西域記》所載西域和親與蠶絲西傳 .....	劉學銚	53
近年出版的涉藏史料：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 .....	陳又新	73
檔案選編（十五）概述		
書評：劉學銚著《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	張華克	91

## 譯文

歐亞北部民族葬禮中的斂面、截耳與剪髮 .....	江上波夫著	
	朱振宏譯	105

## 活動記述

新書介紹（一）：《世界史上的中亞：跨越滿洲森林至黑海周緣的四萬年史》		
譯者導讀：把中亞找回來：重新認識世界史上的中亞.....	蔡偉傑	113
新書介紹（二）：《蒙古公爵拉爾森（藍理訓）：一位瑞典傳教士的回憶》		
譯者導言：本書的學術價值及其各種譯本流變情況 .....	張建軍	123
序 .....	忒莫勒	131
稿約 .....		134



# 細說滿語動詞詞尾 **ㄉ** (-fi)

戈思明

國科會專題審查人

伊犁師範學院錫伯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潘玲娟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副教授

## 摘要

-fi，歷經蛻變的滿語動詞詞尾，其多變的字形與在句中的各種角色，使它成為獨特又有魅力的語言文字現象。不僅如此，它在建州女真入關前書寫的滿洲開國史料裡隨處可見，通古斯語系其他語種也有它的影子，它還可以上溯至滿語的祖語女真語。本文針對坊間出版的一些中外文滿語語法書和字典裡有關 -fi 的闡釋，提出筆者個人的分析說明。

**關鍵詞：**順序副動詞 -fi、滿文原檔、薩滿神歌、錫伯語文

## 前言

-fi，滿語 10 種「副動詞」詞尾<sup>1</sup>之一，但它出現的頻率高<sup>2</sup>，功能最多

匿名審稿人所提建言，筆者誠心受教且獲益良多，特此鳴謝。文責，概由筆者承擔。

<sup>1</sup> 另外 9 種副動詞詞尾分別是：-me／-ci／-hai、-hei、-hoi／-tala、-tele、-tolo／-tai、-tei／-mpi／-ngala、-ngele／-lame／-meliyan、-shūn、-shun。

<sup>2</sup> 參閻清・劉順編著，日本竹越孝、陳曉校注，《滿漢成語對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這本刊行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迄今年代最早、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滿漢對照滿語教材之一，書中共 467 段成語（或稱古訓），卷 1 〈強亮（fulu）〉項下僅〈去得的（yebkesi）〉這 1 條，含動詞詞尾 -fi 的單詞就有約 50 個之多（部分重覆），見重排本，頁 18-37。

樣，欲掌握其本質，須從歷時語言學（diachronic linguistics）下手。

-fi，有哪些語法功能，所傳達的語意，在句中的位置，與其他動詞的關係，凡此種種見諸雍正庚戌年（1730）問世的《清文啟蒙》，該書卷3《清文助語虛字》指出，「fi 上半句的『了』字……如云 buda jefi hūdun jio（吃了飯快來）……」。<sup>3</sup>一個半世紀後，《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也說：「fi 字本是『未然了，中間串語過文多，如云 boode marifi, buda jefi, tacikūde jifi, saikan bengsen be tacikini（回了家，吃了飯，上了學，好生學本事……）』」<sup>4</sup>

多年來，眾多中外學者出版的滿語語法書或字典都提到詞尾 -fi 的附加意義，單篇專文比較少見<sup>5</sup>。他們依靠清人研究基礎，以現代語法知識對 -fi 重作解釋。清光緒十八年（1892）刊行的全球第一本英文滿文文法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把動詞詞尾 -fi 稱作過去動名詞（past gerund）<sup>6</sup>。《滿語語法（2011年版）》給動詞詞尾 -fi 下的定義：「……表示動作或行為依次發生，在時間上有先後的差別……」<sup>7</sup>他如捷克 Veronika Zikmundová、俄羅斯 Liliya Gorelova、美國 Gertraude Roth Li、日本河內良弘，等等，都曾論述過 -fi。<sup>8</sup>

<sup>3</sup> 清·舞格編著，日本竹越孝，陳曉校注，《清文蒙》（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見卷2影印本，頁925。

<sup>4</sup> 清·萬福編著，王曉娜等人校注，《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卷2，頁443-444。

<sup>5</sup> 中國大陸學界最近10餘年出過兩篇專文：趙令志撰，〈滿語副動詞 fi 與 pi 淺析〉，收入《滿語研究》2006年1期，頁33-35；鄂雅娜、杜燕燕撰，〈滿語副動形式探析〉，收入《滿族研究》2023年1期，頁77-82。

<sup>6</sup> Von Möllendorff, P. G.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1892. 此書節錄清代滿漢雙語教材《一百條》1小節作為閱讀文選（頁15-50，占該書篇幅），其中動詞詞尾 -fi 的單詞達24個之多。《一百條》是後世諸多滿漢蒙合璧文獻及西洋漢語教材的藍本。參閱：清·智信、博赫編著，日本竹越孝，陳曉校注，《一百條·清語易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見〈導讀〉，頁5-7。

<sup>7</sup> 季永海編著，《滿語語法（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頁133。

<sup>8</sup> 1. Veronika Zikmundová, *Spoken Sibe: Morphology of the Inflected Parts of Speech* (Prague: Karolinum Press. 2013), p. 174; 2. Liliya Gorelova, *Manchu Grammar* (Brill: Leiden; Boston; Köln, 2002), p. 123; 3. Gertraude Roth Li, *Manchu: A Textbook for Reading Documen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p. 69, 362; 4. 河內良弘等人編著，《滿洲語文語入門》（日本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頁85、215。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捷克學者 Zikmundová 用英文寫的介紹錫伯語口語語法書，解釋完成式副動詞 -f (ie) / -f (ə) 說道：「它是滿語書面語形式，使用者僅限於操滿語的耆老。它常在歌詞中出現。其意與完成式副動詞 -maq 有相同之處，但更常用於一連串的時間。」

然而大量的滿文檔案史料與滿語文學作品卻顯示，-fi，不光是動詞詞尾附加成分，它另有 3 種特殊用途：1. 斷句，等同逗號；2. 在薩滿神歌等說唱文學作品裡，-fi 富音樂性；3. 在其他類別的文學作品裡，-fi 作押韻用。文內皆以實例佐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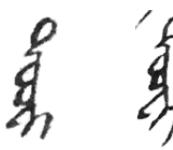
### 新老滿文合觀 -fi 作斷句及其字形、讀音、語法等演變史

#### 一、字形

為揭開滿語動詞詞尾 -fi 在文章中起斷句之效的那一層厚重的面紗，觀其書寫方式是一個有用的途徑。筆者從臺北故宮博物院 2006 年版《滿文原檔》第 1 冊、第 6 冊，挑出 unggifi（寄發、差遣）、jafafi（抓、掌握）、tucibufi（出、使出）、gaifi（取、娶）、ujifi（養、休養）、jabufi（回答、供稱）、doofi（渡河、度過）、genefi（去）、ofi（成為、因為）、gidafi（壓、擊敗）、sindafi（放、設置）、bahafi（得、獲得）、niyakūrafi（跪、跪拜）、bifi（在、有）、jifi（來）、wafi（殺、宰），共 16 個常用字，再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單位出版的《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找出對應字，彼此交相對照，細觀初創的老滿文進展到新滿文，老滿文新滿文並存，最終文字規範定型，其間大致的變動情形，見以下簡表。

滿語動詞詞尾 -fi 在滿文原始檔案裡的書寫方式簡表

《滿文原檔》冊 1	《滿文原檔》冊 6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

《滿文原檔》冊 1	《滿文原檔》冊 6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
		
		
		
		持續搜尋中。 <sup>9</sup>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共 283 冊，每冊 400 餘頁。)
		
		
		

<sup>9</sup> 筆者為找尋《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裡的 *jabufi*（動詞原形為 *jabumbi*，回答、供稱之意），閱讀一篇又一篇罪犯受審案件及供單，截至本文停工前，只見 *jabun*、*jabu*、*jabuha*、*jabumbi*、*jaburengge*、*jabumbime* 等字，就是找不到 *jabufi*，研究工作面臨的挑戰此其一。

《滿文原檔》冊 1	《滿文原檔》冊 6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ئ

資料來源：《滿文原檔》冊 1、冊 6 與《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

《滿文原檔》第 1 冊從萬曆三十五年（1607）起記事，第 6 冊從天聰元年（1627）起記事，這 21 年跨越努爾哈齊、皇太極兩代統治期，後金的史官為滿文字形結構不斷的嘗試改進。《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所載官方史料起於雍正八年（1730），止於宣統三年（1911），滿文已是規範語言<sup>10</sup>。這 3 百餘年間滿文字形的變化，上表自然無法一一顯示，若僅鎖定滿語動詞詞尾 -fi，表內的 16 個單詞還是可以幫我們掌握其變化梗概，譬如字左右兩側有無圈點、同 1 字 2 寫法並存同 1 冊、1 斜槓貫穿字中、某些斜槓往下延伸幾乎包覆下面的字，1 個小黑點常尾隨在 -fi 之下（寫者慣用的類似逗號的一種符號）。

以下是《滿文原檔》冊 1 和冊 6 第 3 頁部分內容，由於滿洲開國檔案識讀不易，筆者參閱相關出版品及其所使用的轉寫方式<sup>11</sup>，本文以羅馬字將摘錄內容轉為新滿文，但詞尾 -fi 若為老滿文寫法 -bi，則不轉換為 -fi。標點符號：以近乎原樣呈現。

《滿文原檔》，冊 1、頁 3：

<sup>10</sup> 少數個別未規範或自創或字典查找不到的滿文單詞，可參閱季永海撰，〈清代新疆滿文檔案翻譯拾零〉，收入《滿語研究》2021 年 2 期，頁 17-21。

<sup>11</sup> 1.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 I · 太祖 1》、《滿文老檔 I V · 太宗 1》（日本東京：東洋文庫，1955、1961）；2. 廣祿等人譯註，《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 冊 1》（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9 年）；3. 張葳譯註，《舊滿洲檔譯註－清太宗朝（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66 年）；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編譯，《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5. 莊吉發譯註，《滿文原檔〈滿文原檔〉選讀譯注太祖朝（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109 年）。編號 1、3、4、5 的出版品皆以羅馬字將滿洲開國檔案轉為新滿文，編號 2 譯註者在〈凡例〉中表示為呈現檔案內老滿文字形特色，所用的轉寫法稱作「老滿文羅馬注音法」。

ujihe ♫ muse tuttu ujibi ulai gurun de unggibi ejen obuha  
niyalma kai ♫ ere bujantai musei galaci tucike niyalmakai ♫  
jalan goidahakūbi ♫ beye halahakūbi ♫ ere cooha be geren  
seme ume gūnire ♫ muse de abkai gosime buhe amba horon

bi ♫ jai ama han i gelecuke amba gebu bi ♫ ere cooha be muse  
absi akū gidambi seme henuhe manggi ♫ geren coohai niyalma  
gemu urgunjeme afaki saciki seme jabubi tere bira be ♫ dooha  
doobi sure han i juwe jui sunjata tanggū cooha be gaibi ♫ alin  
i wesihun juwe jurgan i afame genehe ♫ deo beile sunja tanggū  
cooha be gaibi alin i dade ilihai tutaha ♫ tuttu yasa neihekū  
niyahan i gese juwe buya juse sunjata tanggū cooha be gaibi alini  
wesihun afame genebi tere dain be gidabi sacime gamarade ♫  
deo beile siden ..... ♫<sup>12</sup>

（文首、文中缺漏）

養……乃經我如此豢養遣歸，主烏拉國之人。此布占泰乃我手中放出之人也！時隔未久，其人依舊，勿慮其兵眾多，我有天賜之弘威，又有父汗之大名，我等必能擊敗其兵！”言畢，眾軍士皆喜，呐以攻殺之聲，渡河而去。聰睿汗之二子，各領兵五百，分二路衝上山，弟貝勒領兵五百，留於山下，其猶如尚未睡眼小犬之兩幼子，各領兵五百衝上山頂。破陣追殺敵兵時，弟貝勒

.....<sup>13</sup>

由羅馬字轉寫的那段內容挑出動詞詞尾 -bi 羅列如下：

ujibi (養)、unggibi (派遣)、jabubi (答)、doobi (渡過)、gaibi (率領)、genebi (去)、gidabi (擊敗、破敵)。

何以這些動詞詞尾都是 -bi 而非 -fi ?

為解答這個問題，必先了解滿文的創製。明萬曆二十七年 (1599)，清太祖努爾哈齊命額爾德尼、噶蓋二人以老蒙文字母拼女真語音，此即「無圈點字」或「老滿文」。天聰六年 (1632)，清太宗皇太極命達海完善初創的滿文，「有圈點字」或「新滿文」於焉誕生。

<sup>12</sup>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授權沈香亭企業社出版，2006)，冊1、頁3。

<sup>13</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譯注，《滿文老檔 上》冊1 (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2。

現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40 冊建州女真開國史料，「……就書寫的字體而言，以無圈點老滿文書寫的冊數較多，例如第一、二、三、四、五、六、九……第七冊……部分老滿文帶有圈點；第八冊，使用無圈點老滿文，內含部分蒙文；第十冊，字形近似新滿文；第十四冊，字形不一，內含無圈點老滿文，也有過渡期滿文，以及加圈點新滿文……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等冊，都是加圈點新滿文……」<sup>14</sup>

以上所列動詞詞尾 -bi，以字形而言，就是老滿文。前揭《滿文原檔》，冊 1、頁 3 內，除了 -fi 以 -bi 表示之外，尚有母音字母 u、ū、o 混用、子音字母 ow- 表示 w-，學者曾有所探討<sup>15</sup>，此不贅述。

「……無圈點滿文記錄的《滿文老檔》以及碑刻中，有大量的以 -bi 結尾的動詞，這些動詞所代表的時態意義不盡是現在時的終止形態，有些是相當於有圈點滿文中的提前副動詞詞綴 -fi，在有圈點滿文中把無圈點滿文的 -bi 詞綴都改為 -fi。」<sup>16</sup>引文提及的《滿文老檔》指的就是那 40 冊滿洲開國史料。

此段引文未說明滿文由舊變新過渡期文字變化的其他情形，例如上表內所示 -bi 右下角加上小圓圈以及 b 變 f，以斜槓穿過字中（見上表第 10 個排中間的滿文 gidafi），等等。在這個從 -bi 到 -fi 的過渡期，後金的菁英分子用近代蒙文字母 b 拼寫滿語輔音 f，或仿蒙文 -bi 旁加圈，新滿文則改用輔音字母 w 之後加橫線書寫音節 -fi。<sup>1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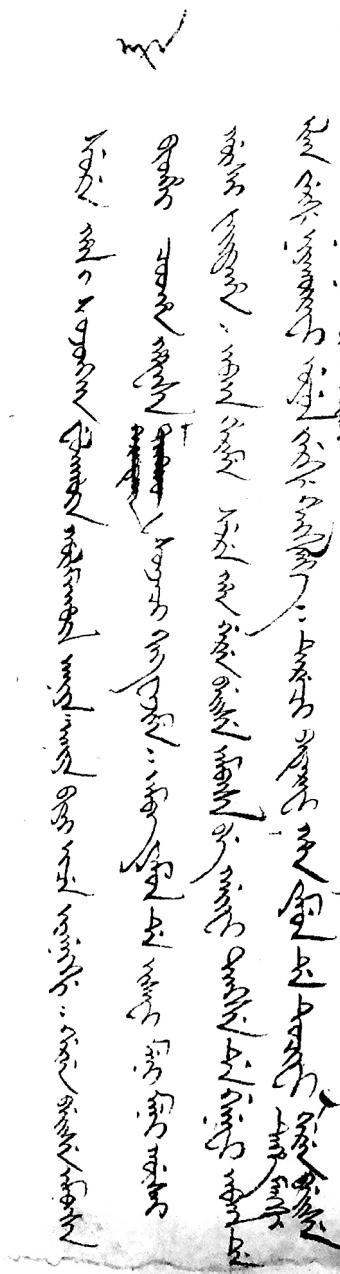
<sup>14</sup> 莊吉發撰，〈文獻足徵－《滿文原檔》的由來及其史料價值〉，見《滿文原檔》冊 10 書後附錄，頁 41。

<sup>15</sup> 參閱：1. 長山撰，〈《滿文原檔》語言文字價值研究〉，收入《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 年第 8 期，頁 85；2. 馬金柱撰，〈滿文創制問題再探〉，收入《滿語研究》，2021 年 2 期，頁 9；3. 廣祿等人譯註，《清太祖朝老滿文原檔 冊 1》，〈凡例〉頁 21-22。此〈凡例〉細述新、老滿文字形異同及演變情形，給後代學者提供了莫大的幫助與發。此書兩位譯註者，尤其是李學智，對滿學的推動功不唐捐。

<sup>16</sup> 齊木德道爾吉著，《〈女真譯語〉音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頁 56。

<sup>17</sup> 長山撰，〈《滿文原檔》語言文字價值研究〉，收入故宮博物院院刊 2023 年第 8 期，頁 82-91，引文出自該文頁 85。

《滿文原檔》，冊 6、頁 3：



sure han i sucungga fulahūn gūlmahūn aniya 二字 aniya biyai ice  
inenggi 二字 geren beise ambasa bithei cooha hafasa sunjaci ging  
wajime 二字 amba yamun de isafi meni meni gūsai gūsai faidaha 二字  
abka hereme sure han geren beise ambasa be gaifi tangse de

genefi abka de ilan jergi niyakūrafi uyun jergi hengkilehe ♫  
tereci bederefi han yamun de tucifi……<sup>18</sup>

淑勒汗元年丁卯（1627）正月初一日，諸王、大臣、文武官員，於五更畢，在大衙門集合，各旗列隊，天明時，淑勒汗率諸王、大臣前往堂子，向天三跪九叩而還，汗出衙門……

從羅馬字轉寫的此段內容挑出動詞詞尾 -fi 或 -bi 如下：

isafi（集合）、gaifi（率領）、genefi（去）、niyakūrafi（跪）、bederefi（回、歸）、tucifi（出）。

這些動詞詞尾 -fi 是新滿文，而 -bi 是老滿文，說明當時老滿文與新滿文並存的情形。將上方《滿文原檔》冊 6、頁 3 與冊 1、頁 3 兩張圖片跟「滿語動詞詞尾 -fi 在滿文原始檔案裡的書寫方式簡表」擺在一起看，即可明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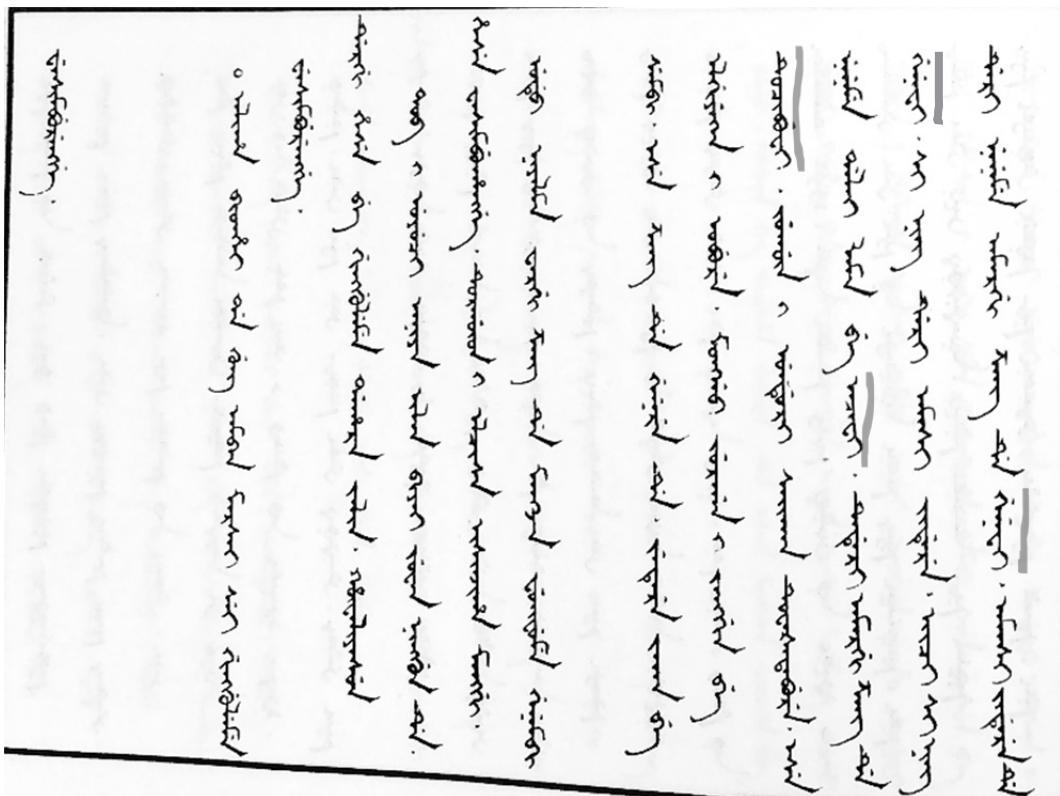
自《滿文原檔》冊 1、冊 6 挑出的 10 幾個詞尾 -fi 的滿語動詞，在《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裡，不僅字左右兩側添加圈與點，最特別的地方是一根斜槓穿過字中由左側出並往下延伸，甚至包覆下面的字。軍機處抄錄奏摺的人何以如此書寫這個 -f？

下面兩份錄副奏摺一工整一草書，但都提供了答案。為免文章冗長，羅馬字轉寫與漢譯均從略。

軍機大臣馬爾賽於雍正九年（1731）三月二十一日為土爾扈特使臣赴藏熬茶事之錄副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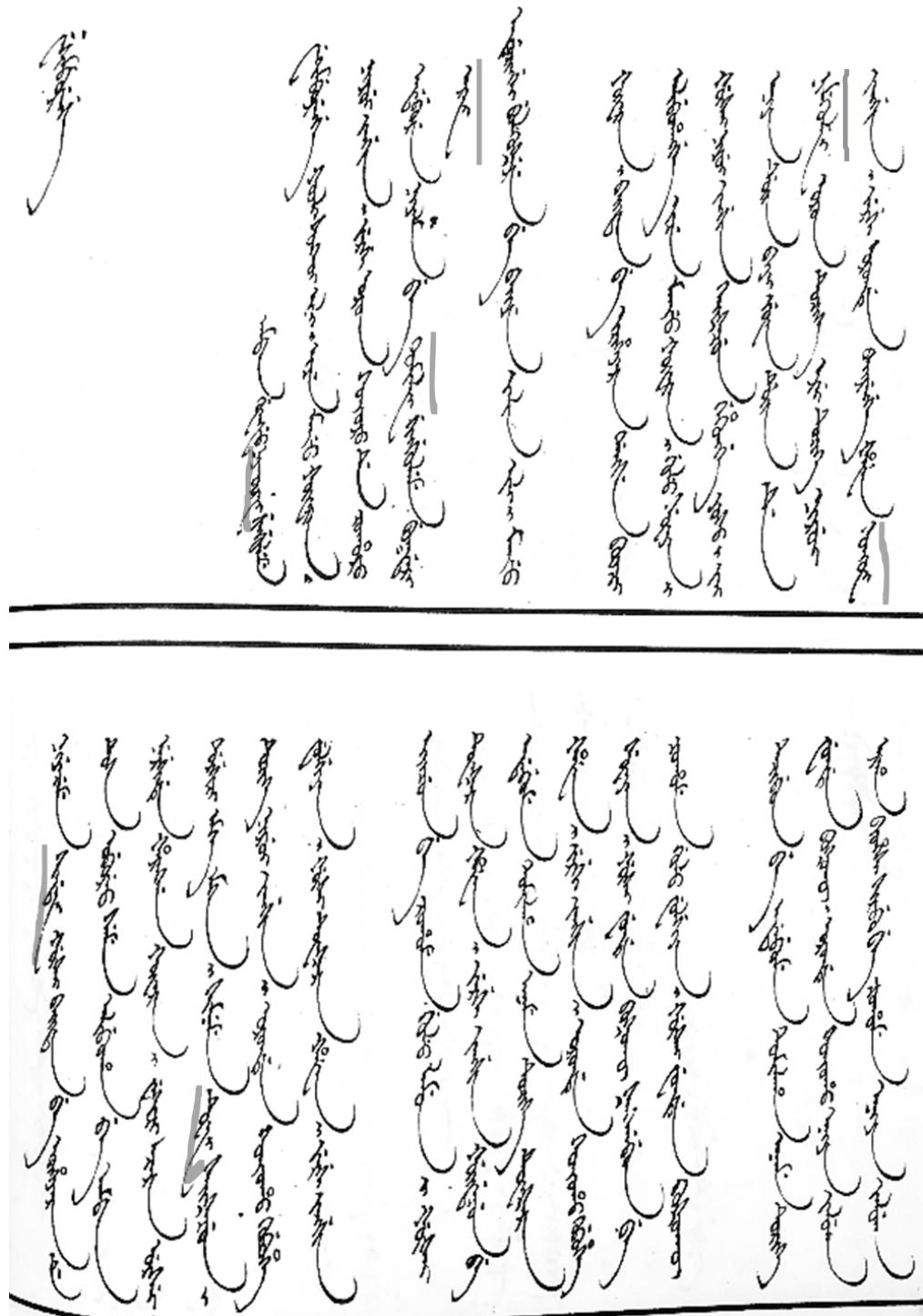
<sup>18</sup> 馮明珠主編，《滿文原檔》，冊 6、頁 3。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1、頁 38：



資料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著，《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1，頁 38 下半頁。

署理伊犁將軍廣福於宣統二年（1910）七月十六日為補放伊犁新滿洲營佐領等員缺之錄副奏摺：



資料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單位編著，《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283，頁 405。

## 二、斷句

軍機處抄錄奏摺的人員以誇張的筆法書寫 *f*，與滿文檔案標點符號的稀少有關，滿文檔案標點符號的稀少又與滿語動詞詞尾豐富多變有關，多變的詞尾結構確保句意正確無誤的傳遞出去。「……滿文的標點符號不僅貧乏，而且與句子的意思、結構、語氣沒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在翻閱清朝滿文檔案時，發現道光十年七月十八日，兵部尚書李鴻賓上奏給皇上的題本中，通篇沒有一個滿文標點符號……」<sup>19</sup>

這固然是滿語書寫體系的特色，但奏文長，標點少，易生視覺疲勞，甚至思緒短路，以致奏文過於囉嗦或數字計算有誤，書寫者卻渾不自知。僅舉 9 事例如下：

理藩院左侍郎玉保奏補報留守遊牧遺漏台吉姓名、定西將軍永常奏辦理出征官兵口糧屢出錯、參贊大臣額琳沁多爾濟奏錯辦軍糧以致兵丁缺糧、定北將軍班弟奏輝特部德濟特應隨二隊朝覲竟列入留遊牧名單、定北將軍班弟奏三等侍衛阿克伯羅特名字誤置改正、參贊大臣策楞奏漏報瑪常送信情形、軍機處奏令葉爾羌辦事大臣新柱具摺應簡要、佐領散齊克造冊錯誤交部察議、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慶桂審辦哈薩克失馬案欠妥。<sup>20</sup> 內容相近且重複出現之錄附奏摺不列入以上名單。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283 冊中，失察犯錯之事層出不窮，究其因，都是人為所致。另一方面，滿文檔案缺少標點符號可能也是個中原因。這個論點是筆者目前初步的推斷。

軍機處司員抄錄奏摺時，若能用些巧思，可使文章一目了然，也方便日後查閱，而 *-fi* 就成為絕佳的幫手。試想某位司員，抄錄奏摺運筆寫 *-fi* 往下一直延伸到幾乎包住下面的字，如同伊犁將軍廣福的錄副奏摺內寫 *-fi* 那種誇大的筆法，或者軍機大臣馬爾賽的錄副奏摺內 *-fi* 下面常添加個有逗號功能的小黑點，如此既收醒目之效，也可改善標點符號稀少的問題。

讀者或許質疑：奏摺內有誇大字形的滿語單詞詞尾不只 *-fi*，對！但 *-fi*

<sup>19</sup> 劉景憲等人著，《滿語研究通論》（哈爾濱：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97），頁 527。

<sup>20</sup>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9、頁 180-181；冊 10、頁 439-444；冊 11、頁 9-15；冊 11、頁 400；冊 11、頁 400；冊 14、頁 5-7。前述按冊查找，以下隨機查閱：冊 54、頁 145-146；冊 123、頁 102-105；冊 136、頁 179-182。

結尾的滿語動詞通常有 1 個小黑點尾隨其後，例如伊犁將軍廣福錄副奏摺上半頁右側倒數第 2 行以紅色標示 nimekulefi (患病) 下方的小黑點，上半頁最左側第 3 個字以紅色標示的 niyakūrafi (跪)，本應置於字下的那個小黑點因空間擁塞而改放在字的右側，這些皆非特例，《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裡可找到許多例證。

反觀滿洲開國檔案，完全沒有以上 -fi 為斷句用而衍生出來的那種極度突出的運筆方式，後金的菁英分子面對公文紙面凌亂擁擠與塗塗改改的空間，彼等解決之道只用 : 與 ○ 這兩個符號就有醒目之效：簡言之，: 是逗號與句號兼具，作斷句用，○是「分段號」與「抬頭」兼具。但 : 與 ○ 各有許多形形色色的變體，例如 : 可堆疊變化出 - - - 等多種樣式，○分支出 ⑨ 等形似太陽的多種組合。滿洲開國史料那 40 冊檔案裡的標點符號非如一些滿語語法書所講的那麼單純，非常值得另闢專文討論。至於《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整體而言只有 • 、 : 這兩個標點符號，• 出現的頻率比 : 多得多。

再者，作斷句用的滿語動詞詞尾不只 -fi，並列副動詞 -me 也可斷句，文獻中 -me 4 連用的例子不算稀奇，例如《翻譯聊齋 · 賈兒》……uculeme songome sureme toome…… (歌哭叫罵)<sup>21</sup>。至於 -fi，2 連用頗為常見，通常以第 2 個 -fi 斷句，3 連用也有，如下例，以第 3 個 -fi (hiyabsalafi，夾住) 斷句：

.....an i baita be kemuni taigiyan sade afabufi fempilefi  
hiyabsalafi.....<sup>22</sup>  
 .....平常案件仍令太監加封夾好.....

關於動詞時態 (tense) 的問題，副動詞 -fi 在句中配合主要動詞，主要動詞的時態是什麼，它就是什麼。

-fi 作斷句用，除了從它的形態變化觀察之外，還可以從語法及語意兩方面論述。

<sup>21</sup> 季永海等人編著，《滿語語法》，頁 163-164。

<sup>22</sup> 《百二老人語錄 (emu tanggū orin sakda i gisun sarkiyan)》，reprinted by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 p.70.

### 三、語法

在語法上，詞尾 -fi 被定義為某個行動發生，另一個行動接續發生或幾個行動一個接一個發生，《滿語語法（修訂本）》稱之為「順序副動作……表示動作或行為依次發生，在時間上有先後的差別。動作、行為是否完成，取決於最後一個動詞……最後一個動詞是過去時，那麼 fi 也是過去時；如果最後一個動詞是將來時，fi 只表示動作、行為的順序。」書中例句以羅馬字轉寫如下：

1.usung nure be omifi, ala de tafaha.

武松喝了酒，登上了崗子。

2.boode marifi, buda jefi, tacikūde jifi, saikan bengsen be tacikini.

回了家，吃了飯，上了學，好生學本事。<sup>23</sup>

例句 1 句尾的 tafaha 是動詞 tafambi 的過去式，例句 2 句尾的 tacikini 是動詞 tacimbi 的請願式。

《速成自學滿語基礎講義》說，-fi 表示完成時，詞幹 ara 加 fi 構成完成式動名詞……arafi（已經寫了、寫後）<sup>24</sup>

以上兩本書對於 -fi 的動詞時態說法不一，那只是兩位作者對於動詞時態分類的見解有所不同。

詞尾 -fi 在語意上，有些滿語教材從滿漢或漢滿雙語互譯的角度來說明。如乾隆中期問世的《清語易言》（按：乾隆三十一年刻本）裡有一句話，羅馬字轉寫如下：

fi serengge gisun be sirabume wajire unde i oho sere gūnin.

非衣者乃接話未完了之意。<sup>25</sup>

<sup>23</sup> 季永海編著，《滿語語法（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1），頁 153。

<sup>24</sup> 愛新覺羅瀛生編著，《速成自學滿語基礎講義》（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 71-72、98。

<sup>25</sup> 清·博赫輯錄，《清語易言》，收入全桂花等人主編，《國家圖書館藏 滿漢文合璧古籍珍本叢書》（北京：學苑出版社，2017），冊 25，頁 81。

《克敬之滿蒙漢語教學手冊》，此書用了一些篇幅說明 fi 在句中的角色，擇要如下：

fi，了。例句以羅馬字轉寫如下：

emu aniya manju bithe hūlafi uthai manjurame baganaha（按：baganaha 應係口語，書面語為 baganaha）

念了一年滿洲書就會說滿洲話。

fi，了字乃完畢一事復有一事之串文，若整字與 rakū 等字之下則用 ofi，如云：（例句以羅馬字轉寫如下）

dere sindafi hoošan be sektefi yuwan be obofi behe be suifi fi  
ulebufi hergen arambi

放下棹，鋪下紙，洗了硯，研了墨，餚了筆，寫字

i emgeri safi goidaha, si kemuni alarakū ofi, ainambi  
彼已知之久矣汝尚不告何為<sup>26</sup>

滿語動詞詞尾 -fi 字形的蛻變及其語法、語意三方面結合起來，證明 -fi 作斷句用，-fi 底下經常出現 1 個似標點符號逗號的小黑點，更加凸顯 -fi 的這個功能。

若詞尾都是 -fi 的兩個滿語動詞連用，由哪 1 個 -fi 來斷句？看以下兩例：

《滿文原檔》冊 1，頁 4：

……juwe juse emu minggan cooha be gaibi gidabi……  
二子領兵一千，擊破……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97，頁 361：

……dahūme gisurefi wesimbufi hesei yabubuha be……  
……議覆奏准……

<sup>26</sup> 王慶豐編著，《克敬之滿蒙漢語教學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頁 83、132-133。

（按：「議覆奏准」或「議覆奏准在案」這類公文用語，常見於乾隆朝奏摺，軍機處奉旨議奏。）

由第 1 句句意可知是先領兵再破敵，第 2 句是先議後奏，兩句中兩個行動先後接連發生，因此每句都是第 2 個 -fi 斷句。

ofi，源於動詞 ombi（成為、可以、到……），以其詞幹 o- 加詞尾 -fi 而成。ofi，大多數的中外滿語字典或語法書都解作因為，如《新滿漢大詞典》引用《續編兼漢清文指要》的例句：

jiha akū ofi tuttu udahakū.

因為沒錢就沒有買。<sup>27</sup>

史上第 1 本英文版滿語語法書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論述 ofi，也以英語連接詞 because 釋其意，該書收錄《一百條》部分內容作為滿語閱讀指南，茲節錄 1 句如下：<sup>28</sup>

uttu ofi, emude oci, age be tuwanjiha.

因此，首先來看兄臺。

ofi，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北京宛羽齋書坊刊刻的世上第 1 本滿漢對照詞典《大清全書》給了兩個釋義：「為官為吏之為。為此故之為。因字。」<sup>29</sup> 令人不解的是，後人多採用後者，這很值得商榷，因為 ofi 不必然作因字解。反證如下：

以下兩例出自《滿文原檔》冊 6，頁 45、47，以羅馬字忠於原文轉寫為新滿文，詞尾 -fi 仍保持老滿文寫法 -bi（按：在頁 45 是 ofi，頁 47 裡是 obi），標點符號 : 近乎原樣：

li lama de ungihe bithe : sini bithe be tuwaci fucihi šabi sideni

<sup>27</sup> 胡增益主編，《新滿漢大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頁 597。

<sup>28</sup> P. G. von Möllendorff,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p.17.

<sup>29</sup> 清·沈啟亮輯，《大清全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頁 52。關於康熙朝北京刻印滿文書籍的書坊有哪幾家，見章宏偉撰，〈論清代前期滿文出版傳播的特色〉，收入河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 年第 1 期，頁 80-91。

niyalma ofi :

致李喇嘛函曰，闊爾來函稱，佛家弟子作為居中之人……

muse liodon i bade teki : nikān jusen meni meni gurun obi  
banjiki seme……

……我等可住遼東地方，漢人與女真人各成一國而生……

《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冊 85、頁 217-220：

eici gelu udu aniya ofi šuwe jiha be baitalame hafumbume  
或再過幾年，錢能流通使用……

以上 3 例中出現的 ofi（或 obi），有成為或經過（指時間）之意，與因為無關。

#### 四、滿語動詞詞尾 -fi 的讀音問題

愛新覺羅瀛生表示：「……混音諸音間有著微妙的關係，可從一些側面觀察它。例如……老滿文（無圈點滿文）fa、fe、fo、fu 音的 f 寫 f 字，雖然那時尚未改進文字，常常是 f 和 w 不分的，但總是 f 字。可是一到 fi 音，寫法就極為複雜了：或是將 f 寫成 b 字，或是寫成 b 字加個圈，或是寫成 bi，或是左右對著各勾一筆而寫成像個開口的圓形，只在極少數是寫成 f 字；這個 f 字看來當時並不很通用，或許是後來新創造的尚未被人們習用。這與直接借用蒙古字有密切關係是自不待言的，但滿語固有音聲狀態的 b 與 f 的關係也是不可忽視的，似不可完全歸之於借用蒙古字的緣故。」<sup>30</sup>

b、f，都屬唇音（labial），在此提個問題：建州女真人手寫 -bi、-fi，

<sup>30</sup> 愛新覺羅瀛生著，鄭再帥等人整理，《滿語口語音典》（北京：華藝出版社，2014），頁 235。愛新覺羅瀛生提出的解釋若從音韻學（phonology）的角度說明就更為清楚。b、f，都是唇音（labial），再細分，b 為雙唇爆發音（bilabial plosive），f 為唇齒擦音（labiodental fricative）。唇音轉換是輔音轉換的一種，「音轉即語音的轉化，或語音的流轉……它著眼於詞的音義關係，屬訓詁學範疇。在傳統語言文字學史上，漢代就有了『轉語』、『語之轉』等術語……音轉條例……條例七同系相轉：發音部位相同的一組聲母之間發生流轉。如幫轉為滂、滂轉為並。」參閱：1. 吳澤順著，《漢語音轉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5），頁 51。2. 黃焯著，《古今聲類通轉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 265-271、272-279。

發的是何音？

愛新覺羅瀛生僅表示：「在清太祖努爾哈赤倡議和指導下創製滿文，其書寫的根本原則是怎樣說就怎樣寫。《滿文老檔》是該時期的代表作。終清之世以該時期的語言為滿語規範語，現在稱之為書面語，其實就是當時建州女真的鄉音本語——但語言是活的，其發展不由人力所左右……例如 ojorakū 與 ojirakū 並存……寫 ujen cooha 而讀作 ujin cuoha，等等……從而構成力圖加以規範化的原因之一……」<sup>31</sup> 針對以上提問，他沒答覆，但滿洲開國史料以及滿語的祖語女真語都給了答案，發音只有 1 個：fi。見以下「3 個女真字讀音、語法簡表」。

### 五、滿語動詞詞尾 -fi 與 3 個女真字

分析動詞詞尾 -fi 的來龍去脈，時間還得溯及女真語。《女真語言文字研究》作者金光平、金琮將女真語的「時間助動詞」分為 9 類，含過去分詞，過去分詞「……也就是過去中止形，女真文中有 “**朶**” fi，“**平**” fi 和 “**叟**” bie，“**朶**”、“**平**” 等於滿文 “fi”，“**叟**” 等於滿文 “bi”<sup>32</sup>。“**叟**” 與 “**朶**” 略有

音轉在人類語言中極為普遍。「當代西方語言之間普遍存在輔音互換情況，比如印歐語系中拉丁語族語言的 p 對應於日耳曼語族語言中的 f……根據弗納定律，p 變為 f 之後，由於 f 處於非重讀元音和重讀元音之間，所以會進一步弱化為 v，並最終轉化為 b，所以 b/f/p/v 存在互換關係……」弗納定律，或稱維爾納定律，是指「……丹麥哥本哈根大學教授維爾納（Karl Verner）解決了“格里姆定律”中沒有解決的問題，格里姆的例子裡有很多例外，而維爾納無意中發現那些例外詞在梵語相當的詞裡面重音位置不同，但是到了共同日耳曼語裡就消失了，因此斷定，這些不同乃是古代重音位置不同造成的。維爾納的這個重大發現使得歷史語言學家們認識到，一切演變都是有規律的，如有例外，必有原因，這就是“維爾納定律”」所謂格里姆定律，是指格里姆（Jacob Grimm）於其「1819 年出版的《日耳曼語法》找出了很多語言間的語音對應……現象。“格里姆定律”的循環語音對應證明梵語、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的若干輔音間的對應關係。」參閱：1. 邵光編著，《西方語言轉換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頁 7。2. 李艷著，《歷史比較語言學理論：從同源論到親緣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頁 5-6。以上說明發生在漢藏語系中的漢語與印歐語系裡諸種語言的音轉現象。

<sup>31</sup> 同上，頁 032-033。

<sup>32</sup> 此處原寫作 “pi”，恐係筆誤，應作 bi（擬定音為 bie），以 3 個女真字佐證：dulə-ən-bie（過）、ətu-bie（穿）、gənə-bie（去），見《女真文辭典》，頁 29、151、291。此外，**叟**，金氏擬定音 bie，在以下的書中照用不誤：1.《女真譯語校補和女真字真》，頁 168、182；2.《女真滿漢文通譯》，第二函、卷一，頁 038-039。

區別，“**史**”較“**朱**”語義更重一些。至“**朱**”與“**平**”有何區別，則尚未明瞭。」<sup>33</sup>

3 個女真字的語法及讀音簡表：

女真字	語法	注音漢字	讀音	滿語音	金氏擬定音 <sup>34</sup>
<b>史</b>	過去式詞尾	別	bie	bi	bie
<b>朱</b>	過去式詞尾	非	fei	fi	fi
<b>平</b>	過去式詞尾	非	fei	fi	fi

資料來源：筆者據《女真語言文字研究》，頁 144-145 增減製成。

**史**，滿語音 bi，按《女真文辭典》筆劃部首，屬中部，例如「一立·別」（注音漢字），國際音標 ili-bie，意為「立了」；「溫吉·別」（注音漢字），國際音標 ungi-bie，意為「遣、派遣了」。

**朱**，滿語音 fi，按《女真文辭典》筆劃部首，屬山部，例如「幹·非」（注音漢字），國際音標 o-fi，意為「成為的『為』」。

**平**，滿語音 fi，按《女真文辭典》筆劃部首，屬口部，例如「扎·失·非」（注音漢字），國際音標 dʒa-ʃi-fi，意為「吩咐」。<sup>35</sup>

本地有學者曾言：「……研究老滿文中的 b,f 二音，雖然書寫的字形完全一樣，但是由於老滿文的『讀音』今日已無法知道，實在無法肯定老滿文中那個 b 讀 b，那個 b 讀 f 了……那麼那一個讀 b，那一個讀 f，也只有當時的滿洲人才知道……只是受文字的限制而 b,f 書成一樣而已……」<sup>36</sup> 據

<sup>33</sup> 金光平、金琮著，《女真語言文字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 215-216、238-239。

<sup>34</sup> 《女真語言文字研究》作者在該書〈女真文字的音值〉這一章節裡就女真文四字注音、三字注音、兩字注音、單字注音分別列表說明。「以上所擬之音提供研究者參考，未敢必謂不誤，但可以說“雖不中不遠矣”。」見該書頁 144-145、156。

<sup>35</sup> 以上 3 段參閱：金琮編著，《女真文辭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39、61、67、99。

關於「扎·失·非」，按《女真滿漢文通譯》，相應的滿文是 afabumbi（應更正為 afabufi），意為「吩咐」。<sup>35</sup>《女真譯語校補和女真字典》在「扎·失·非」項下，漢意也改為「吩咐」。<sup>35</sup>與滿文 afabumbi 讀音與字義都更為相近的女真語是「塔法·卜·受」（注音漢字），國際音標作 tafa-bu-sou，意為「交付的『交』，或訂、商議」。<sup>35</sup>至於「扎·失·非」和「塔法·卜·受」是否為女真語同義詞，待考。

<sup>36</sup> 李學智撰輯，《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文友印刷紙業公司，民國 60 年），頁 60-61。

金氏等人研究，此話顯與事實不符。

### 六、動詞詞尾 -fi 與通古斯語相關的動詞詞尾變化

通古斯語系除滿語、錫伯語之外的其他語言裡，有哪些動詞詞尾附加成分具備與 -fi 相同或相近的語法功能？芬蘭學者蘭司鐵（G.J. Ramstedt, 1873-1950）提供了部分答案，雖不是全面性的，但後繼的學者必定從中獲得發。

據他研究，阿爾泰語言除朝鮮語之外，動詞變化都有帶後綴 -ba～-bi 的過去完成時構成：「……滿語 bifi, 果爾特語 bipi “到達以後”…… 滿語 ofi，果爾特語、奧里奇 - 通古斯語 opi “成為…後”……果爾特語 biperi “親自到來…以後，果爾特語 pulsipi; pulsipéri “走了以後（當我、你、他或某人走了以後，當我們、你們、他們、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後），enulupi “成為病人以後，生病以後”（單數），enulupéri（複數）—意思一樣。」果爾特語中，詞尾 -pi（單數；複數形式是 -peri）<sup>37</sup>

果爾迪語（Goldi），或稱那乃語（Nanai），即俄羅斯境內那乃人使用的語言。奧羅奇（Orochi）- 通古斯語，即俄羅斯境內奧羅奇人的語言。<sup>38</sup>

錫伯文錫伯語是滿文滿語的延續與再生。錫伯語「前行副動形式」附加成分是 -f～-fi。前行副動形式所表示的動作和主要動詞所表示的動作一先一後緊接著。例句：

minj bod džif (來), tṣai œmkie!

請到我家來喝茶吧！

錫伯語還有一種「分離副動形式」，它的附加成分是 -maq。分離副動形式所表示的動作是在主要動詞表示的動作之前結束的。例句：

džu nan isxund əlx çanb fœndžimaq (問), gisirəm təxəi.

<sup>37</sup> 芬蘭人蘭司鐵（G.J. Ramstedt）著，陳偉等人譯，《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形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頁 163-164。

<sup>38</sup> 俄羅斯籍美國人鮑培（von Nikolaus Poppe）著，周建奇譯，《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頁 32-33。另參閱：力提甫·托乎提主編，《阿爾泰語言學導論》（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頁 269-272、277-280。

兩人互相問了好（就）坐下談話了。<sup>39</sup>

### 滿語動詞詞尾 -fi 富音樂性—從薩滿到歌手口中吟詠而出

中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屬通古斯語系（Tungusic）的民族有滿洲、錫伯、赫哲、索倫、鄂倫春等，往昔皆信奉薩滿。薩滿信仰歷史悠久，史前時代就已存在。薩滿，巫也，薩滿信眾認為萬物有靈，天地、山川、動植物都被當作崇敬的對象。薩滿據稱能通天，在人、神之間作媒介，應人所託向神靈求助。<sup>40</sup> 所求為何？求福與治病。不論官方或民間，「……薩滿祭神求福，送祟醫病，其方式皆為舞蹈唱歌。」<sup>41</sup> 薩滿歌的歌本即薩滿神本子，「……是一種用九九八十一問的問答體構成的……多以滿文或滿文漢字音譯寫成……」<sup>42</sup> 時間一久，不諳滿語文的薩滿充斥神職行列，結果產生了若干不知所云的漢文神本子。何以致此？《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有一段話：

……若我愛新覺羅姓之祭神，則自大內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辭為重。但昔時司祝之人俱生於本處，幼習國語，凡祭神祭天，背鑑獻神，報祭求福，及以麵豬祭天去祟，祭田苗神，祭馬神，無不斟酌事體，編為吉祥之語，以禱祝之。厥後司祝者國語俱由學而能互相授受，於贊祝之原字原音漸致淆舛，不惟大內分出之王等累世相傳家各異辭，即大內之祭神祭天諸祭贊祝之語，亦有與原字原韻不相融合者……<sup>43</sup>

這部由乾隆帝欽定的套書，書內點到的眾神如年錫神、安春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等等，完全不知所云。下面這段文字出自《滿文原檔》冊

<sup>39</sup> 孫宏開主編，《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修訂本，卷 6（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頁 675。

<sup>40</sup> 戈思明著，《滿文的傳承：新疆錫伯族》（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9），頁 81。

<sup>41</sup> 愛新覺羅瀛生著，《滿語雜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頁 999。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清坤寧宮祭神祭天滿語祭祝神歌〉，不僅有羅馬字轉寫，還附上音樂簡譜，見頁 853-880。

<sup>42</sup> 莊吉發撰，〈薩滿信仰與滿族家譜研究〉，收入氏著，《清史論集》第 3 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7 年），頁 111-112。

<sup>43</sup> 清·允祿等奉敕撰，《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 657，〈上諭〉，頁 619。

10，頁 294，按原文以羅馬字轉成新滿文，標點符號近乎原樣：

### 一、宗教信仰：薩滿祭祀

#### 1. 宮中薩滿

……enduri de : tangse de jiha lakiyara jalinde wecere niyalma  
de tacibuha :

enduri de jiha lakiyara de hendure gisun  
abkai juse<sup>44</sup> : šang si enduri : fe biya be wajihā • ice biya be  
aliha seme • tere aniya oshon beyei jalin • amsun be dagilafi  
jiha lakiyanjiha : tere aniya oshon beye be ele taifin i eršeki :  
urgun sain i wehiyeki :

tangse de jiha lakiyara de hendure gisun  
niohon taiji • udu ben beise • fe biya be wajihav • ice biya be  
aliha seme tere aniya oshon beyei weile i jalin amsun be dagilafi  
jiha lakiyanjiha : tere aniya oshon beyei weile be ele taifin i  
eršeki : urgun sain i wehiyeki :

為神尊前與堂子裡掛錢，諭知致祭者。

神尊前掛錢之歌詞：眾天神、尚錫神，舊月去，新月來，為某年生小子，備酒肉來掛錢，某年生小子，康寧照料，欣欣扶佑。

堂子裡掛錢之歌詞：忸歡台吉、伍篤本貝子，舊月去，新月來，為某年生小子，備酒肉來掛錢，某年生小子，康寧照料，欣欣扶佑。

以上漢譯，筆者參考相關資料但不照單全收，例如 hendure gisun 譯作歌詞，而非祝詞或禱詞，因薩滿祭祀現場，祝禱之詞，是唱而非念，載歌載舞，既酬神又娛人。許多漢譯裡，oshon 被改為 oshon，ele 被改為 elhe，其實那些都是滿語口語。<sup>45</sup>

<sup>44</sup> abkai juse「它指的是眾天神，而非眾帝王。」見愛新覺羅瀛生著，《滿語雜識》，頁 1003。

<sup>45</sup> oshon（口語）/osohon（書面語）/小的，elh（口語）/elhe（書面語）/安寧、安定。見李樹蘭等人編，《錫伯語口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頁 212、133。

上面羅馬拼音那 1 段當中以底線標示的「尚錫神（šang si enduri）」、「伍篤本貝子（udu ben beise）」，宮中上上下下也同樣不知所指為何。值得一提的是，šang，它的滿文字形 ša- 是新滿文、-ng 是老滿文，si 是老滿文；ben，它的滿文字形 b- 是新滿文、-e- 是老滿文、-n 是老滿文。上面神歌裡還有 1 個單詞，weile（事情、工作），wei- 是老滿文、-le 是新滿文，將下方所示 3 張圖片與《簡明滿漢辭典》、《滿漢大辭典》內附「新老滿文字母對照表」<sup>46</sup> 合在一起細看，可知 1 個單詞內存在新老滿文字母混生的過渡現象。



圖片資料來源：《滿文原檔》冊 10，頁 294。

《滿文原檔》裡薩滿的身影可謂無處不在，時隱時現，薩滿祭典可簡可繁，或室內或戶外，但經常不見諸文字。茲舉兩例：努爾哈齊與皇太極都曾率眾貝勒叩首於堂子，見《滿文原檔》冊 2，頁 159-160；冊 6，頁 3。

《四庫全書》裡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是研究清代宮廷薩滿祭祀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惟缺滿文本，而《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sup>47</sup> 的出版適時填補了此一空缺，該書根據日本東洋文庫藏滿文《清文祭祀條例》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例》，還原《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

<sup>46</sup> 參閱：1. 劉厚生等人編著，《簡明滿漢辭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頁 437-438；2.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頁 1134-1135。

<sup>47</sup> 葉高樹譯註，《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8）

滿文本。此例顯示，清季眾多的滿語文文獻留落異域的嚴重程度。<sup>48</sup>

以下〈首日祭馬神神歌〉其中幾句歌詞與漢譯均出自《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

.....

oron honggon de oksofi.....

感於神鈴兮.....

siren honggon de sišafi.....

蒞於神鈴兮.....

.....

tusergen dere be tukiyefi.....

列几筵兮.....

šufangga šusu be sindafi.....

潔粢盛兮.....<sup>49</sup>

薩滿領神入體，有歌有舞有樂，滿語歌詞之上註記音樂簡譜又能留存至今，真可謂稀有之至。〈清坤寧宮祭神祭天滿語祭祀神歌〉就保存了如此珍貴的簡譜，「.....久藏清宮鮮為人曉，堪使世界學術界耳目一新。」<sup>50</sup>。茲擇取〈清坤寧宮祭神祭天滿語祭祀神歌〉其中幾句，滿文及漢譯據原文一字不改：

.....uju de ukufi, meiren de fehufi.....

豐於首而仔於肩

.....ulin i udafi, basa i baifi, baitangga ulegiyan be bahafi.....

juwe gala tomome gaifi.....

蠲精誠以薦薌兮，執豕孔碩.....二以將兮

.....uyun boui amsun be shufafi gingnembi, foli fodo be tebufi,

siren futa be gochifi.....

<sup>48</sup> 戈思明撰，〈滿文「話條子」〉，收入廣定遠・孔果洛總編，《渤海與肅慎》（臺北：臺灣英文新聞，2020），頁487-502。

<sup>49</sup> 葉高樹譯註，《滿文〈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禮〉譯註》，頁129、146、290。

<sup>50</sup> 愛新覺羅瀛生著，《滿語雜識》，〈卷頭語〉。

聚九家之彩線，樹柳枝以牽繩<sup>51</sup>

宮中司祝最終丟失了「國語」，那民間的薩滿是否好一些？「滿族民間的薩滿祭祀文本，最初是由一人翻譯漢注的一部藍本。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老薩滿的更替，薩滿祭祀文本便由一本衍生出多本。後繼者勢必對藍本內容以訛傳訛，一誤到底。後來者在抄襲過程中，再度出現些筆誤，甚至刻意加以修改，久而久之，藍本變成了“濫本”。清語不“清”，滿語不“滿”，不倫不類，令人啼笑皆非。」<sup>52</sup>引文所言倒也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條船，見下面兩種珍貴的神本子。

## 2. 民間薩滿

1980 年代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寧市以南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發現的滿文本《薩滿神歌》，抄成於光緒十年（1885），記載詳盡，兼有錫伯族傳統文化特色，茲節錄該書上卷〈十八卡倫神歌〉1 小段：

.....

mafari wecen be alifi

身膺祖先沃臣神

saman seme sarkiyafi

有緣來抄薩滿書

geyen<sup>53</sup> seme tacifi

入選葛嬰學神術

šalda temen de tengnefi

跨上了沙爾丹駝

šayan ihan de yalufi

騎在那白牛之上

elben boo ci tucifi

<sup>51</sup> 愛新覺羅瀛生著，《滿語雜識》，頁 868-871。

<sup>52</sup> 尹郁山等人編著，《滿族薩滿神辭口語用語研究》上卷，〈前言〉（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20）。

<sup>53</sup> geyen（葛嬰），即「.....多災多病.....或者精神錯亂.....這種人，經薩滿診斷指引迷途，正式拜師學薩滿，舉行領神儀式後，病就會好起來。這種被選中學薩滿的學徒，就叫葛嬰.....」參閱：納喇二喜傳寫、永志堅編譯，《薩滿神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133。

從那茅屋走出去<sup>54</sup>

.....

從大陸東北滿族自治區採集到的薩滿神本子，至今仍有若干還保存著珍貴的祭祀內容，〈吉林九臺莽卡滿族鄉尼瑪察氏家藏祖傳家祭神本〉就屬其一，但此份手抄神本原件是以漢字記音，羅馬字轉寫與譯註由他人為之<sup>55</sup>。神本中的正文節錄如下，漢譯經筆者略為修改：

.....

bolgo amsun bošofi (督辦純淨神膳)

ayan amsun weilefi (製作芸香神膳)

suran be suitafi (倒去洗米水)

sukjire amsun faitafi (胙肉切成片)

.....

jancuhūn nure be jakade dobofi (甘甜的酒供在前)

hatan arki be hanci dobofi (濃烈的酒供一旁)

juru hiyan be juleri sisifi (偶香插前面)

niyanci hiyan be yarume dabufi (藿香<sup>56</sup>接續燃)

.....

aisin i honggon be aislame dosifi (金鈴助陣入場)

menggun i honggon be maksime dosifi (銀鈴舞動入場)

sele i honggon be sefereme jafafi (鐵鈴緊緊在握)

.....

šurdeme maksifi (手舞足蹈繞圈圈)

.....

此外，滿族口傳文學也離不開薩滿神歌。譯成多國文字的《尼山薩滿》

<sup>54</sup> 納喇二喜傳寫、永志堅編譯，《薩滿神歌》，頁 241。

<sup>55</sup> 戴光宇著，《三家子滿語語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頁 288-291。

<sup>56</sup> 蕿香，「東北地區滿洲人常用的祭祀香料安春香（niyanci hiyan）興安杜鵑的葉片。」參閱：1. 王釗撰，〈眾神之饗——以《嘉產薦馨》為中心探究清代滿族薩滿祭祀用香〉，收入《滿族研究》2017 年第 4 期，頁 61-68；2. 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第二冊，頁 780-781。

在中國東北少數民族中家喻戶曉，故事說某員外有子打獵身亡，員外求助尼山薩滿，這位神力無邊的女薩滿禁不住老員外巴爾都·巴彥再三哭求，才勉強出馬，女薩滿於是過陰收魂，其子遂死而復生。僅節錄神歌 1 小段開頭幾句：

.....

eikule yekule ere baldu halai.....

唉庫勒 葉庫勒 這姓巴爾都的.....

eikule yekule haha si donji.....

唉庫勒 葉庫勒 男人，你聽好.....

eikule yekule getuken donji.....

唉庫勒 葉庫勒 清楚的聽好.....

.....eikule yekule susai sede

.....唉庫勒 葉庫勒 在五十歲

.....eikule yekule emu haha jui.....eikule yekule banjiha ofi.....

.....唉庫勒 葉庫勒 一個男孩.....唉庫勒 葉庫勒 生下

.....eikule yekule tofohon se ofi.....

.....唉庫勒 葉庫勒 到十五歲

.....eikule yekule ilmun han.....eikule yekule hutu be takūrafi,

.....唉庫勒 葉庫勒 閻羅王.....唉庫勒 葉庫勒 派鬼

.....eikule yekule fayangga be jafafi,

.....唉庫勒 葉庫勒 奪魂

.....

以上薩滿神歌片段出自海參歲本《尼山薩滿》。<sup>57</sup>

## 二、子弟書曲藝：孟姜尋夫

滿洲族統治中原大地近 3 個世紀，主政者為學習漢文化精髓，曾將大量的漢族經典史籍與俗文學作品譯成滿文。「孟姜女哭倒長城」，漢族著名的民間故事，由於她是古代貞節烈女的代表人物，曾被編為曲調供人吟

<sup>57</sup> 趙志忠譯注，《〈尼山薩滿〉全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頁 137-138。

唱，雅俗共賞。茲節錄幾句：

.....

meng giyang [ nü ] hehe geren i jakade ibenefi ekšeme domnombi,  
孟姜女走近身邊忙萬福

.....

geren niyalma deng seme ilinjafi hahilame karu canjuraha tuwaci,  
眾人止步忙還禮

.....

udu muwa suse obufi miyamime beye gubci buraki canggi bicibe,  
雖然是裙布荊釵一身塵垢

.....

tere fan ki liyang alban de tucibufi gašan falga ci aljaha ci  
那范杞良自從充役離鄉土

.....

ineku fan ki liyang ni hesebun fudasi ofi bucere gashan de tušahabi,  
也是范杞良命蹇遭劫數

.....

golmin hecen de isinafi eigen be acafi tebuhe gūnin wajija manggi  
到長城尋見兒夫完宿願

.....

tuttu ofi minggan babe goro sarkū eigen be baihanafi,  
所以不辭千里尋夫去<sup>58</sup>

### 三、錫伯族說唱藝術

#### 1. 情歌唱出風土民情

「.....在情歌中，俚俗淺顯的語言寄寓著布衣兒女風花雪月裡的浪漫，

<sup>58</sup> 日本波多野太郎編輯，《滿漢合璧子弟書尋夫曲校證》（日本橫濱市：橫濱市立大學紀要委員會，1973），頁 11-39。

款款深情的對唱表現著阿哥小妹柴米油鹽中的堅貞……」<sup>59</sup> 歌詞中提及錫伯族人昔日常騎的一種馬「喜鵲青」。

bai burha be atanggi bahafi hadumbi,  
走出河邊的樹林，何日再來吶割柳條；  
bailingga nun be atanggi bahafi acambi.  
離別恩愛的嫩妹，何日才能吶再相會呐。  
ul<sup>60</sup> morin uju be tukiyefi incalaha,  
思念故土的喜鵲青，昂起頭吶咴咴嘶鳴呐；  
unenggi agu i ucun be uju be tukiyefi singnaha.  
聽見情人的歌聲，抬起頭吶凝神聆聽呐。  
siseku i ufa be sisefi tembio,  
篩子裡的麵粉，怎麼吶篩個不完呐；  
silhingga agu be sabufi šusinemem tembio.  
看見心愛的阿古，怎麼吶說個不完呐。<sup>61</sup>

## 2. 章回小說：《三國之歌》

以下漢譯，由筆者為之：

.....  
looye.....fujinsa be ilibufi.....,  
老爺安頓好二夫人.....  
han fu.....looye de doro akū sembi,  
韓福喝斥老爺無理，  
cengsiyang ni jurgan be cashūlafi,  
辜負丞相的情義，  
cisui waliyafi yoombi.

<sup>59</sup> 賀元秀主編，《錫伯族文學簡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頁31。

<sup>60</sup> ul morin, 滿文作 ulu morin, 喜鵲青馬，此馬「青色毛裡有白花」。見胡增益主編，《新滿漢大詞典》，頁778。

<sup>61</sup> 吳文齡搜集整理翻譯，《錫伯族情歌》（錫漢對照）（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頁28、49、67。

掉頭就走。

.....

han fu……hadahangge hashū meiren.

韓福……箭中（關公）左臂。

sirdan hadahai, sindarakū amcanafi,

（關公）帶傷追趕，

han fu be sacihangge……

斬了韓福……

geren cooha gelefi……

眾軍驚恐……

furdan i duka be neifi……<sup>62</sup>

打開關口……

### 3. 西北平亂：《喀什噶爾之歌》

清代嘉慶、道光兩朝（1820-1827）維吾爾首領張格爾起兵反清，錫伯營總管額爾古倫參與平亂，喀什噶爾是戰場之一。「……《喀什噶爾之歌》……全詩近千行。詩中記述了伊犁四營（錫伯、厄魯特、察哈爾和索倫）部分旗軍於 19 世紀 20 年代奉命赴南疆平定英俄殖民者唆使的張格爾之亂的歷史過程。尤其是對錫伯營軍在總管額爾古倫領導下的戡亂過程進行了詳細描寫。」<sup>63</sup>《喀什噶爾之歌》其中 1 小段<sup>64</sup>節錄如下，漢譯由筆者為之：

.....

leheme jidere cooha（追兵）

lefū i gese haha（似熊那般的漢子）

nesungga neneme isinjifi（訥松阿先來到）

〔lekderehe〕janggar be baha（抓獲那狼狽的張格爾）

<sup>62</sup> 忠衆等人整理，《三國之歌》（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頁 88-90。

<sup>63</sup> 賀元秀主編，《錫伯族文學簡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頁 102-103。

<sup>64</sup> 蘇德善搜集・整理，《喀什噶爾之歌》（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頁 88-89。

sirabume isinjiha cooha (前來接應的大軍)

ſusingga sain haha (舒興阿不愧是好漢)

sihame tafame jifi (緊追而來)

sasari janggar be jafaha (共同擒獲張格爾)

.....

「訥松阿、舒興阿，是 19 世紀 20 年代清政府平定南疆張格爾叛亂中，生擒首逆張格爾的兩位英雄。」<sup>65</sup>

#### 4. 從軍戍邊：《拉希罕圖之歌》

主角拉希賢圖 (lasihiyantu) 走上街頭與人對談揭開故事的序幕，路人嘲笑他執意去喀什噶爾戍邊衛國，要他去見邊防長官放行，身為獨子，寧可放棄家產，請姊夫姊姊代為奉養二老，旅途中得識維族姑娘蘇里木菡 (sulimhan)，有情人終成眷屬。這部小小說，裡面有許多擬聲詞，如 fusufasa (慌慌張張)、gengge gangga (孤孤單單)、ebuhu sabuhū (急急忙忙)、niowari niowari (綠油油)，有不少的口語用詞，如 anfu (衛戍)、daban (險要)、ele mile (充裕)、emu falan (一會兒)。歌手唱出穆斯林禮儀 du wa (「都瓦」，雙手摸臉祝福)、當地主食 nang efen (饢)，讓外人嗅到新疆回教世界的庶民生活。

「《拉西罕圖》是錫伯族敘事長詩之一……全詩近千行，主要描寫 18 世紀末期一名叫拉西罕圖的青年，因為是家中的獨子，不能當兵……說服領催、牛彖章京等錫伯營官員和自己年邁的父母……奉命赴南疆卡倫台站換防……生活氣息和軍旅文化氛圍非常濃厚……」<sup>66</sup>

故事情節摘錄數句，漢譯由筆者為之：

.....

dade ere baita be dalafi icihiyara niyalma bi (此事本來就有做主  
辦理的人)

<sup>65</sup>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等合編，《新疆錫伯族人物錄》(內部資料)(烏魯木齊：新協印務有限公司印刷，2001)，頁 9。

<sup>66</sup> 賀元秀主編，《錫伯族文學簡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頁 105。

neneme genefi bošokū looye de baici acambi (先去乞求領催老爺)

.....

bošokū looye lasihiyantu be tuwafi injembi (領催老爺打量拉希賢圖，笑一笑)

.....

sini beye yabure oci juru unggā be we ujimbi (你若去了，誰來奉養二老)

.....

lasihiyantu ijaršame injefi jabume henduhe (拉希賢圖笑一笑回答說)

.....

juru unggā be oci mini eyun eigen i sasa ginggulembihe (二老由我姊姊和姊夫來孝敬)

.....

nerginde ini beyei ashaha furtun be bufi temgetu obuha (立刻把手上帶的戒指給她作為信物)

sarganjui inu emu fungku be tucibufi alibume buhe (姑娘也取出手帕給他)<sup>67</sup>

.....

### 5. 《徙遷之歌》：緬懷錫伯官兵衛國犧牲

「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十九日，錫伯官兵自盛京城出發……乾隆三十年（1765）七月二十二日，先後抵達伊犁……一千餘名錫伯官兵於四月十八日聚集在盛京錫伯家廟（或稱太平寺）祭祖，此即西遷節之由來……」<sup>68</sup> 西遷即徙遷，《徙遷之歌》，羅馬字轉作 sibe uksurai gurinjihe ucun，「……整個作品……重點敘述錫伯人民西遷的辛酸經歷……以及後來的各種遭遇……這部長詩一開頭就唱出東北故鄉和民族大遷徙的歷史背

<sup>67</sup> 浩然搜集整理，《拉西罕圖之歌》（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頁6-7、69。

<sup>68</sup> 戈思明著，《滿文的傳承：新疆錫伯族》，頁25-26。

景……」<sup>69</sup> 摘錄《徙遷之歌》原文數行，漢譯由筆者為之：

.....

manju ejen i hese bihe, mukden jiyangjiyun de wasika  
滿洲皇帝下詔盛京將軍

minggan sibe be sonjofi, ili de tebune seme afabuha  
著挑錫伯千人戍防伊犁

.....

gufu gugu fudenjimbi, gubci acafi songgombi  
姑父姑姑來送行，大夥相見全哭泣

.....

uksun mukūn fudenjimbi, uhei acafi songgombi  
同宗親人來送行，大夥相見全哭泣

.....

siren mama be gaisu, sirame juse fusembi  
喜里媽媽要攜帶，後代的子孫來繁衍

harkan mafa be gaisu, horhon i ulha fusembi  
海爾堪瑪法要攜帶，圈裡的牲畜來繁衍

.....

ama mafa baci aljafi, amasi tatašame songgombi  
離別了老家，回想起一掛念就哭泣

.....

barluk de isiname, baifi tuweri be hetuhe<sup>70</sup>  
抵達巴爾魯克（卡倫），覓地過冬

.....

（按：喜里媽媽與海爾堪瑪法，錫伯族昔日供奉的一對祖先神，女神供在西屋內西北角保佑家人，男神供於戶外牆上保佑牲畜。巴爾魯克卡倫隸

<sup>69</sup> 賀元秀主編，《錫伯族文學簡史》，頁240-241。

<sup>70</sup> 關興才整理，《徙遷之歌》（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頁2-3、5-6、9。

屬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sup>71</sup>。)

#### 6. 錫伯詩作〈春之歌〉入選小學教材

〈春之歌 (niyengniyeri i ucun)〉，這 1 首錫伯文短詩收入新疆重量級作家郭基南 (1923-) 所著《心之歌 (niyaman i ucun)<sup>72</sup> 詩集。連同這首詩在內，他的若干作品曾被編入錫伯文小學語文教科書。這位精通滿漢雙語又具文采的錫伯族菁英分子，本地讀者可能比較陌生，故而在此節錄〈春之歌〉詩文數行供參，漢譯由筆者為之：

niyengniyeri (春天)

ilhangga etuku be etufi (穿上花朵般顏色的衣服)

šumin buyenin be hefeliyefi (懷抱款款深情)

bulukan nemeyen i alkūme jimbi (溫柔的步步走來)

bi (我)

tuwai gese halhūn tunggen, buyenin labdu gala be sarifi (敞開火  
熱的心、多情的手)

terebe takseme tebeliyembi (把它緊緊抱在懷裡)

.....

bi niyengniyeri be hairambi (我愛春天)

.....

bi geli cihanggai emu ajige gasha ofi (我也願做一隻小鳥)

.....

asha be sarifi deyembi (展翅飛翔)

jilgan be sindafi uculembi (放聲高歌)

綜上 9 類歌曲所述，動詞詞尾 -fi 若置於句尾，作押韻用，置於句中，表數個行動一前一後接連發生。此外，ofi 有兩個詞義，成為與因為，視句意而定。

<sup>71</sup>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頁 403。

<sup>72</sup> 郭基南著，《心之歌》(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頁 222-224。〈春之歌〉亦收入何文勤主編，《六年制小學課本語文第十冊(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教育出版社，1988)，頁 12-14。

## 滿語動詞詞尾 -fi 在文學作品裡作斷句用

清代近 3 個世紀留下了數量驚人的滿文檔案史料與漢籍翻譯作品，相較之下，滿文純文學作品卻相當稀少。前述滿洲開國官方文獻《滿文原檔》是建州女真入主中原之前的「正史」，也是「信史」，裡面有 1 段關於女真族誕生於世的奇談，不妨從文學作品的角度賞析。部分內容節錄如下，書中漢譯略為修改。

本段內，凡詞尾 -fi 作斷句用的滿語動詞皆以底線標示。

### 一、「仙女下凡吞果生子」

見《滿文原檔》冊 9、頁 162：

……mini mafa ama jalan halame bukūri alin i dade bulhori  
omode banjiha ♫ meni bade bithe dangse akū ♫ julgei banjiha  
be ulan ulan i gisureme jihengge tere bulhori omode abkai ilan  
sargan jui enggulen, jenggulen, fekulen ebišeme jifi enduri  
saksaha benjihe fulgiyan tubihe be fiyanggū sargan jui fekulen  
bahafi anggade ašufi bilgade dosifi beye de ofi bokori yongšon  
be banjiha ♫ ……<sup>73</sup>

吾祖世居布庫里山山下的布爾胡里湖。我等原籍史無記事，遠祖誕生乃由口傳而來：三仙女恩古倫、正古倫、佛庫倫，至布爾胡里湖沐浴，神鵲送來朱果，老么佛庫倫得之，銜於口中，滑入咽喉，遂而有孕，生子布庫里雍順……

按：以上及以下引文第 5 行裡的動詞片語 beye de ofi（懷孕），ofi 解作到、及至，與因為無關。

仙女下凡吞果生子的神話故事<sup>74</sup>，《滿洲實錄》也有描述，內容大同小

<sup>73</sup> 《滿文原檔》冊 9、頁 162

<sup>74</sup> 「……我國東北……商代……高句麗……扶餘……這些以鳥類作為他們始祖的故事，和三仙女的神話，都很相近。」見莊吉發著，《清史拾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81 年），頁 82。

異，但用字稍嫌囉嗦，短短的 1 段話裡，衣服字眼的滿文竟出現 3 次，可以為證。此外，比較特別的是，《滿洲實錄》附圖之多，在中國各朝代帝王實錄中也無出其右者<sup>75</sup>。

## 二、「仙女下凡吞果生子」之 2

據《滿洲實錄插圖集》：

此套叢書第 1 冊〈前言〉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漢文、蒙古文三體合璧《滿洲實錄》有插圖 83 幅，是現存《滿洲實錄》各本中插圖最全之本……」

……tere bukūri alin i dade bisire bulhūri omo de abkai sargan  
 jui enggulen, jenggulen, fekulen ilan nofi ebišeme jifi muke ci  
tucifi etuku etuki sere de, fiyanggū sargan jui etukui dele enduri  
 saksaha i sindaha fulgiyan tubihe be bahafi na de sindaci hairame  
 angga de ašufi etuku eture de, ašuka tubihe bilha de šuwe dosifi,  
 gaitai andande beye de ofi……mini hala abka ci wasika aisin  
 gioro, gebu bukūri yongšon seme……<sup>76</sup>

那布庫里山山麓下有一布爾胡里湖，仙女恩古倫、正古倫、佛庫倫三人前來沐浴，浴畢起身，老么得神鵲之朱果於其衣，不忍置朱果於地，而銜於口，滑入咽喉，瞬間成孕……吾愛新覺羅之姓，乃從天賜，名布庫里雍順……

<sup>75</sup> 繪圖內容以及圖中努爾哈齊是否酷似本尊，見陳捷先著，《滿清之晨－探看皇朝興起前後》（臺北：三民書局，2012），頁 121-148。

<sup>76</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清太祖滿文實錄大全》冊 6（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6），頁 0015-0017、0029-0030。



資料來源：《清太祖滿文實錄大全》冊 6，頁 05。

### 三、「康親王平三藩耿亂」

據《隨軍紀行》：

此書譯注者在〈前言〉說，「本書以日記體形式寫成，內容是平定三藩，時間是康熙十九年（1680）至二十一年。書中詳細記述了由粵入滇這一方面軍的軍事行動以及由滇返京的經過……作者曾壽……是康熙十三年（1674）隨奉命大將軍康親王傑書參加平定三藩的……」

《隨軍紀行》作為一手史料，其珍貴之處不僅在於「……作者真實地記錄了八旗下級官兵的軍事生活，為一般史書所不載。」此書也是滿文純文學作品，以今人眼光看，它更是不折不扣的戰地報導文學。其中 1 小段節錄如下，書中漢譯略為修改：

……juwan uyun de amba jiyangjiyün ilan meyen i amba cooha,

beise i cooha be gaifi, elhe ibeme orin ba yabufi, gui hūwa sy alin de wesifi, cooha be faidabufi, tuwaci hoton akdun afaci ojorakū. cooha be gocifi bedereme, hoton ci nadan bai dubede, alirame, ing ilifi, dobori dulime keremu ulan weile seme selgiyefi, bi jalan i cooha be gaifi……amba jiyangjiyūn uheri amba cooha be gaifi, okdome ingci tucifi faidabufi ibeme, afara babe tuwafi……

十九日，大將軍率大軍三隊與貝子的兵，緩緩前進，行二十里，上歸化寺山布陣，見城堅而難攻，遂退兵而還，離城七里之處，依山紮營，傳令連夜掘城壕濠溝，我領甲喇兵……大將軍率全軍出迎，布陣，趨前，觀戰……

按：上面羅馬拼音引文最後 1 行副動詞 -fi 有兩個，tucifi（進出的出）、faidabufi（使排列），以第 2 個副動詞斷句。

#### 四、「靈丹藥神講鬼」

據《屍語故事－滿族佛傳故事二十一篇》：

引此書〈前言〉其中一段話，「……本書是清初以前的寫本，最晚不會超過康熙朝中期……滿文本仍然是佛教故事，但裡面卻加進了薩滿教的東西……滿文本《屍語故事》……為研究印度《僵屍鬼故事》在世界各地、特別是在中國流傳提供了比較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滿族流傳下來的神鬼故事除前揭《尼山薩滿》之外，《屍語故事》是其二，單以保存滿文純文學作品的角度而論，此書也是格外的珍貴。茲摘錄《屍語故事－滿族佛傳故事二十一篇》第一篇〈富人的兒子〉幾句對話，書中漢譯略為修改：

……fujin hendume, bi han de ergelebufi fakaha dere……tereci bayan i jui gucusei jakade isinjifi, neneme ini beye tucike. amala fujin be tucibufi tuwabuha manggi, tere gucuse mujilen aššafi tuwaha seme elerakū. tereci bayan i jui hendume, suweni

geren gucuse aisilafi mimbe weijubuhe. mini sargan be inu  
 arga deribufi baha……tere guwa tuwara niyalma i jui ojorakū  
 hendume, si bucefi giran hono aibide bisire be sarkū bihe. bi  
 guwa tuwafi baha. te mini ere baili de ere fujin be minde gaji  
 .....

……夫人說，我受汗王脅迫，才離開你的啊……富人的兒子到達同伴們的面前，自己先（從木鳳凰肚裡）出來，再讓夫人出來，會見大夥，大夥見到夫人，就動了心，而且還不知足。富人的兒子說，諸位夥伴，你們的幫助讓我起死回生，也用計找到了我的妻子……算命先生的兒子說，不行，你死後，屍體在何處都不得而知，是我卜卦才找到的，把夫人帶來給我以報我的恩情……<sup>77</sup>

### 五、「圖理琛赴俄見土爾扈特汗」

土爾扈特，漠西蒙古部，因準噶爾部勢大，被迫移居伏爾加河一帶，清廷欲以土制準，並亟需與俄羅斯通好，<sup>78</sup>此即圖理琛奉派出使土爾扈特的主因。「……康熙五十一年，阿玉氣汗遣使薩穆坦假道俄羅斯進貢方物，清聖祖欲悉所部疆域……乃命圖麗琛偕侍讀學士殷扎納……等齎敕往諭阿玉氣汗……五十三年（1714）六月，抵達阿玉氣汗駐劄之馬鰲托海地方……五十四年（1715）三月，還京……圖麗琛等三易寒暑，往返數萬里，終能不辱使命……」<sup>79</sup>圖理琛將此行所見人事物詳細記錄下來，書名為《異域錄》。

<sup>77</sup> 季永海等人譯注，《屍語故事－滿族佛傳故事二十一篇》（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1），頁236-247。筆者參酌書中漢譯，頁6-9，稍予修改。

<sup>78</sup> 李齊芳撰，〈清雍正皇帝兩次遣使赴俄之謎－十八世紀中葉中俄關係之一幕〉，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3期，頁40-44。

<sup>79</sup> 莊吉發校注，《滿漢異域錄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103年），書前〈序〉。

茲節錄《校注異域錄》<sup>80</sup> 其中數行：

……susai ilaci aniya duin biyai ice sunja de turgūt gurun i ayuki han ini ferjergi taiji weijeng sebe takūrafi colgoroko enduringge amba han i elhe be baime……sunja biyai juwan ninggun de ejil bira be doofi……šuge i jergi duin niyalma de niyalma tome emte morin benjibufi ……bi kukšeme gūniha seme wajirakū abkai gese amba enduringge han i yamun de hengkileme genefi orin de jurafi jugūn de juwan inenggi yabufi……

五十三年四月初五日，土爾扈特部阿玉氣汗派下屬臺吉魏正等，向至聖大汗請安……五月十六日，渡額濟勒河……給舒哥等四人送來每人一匹馬……我感激不已，前去似天一般的大聖汗宮磕頭，二十日起程，途中步行十日……

#### 六、「邊防軍官捎來滿文書信」

《來自輝番卡倫的信（hūifa karun i jasigan）》，作者何葉爾·文克津（heyer wekjin）「……於咸豐初年（作者 25 歲左右）到輝番卡倫換防……他在此期間寫給錫伯營同事的書信體散文。」<sup>81</sup> 輝番卡倫在何處？「何葉爾·文克津從惠遠城出發到輝番卡倫用了兩天半的時間……惠遠至輝番卡倫的距離為一百二十五公里左右……1881 年《中俄伊犁條約》簽定後劃入俄國境內。」<sup>82</sup> 信中對十九世紀中期新疆西北地區的卡倫設置、坐卡官兵日常生活、作者赴輝番卡倫行經地點、沿途自然環境都有所描述，且此信是以道地的滿文書寫，頗具學術價值。片段內容摘錄如下：

<sup>80</sup> 日本人今西春秋著，《校注異域錄》（日本奈良：天理大學，1964），下卷頁 281-283。書末附單張地圖 1 份，詳細記載圖理琛一行往返北京、阿玉氣汗駐劄地全程各停留點、各點里程計算表、哪些地點需騎馬或駕雪橇或乘船，所經各個村落之名稱、村落戶口數、村落駐軍數、村落裡有天主堂幾座。日本人的研究精神可見一斑。

<sup>81</sup> 賀元秀主編，《錫伯族文學簡史》，頁 163。

<sup>82</sup> 郭建中等人著，《錫伯族歷史研究相關資料及評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頁 280、284。

……olon be ciralafi geli juraka cicigan i arbun ceji i adali, samal inu tuttu. ubade mukūn i niyalma bifi, aciha be ebubufi morin be ergembuhe. ce cai buda tukiyefi ulebuhe……sabuha donjiha urse gemu jifi niyaman be fonjime gucu be fujurulambi……ekšeme hontoho inenggi yabufi teni beye ergehe. jai cimari morilafi, geli hūifa i baru jurame……tuktan de karan de tafafi šurdeme tuwaha, julergi de ili bira, amargi de alin buten be sabumbi…… tulergi aiman suwaliyaganjame tefi, furdan kamni akū……tereci oboci ebufi, geren cooha be isabufi, karun de tere doro be dere de ulhibume, šan be tatame emu jergi alafi……<sup>83</sup>

（上馬）拉緊肚帶程。齊齊罕之情況與策濟相同，薩瑪爾亦然。此地有我族人，故卸下行囊，令馬兒打盹。彼等奉上茶飯款待……知情者全都前來，打探親友……急行半日，乃得歇息。次日備馬，動身前往輝番……初登高臺環視，前有伊犁河，後有山麓……外藩雜居，毫無屏障……因而走下石坎，召集眾軍，將坐卡守則耳提面命一番……

## 七、「中國最早的軍事教科書—《孫子兵法》」

茲節錄《滿漢合璧孫子兵法》<sup>84</sup>〈用間第十三〉數行：

musei jakanaburengge be unggifi, urunakū fujurulabume sambi, bata i jakanaburengge jifi, muse be jakanabure be urunakū fujurulafi, ereci aisi i dosimbume, yarufi tebume ohode, tuttu fudarame jakanaburengge be bahafi, takūraci ombi. ede akdafi saha de, tuttu gašan i jakanaburengge dorgi jakanaburengge be bahafi takūraci ombi. ede akdafi saha de, tuttu buceme

<sup>83</sup> 《來自輝番卡倫的信（hūifa karun i jasigan》（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頁6、10-11。筆者之漢譯係以原文為本並參考肖夫所譯漢文。

<sup>84</sup> 《滿漢合璧孫子兵法》，收入謝祥皓等人輯，《孫子集成》冊16，（濟南：齊魯書社，1993），頁425-427。

jakanaburengge holo baita yabufi, bata de alanabuci ombi.

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道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

(按：間，間諜也，〈用間〉篇有鄉間、內間、反間、死間、生間 5 種。)

## 八、《三字經》—中國傳統啟蒙教材（1）

.....

musei jeo gung, jeo li bithe be deribufi (我周公 作周禮)

ninggun hafan banjibufi, dasan i doro taksibuhabi (著六官 存治體)

.....

hiya gurun jui de ulafi, abkai fejergi be booingge obuha (夏傳子家天下)

duin tanggū aniya ofi, hiya gurun jui še ji guribuhe (四百載 遷夏社)

tang, hiya gurun be dailafi, guruni colo be šang sehe (湯伐夏 國號商)

ninggun tanggū aniya ofi, juo de isinjifi gukuhe (六百載 至紂亡)

.....

sung gurun ci gurun sirafi, liyang gurun cen gurun alisha (宋齊繼梁陳承)

ere julergi gurun ofi, gin ling bade gemulehe (為南朝 都金陵)

.....

按：引文內 3 個 ofi，第 4 行、第 6 行裡的 ofi 跟它前面的時間有關，解作經歷、過了，最後 1 行裡的 ofi 作成為解。

## 《弟子規》—中國傳統啟蒙教材（2）

.....

jugūn de unggā ucaraci, ekšeme amcanafi canjura (路遇長 疾趨揖)

ungga umaiserakū oci, bederefi ginggauleme ilicina (長無言 退恭立)

.....

endebuku donjifi jilidara, maktacun donjifi sebjelerengge (聞過怒 聞譽樂)

ekiyendere gucu halanafi, nonggibure gucu bederehe (損友來 益友卻)

maktacun donjifi olhoro, endebuku donjifi urgunjerengge (聞譽恐 聞過欣)<sup>85</sup>

.....

## 九、「中韓交流的推手—《老乞大》」

「在中韓文化交流史上，朝鮮商人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朝鮮仁祖十四年（1636）丙子之役以後，朝鮮與滿洲的關係日趨密切，滿洲語文用途日廣，文書往復，言語酬酢，多賴滿洲語文，於是有了《老乞大》滿文譯本的刊行……」。節錄其中 1 小段如下：

.....mujakū sain niyalma be teisulefi, ini araha beleni buda be mende ulebufi, geli niyalma takūrafi sinde enculeme benjibuhebi, si hacihiyame jefi moro fila be ere jui de afabufi gamakini

.....遇到非常好的人，把他做的現成飯給我們吃，還派人另外給

<sup>85</sup> 吳元豐主編，《三字經·弟子規·朱子家訓：滿漢對照》（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9）。《三字經》，頁 60-61、80-81、100；《弟子規》，頁 163、172-173。

你送來，你快吃，碗碟交給這孩子帶回去吧！<sup>86</sup>

### 滿語動詞詞尾 -fi 在詩詞、戲曲劇本裡作押韻用

現存以滿文翻譯漢籍經典文學作品不在少數，近代新疆錫伯族文人詩作也有很多，僅選出詩經、西廂記、唐宋詞、錫伯族長篇敘事詩、共4類，摘錄其中1小部分內容並簡述如下：

#### 一、「中國最早的詩集—《詩經》」

據《滿漢合璧詩經講章》<sup>87</sup>：

.....

seiben bi anafu teme genere fonde, jing niyengniyeri dulin ofi,  
昔我往戍時，方當仲春.....

.....

te bi anafu wajifi jici, jing cak sere tuweri erin de teisulebufi,  
今我之畢戍而來，候值嚴冬.....

.....

hūwaitarabufi bisire jobocun be, damu beye dulembuhe urse teile  
sambihe,  
羈旅之困，惟親歷者自知耳

te dergi niyalma safi uthai terei funde gisurehengge.....  
而上之人已代為之言.....

tsai wei i emu fiyelen be, dung šan fiyelen i ši de teherebufi  
tuwaci acambi

<sup>86</sup> 莊吉發譯註，《清語老乞大譯註》（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103年），〈導讀〉頁3、13，內頁119。另，「《老乞大》和《朴通事》是韓國舊時的高麗、朝鮮兩朝人學習漢語的會話教科書……這兩本書的作者和著作年代迄今為止不詳，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二書編寫於元代，最初刊行約在公元1423~1434年間……」參閱：李泰洙著，《〈老乞大〉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2003），第1章〈緒論〉，頁1。

<sup>87</sup> 清·曹鑒倫撰，《滿漢合璧詩經講章》，收入夏傳才主編，《詩經要籍集成二編》24（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頁21-25。

採薇一篇，當與東山之詩並觀

按：上面第1行最後1個字ofi，涉及季節，意為到、及至。採薇是周朝的1首戰爭詩，東山之詩也是1首戰爭詩。

## 二、「張生及第娶鶯鶯」

「……《西廂記》是中國戲曲文學中數一數二的作品……有各種版本三百十二種……其影響力應不下於英國莎翁之《羅密歐與朱麗葉》……」<sup>88</sup>

《滿漢合璧西廂記（上）》，〈驚艷第一章〉

fu žin, ing ing, hung niyang, hūwan lang be gaifi wesifi hendume

夫人引鶯鶯、紅娘、歡郎，上，云

sakda beye hala jeng, eigen i hala ts‘ui

老身姓鄭 夫主姓崔

siyang guwe i

官拜當朝相國

• • • • •

siyang gung jalan ci aljafi

相公棄世

sakda beye, jusei emgi giran be gamame, bo ling ni bade isibufi

## burkiki seci

老身與女兒扶柩

往博陵安葬

jugūn i andala hanggabufi, julesi geneme muterakū

因途路有阻

## 不能前進

• • • • •

emu derei ging hecen de jeng heng be ganame jasifi

<sup>88</sup> 曾永義撰，〈今本《西廂記》綜論－作者問題及其藍本、藝術、文學之探討〉，收入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學報《文與哲》，33期，2018年12月，頁2、4。

一壁寫書附京師喚鄭恆來<sup>89</sup>

按：上面第 1 行兩個順序副動詞 gaifi、wesifi 並列，除有押韻效果之外，由第 2 個副動詞 wesifi 斷句。

### 三、詞牌《蘇幕遮》

.....

mafari gašan goro ofi (故鄉遙)

atanggi bahafi marireni (何日去)

boo gašan julergi de bifi (家住吳門)<sup>90</sup>

.....

按：此係周邦彥作品。詞牌中的吳門，即吳越一帶，位於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地區。上面第 3 行中間這個方位詞 julergi (南、南方)，所指即吳門。

### 四、《十五貫》

此劇又名《雙熊夢》，據宋朝通俗小說《錯斬崔寧》和明朝馮夢龍小說《十五貫戲言成巧禍》改編而成。<sup>91</sup>

.....

kuwang jung uthai emu hergen sure siyanšeng ome miyamime  
dastafi<sup>92</sup>

(蘇州知府) 恤鍾就扮作測字先生

dung yo miyoo mukdehen de jifi

來到東岳廟

.....

<sup>89</sup> 《滿漢合璧西廂記》(上)，〈驚艷第一章〉，頁 1-2，出版時間、地點不詳，現藏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索書號：855.6／110／1。

<sup>90</sup> 奇車善譯，《唐宋詞一百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頁 154。

<sup>91</sup> 魏廷編注，《元明清戲曲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頁 314-331。

<sup>92</sup> dastafi，動詞 dasatambi 之副動詞，此係錫伯語口語形式。

emu niyalma enduri oren<sup>93</sup> i juleri niyakūrafi

某人跪在神尊前

.....

kuwang jung ere arbun be sabufi

況鍾目睹此情

.....

uthai leo a šu i meiren be elheken i emu geri forifi.....

輕輕拍了婁阿鼠肩膀一下

.....

leo a šu ambula golofi uju marifi

婁阿鼠大為吃驚，回過頭來

.....<sup>94</sup>

## 五、《喀爾瑪阿敘事詩》

.....

jase jecen be karmatame tuwakiyarangge gurunde holboho be

safi,

守衛邊境事關國

.....

oros cooha kesike i duruni ekisakai acame jifi,

俄兵仿貓悄來合

.....

horgos hoton i belhen akū be nekuleme doksin aburafi.

猛撲霍城乘無備

.....

oros cooha emu jugūn de tuwai agūra de ertufi,

俄兵一路仗火器

<sup>93</sup> oren，塑像，錫伯語口語，滿語作 üren。

<sup>94</sup> 鍾浩翻譯，《十五貫》（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頁49-50。

.....

uigur udu kaktame<sup>95</sup> tandacibe coohai hūsun niyere ofi,

維雖阻擊兵力薄

.....

birai julergi cooha oros emgeri hūiyuwan hoton de dosiha<sup>96</sup> be  
safi,

南營知俄進惠遠

.....<sup>97</sup>

按：上面倒數第 2 行最後 1 個副動詞 ofi，意指因為。

### 結語

當部落人口多到一定數量，內有政令宣達、外有文書互通之需，文字自然應運而生。滿文的創製亦然。

時，滿洲未有文字，文移往來必須習蒙古書、譯蒙古語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編成國語……太祖曰：寫阿字下合一瑪字，此非阿瑪乎（阿瑪，父也）……額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額默乎（額默，母也），吾意決矣，爾等試寫可也。於是，自將蒙古字<sup>98</sup>編

<sup>95</sup> kaktame（阻擋、攔住），kaktambi 之副詞。參閱：楊震遠主編，《錫漢教學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頁 134。

<sup>96</sup> dosiha（進、進入），應係錫伯語口語，書面語為 dosika（dosimbi 之過去式）。

<sup>97</sup> 何耶爾·興謙著，《喀爾瑪阿敘事詩》（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未公開發行，1989），頁 10、147。喀爾瑪阿（1816-1886），或譯作喀爾莽阿，曾任錫伯營總管，抗俄守土有功，死後被追封為揚威將軍。參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等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新疆錫伯族人物錄》（烏魯木齊：新協印務有限公司，2001）（內部資料），頁 18-21。

<sup>98</sup> 老蒙文的起源可溯及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商旅民族粟特人。「粟特文字源自閃（Sem）語系的 Aramaic……粟特文字最大的貢獻是對後代的影響。當其字母由橫行改變為直寫時，便形成了回紇字母，以後又從回紇字母衍生蒙古字母與滿洲字母。」掛田良雄著，《粟特的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民國 77 年，未公開出版），頁 169、174、266。另參閱：1. 木再帕爾撰，〈回鶻諸文字之淵源〉，收入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等編，《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十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3），頁 437-438。2. 余吐肯編著，《錫伯語語法通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導論〉，頁 011。3. 日本放送協會（NHK）1980 年代初以絲綢之路為主題攝製紀錄片，內含《粟特商人》（消えた隊商の民～ソグド商人を探す～）。

成國語頒行，創製滿洲文字自太祖始。<sup>99</sup>

滿文草創之際，女真菁英分子徘徊於詞尾 -fi 不下 6 種寫法<sup>100</sup>，比如借用近代蒙古文 bi 音節，或在 bi 音節右側加 1 個圓圈等等，最後採用輔音字母 w 另加 1 條橫槢，新滿文 fi 音節於焉定型。貫穿字中的橫槢，為滿語動詞詞尾 -fi 創造了有別於其他 9 種副動詞的獨有的鮮明個性。

論述滿語動詞詞尾 -fi，就必須溯及滿語的祖語女真語。從 3 個女真字“**朶**”fi，“**孚**”fi 和“**斐**”bie，讓吾人得知 -fi 的讀音。從阿爾泰語系裡其他語種的對比分析，可知滿語副動詞 -fi 跟其他語種的異同處。從清代通行的滿語讀本如《清文蒙》等內容的深度研析，可知後代中外學者對於 -fi 的闡釋為何。

此外，文內就檔案與文獻歸納總結，-fi，在文章裡起醒目之效並作斷句用，類似標點符號逗號，文內舉 9 種文獻說明。在歌唱作品裡，-fi 展現其音樂性，以 9 種文獻說明。在詩詞、戲曲劇本裡，作押韻用，以 5 種文獻說明。

筆者以滿洲開國史料《滿文原檔》為本，從單詞構形 (morphology)、讀音、語法等方面論述滿語動詞詞尾 -fi 的來龍去脈。另從《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匯編》找出漏報台吉姓名、軍糧數目誤報、朝覲名單誤置、奏摺冗長受告誡等失察不當案件 9 例，初步推斷其中原因或與檔案內標點符號稀少彼此有某種程度的因果關係。

文內所提論點必有失察與膚淺的地方，望方家不吝糾正。寫此文主要的目地還是希望引起更多同好對於「滿學」這種「冷門絕學」的關注。<sup>101</sup>

<sup>99</sup>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編，《清太祖滿文實錄大全》冊 7（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6），頁 0442-0449。此書即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滿、漢、蒙三體合璧《滿洲實錄》，詳情見《清太祖滿文實錄大全》冊 1（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6），頁 006。

<sup>100</sup> 愛新覺羅瀛生著，鄭再帥等人整理，《滿語口語音典》（北京：華藝出版社，2014），頁 235。詞尾 -fi 不少於 6 種寫法，是愛新覺羅瀛生自《無圈點字書》所得出。清·鄂爾泰、徐元夢編著，《無圈點字書》（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sup>101</sup> 以此文追思筆者胞妹戈思聰。



# 《大唐西域記》所載西域和親與蠶絲西傳

劉學銚  
中國邊政協會名譽理事長

## 摘要

唐三藏法師玄奘（西元 600～664 年）以當時所見佛教經典多有辭意不達或前後不一情況，為求佛經真義，乃不辭辛勞涉沙度漠經西域南下印度，求取真經前後歷時十七年，東返後，口述經歷由其門弟子辨機筆錄題之曰《大唐西域記》，其中有兩則提到與西域二綠洲國家和親與蠶絲西傳之傳說，雖非信史，但饒富趣味，本文擬就此書大要及該兩則傳說加以敘述。

關鍵詞：玄奘、大唐西域記、竭盤陀，瞿薩旦那、蠶絲

## 玄奘及其西行

三藏法師玄奘，俗姓陳、名禕，唐洛州緜氏人（今河南省洛陽市偃師市陳河村附近），自幼天資過人，按經諸胡列國時（即一般史書所稱之五胡十六國），許多西域佛教高僧東來中土宣揚佛法，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也有許多佛僧南下江左，由是頗有中國人信奉佛教，甚至不少豪門巨族子弟出家為僧；關於洛州緜氏陳家背景，據唐·慧立、彥悰所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傳》載其先世情形如下。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後魏即鮮卑拓跋氏所建之魏，或稱元魏、拓跋魏；上黨，今山西省長治市一帶），祖康，以學優仕齊（齊，指高氏之北齊）任國博士，食邑周南（或作河南），子孫因家，又為緜氏人也。

父慧，英傑有雅操，早通經術。<sup>1</sup>

可見玄奘一族乃是世代書香官宦之家。

按佛教倡言眾生平等，因此無論達官貴族或販夫走卒，均可崇信佛教，對佛像頂禮膜拜，但如欲探究佛經之奧義，則必得具有相當之學識根基，否則難窺堂奧，洛州緜氏陳家既是世代書香，當有研讀佛經之能力。陳禪於十三歲出家為僧，法名玄奘（玄，玄妙之意；奘，音轉，壯大之意），為鑽研佛學，曾先後問道於景、嚴、空、慧景、道基、寶暹、道震、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辯、玄會等十三位得道高僧，在佛學素養上自是有所增長，但當時各種漢文佛經多為諸胡列國時期或北朝時西域胡僧所譯，如佛圖澄、鳩摩羅什（此二僧為後趙、後秦時人）、那連提耶舍（西元490～589年，北齊時為北天竺人）、闍那屈多（西元527～604年，北天竺人，隋時主持譯經）等，這些胡僧對於漢文未必能精準掌握，因此所譯之佛經或有辭不達意，或有前後矛盾，或者首尾未能一貫，至於是否與梵文原典完全吻合，不無疑問；玄奘既有意探究高深之佛學，對當時既有之漢文佛經，是否與梵文原典完全符合，深表懷疑，《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稱玄奘：

遍謁眾師，備餐異說，詳考其理，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sup>2</sup>

此為玄奘法師赴天竺（印度）取經之緣起。

唐朝皇室李氏一族，除冒稱族出隴西李氏，更自稱係道家始祖老子李聃之苗裔，因此對道教特為尊崇，對佛教不免有所貶抑。唐初東突厥汗國肆虐於北方（唐時稱之為北突厥），及至唐太宗李世民於其貞觀三年（西元629年）十一月派大將李靖等率軍出擊東突厥汗國，次年正月攻破東突厥，俘獲其可汗額利，北方平定，但又與西突厥汗國接壤（西突厥統有廣義之西域，即今中亞地區），為鞏固國防，一方面禁止國人西出敦煌，另一方面想對西域情況有所瞭解，以便應對。玄奘既已決心西去求取真經，乃

<sup>1</sup> 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孫毓棠、謝方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4。

<sup>2</sup> 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頁10。

於西元 627 年（唐太宗貞觀元年）私自「偷渡」出敦煌，當時玄奘二十六歲，涼州都督李大亮聽聞玄奘要偷渡出關，李大亮遂命玄奘返回長安，其時當地有慧威法師，為河西領袖人物，「神悟聰哲，既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深生隨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慧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唐時瓜州在今嘉峪關市西州治當今瓜州縣），當時瓜州刺史獨孤達聽聞法師到，甚感歡喜，優予供養，行將西去之前，涼州公文送到，稱：「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指西域），所在州縣宜嚴候捉。」瓜州官吏李昌乃是信佛之士，私下將公文給玄奘看並說：「師不是此耶？」玄奘遲未作答，李昌說：「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師圖之。」玄奘乃據實以告，李昌聽後，「深讚希有，曰：『師實能爾者，為師卻文書。』即於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引號內皆係錄自《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玄奘自是深覺憂惱，之前慧威法師所派兩個弟子其中道整已經東返敦煌，而慧琳看起來似不堪遠涉，也命其東返，於是買了一匹馬，但苦於無人嚮導，遂在所停留佛寺內向彌勒佛像默禱，希望能得到一個引路之人，其過程頗為傳奇，終有一西域胡名石槃陀者（應係西域昭武九姓石國人）來請玄奘為之受戒，之後石槃陀帶來餅果，表示願意嚮導護送玄奘法師過五烽，玄奘大喜，並為此胡另買一匹馬，次日傍晚時分，石槃陀帶一個老胡人乘一匹瘦老赤馬來，法師心不懼，石槃陀說此老胡翁極諳西去之路，來去伊吾（今新疆哈密）三十多次，所帶他一起來，老胡翁說：「自此西去一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徒侶眾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料量，勿輕身命。」玄奘回說：「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縱死中途，非所悔也。」老胡翁說：「師必去，可乘我馬。此馬往返伊吾已有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少，不堪遠涉。」於是易馬而行。

### 玄奘在高昌

於是開始向西進發，沿途歷經五個烽火台，涉沙度漠，到伊吾時，高昌王麴文泰已獲悉玄奘大師將西去求法，必然要經過伊吾、高昌，因此先派使人到伊吾等候法師，玄奘甫到伊吾，麴文泰即敕伊吾王送法師到高昌，並挑選好馬數十匹、派高昌貴臣馳往恭迎，玄奘法師原想經伊吾後，

取道可汗浮圖城再向西行（可汗浮圖城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縣、吉木薩爾縣一帶），現既受高昌王盛情邀約，雖謙辭再三仍未獲免，於是遂前往高昌，度過沙磧，六天後到達高昌東界白力城（今新疆吐魯番地區鄯善縣），已是日暮時分，玄奘本想在白力城過夜，次日再進高昌王都城，但高昌王已迫不及待想要立即見到玄奘，派官員及使者到白力城迎請法師，又更換良馬終於在深夜到達高昌都城，高昌王與多人前後持燭出宮迎接入後宮，並說：

弟子自聞師名，喜忘寢食。量準塗路（塗同途），知師今夜必至，  
與妻子皆未眠，讀經敬待。<sup>3</sup>

可見麴文泰對玄奘法師仰慕之殷盼望之切，按高昌麴氏王朝自麴嘉於西元 501 年（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二年，南朝齊東昏侯蕭寶卷永元三年）建立後，到麴文泰時已八世九傳，百有餘年，是個地瘠民寡地方型小王朝，在此百餘年間，先後有高車、柔然、嚙噠，突厥稱強於西域，高昌迫於力不如人，乃不得不向之稱臣，麴文泰時，突厥獨盛於西域，高昌遂向突厥納貢稱臣，西突厥室點密可汗且將其女嫁高昌第六代王麴茂寶（此一突厥公主並未生有兒女），因此高昌與西突厥國有姻姪之親，高昌王朝若干典章制度也頗受突厥影響<sup>4</sup>，但麴文泰曾兩度到中原朝見隋煬帝，可見高昌王朝是漢胡文化混融的小王朝。

麴文泰篤信佛教，崇奉程度已近乎癡迷地步，且已久仰玄奘法師盛名，因此對玄奘禮敬有加，而玄奘一心要去天竺求取佛經梵文原典，在高昌停留十多天後，欲辭行西去天竺，但麴文泰堅欲把玄奘留在高昌以弘揚佛法，並以各種方法阻止玄奘西行取經，並且說：

朕與先王遊大國（指中國），從隋帝歷東、西二京及燕、代、汾  
晉之間（隋帝指隋煬帝），多見名僧，心無所慕。自承法師名，  
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擬師至止，受弟子供養以終一生。令一國  
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千，並使執經充師

<sup>3</sup> 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頁 19

<sup>4</sup> 參見劉學銚〈西域東端高昌吉國〉一文，此文輯入劉著《正視紛爭下的新疆問題》一書，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 年，頁 33~65。

聽眾。伏願察納微心，不以西遊為念。<sup>5</sup>

但玄奘並不為所動，更告以此行不為供養而來，之所以堅欲西去，只因中國佛經「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懷疑蘊惑，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露不但獨灑於迦維（迦維，係梵語之音譯，指佛祖釋迦牟尼誕生地「迦維羅衛」之省稱），決擇微言庶得盡露於東國（東國，指中國），波崙問道之志（波崙，又作波倫，係薩陀波崙之省稱，是菩薩名，譯為常啼，為求般若七日七夜啼哭之菩薩。），善財求友之心（善財，即佛教中之善財童子，係佛陀弟子，因其出生時，諸種珍寶自然湧出，故有此名，一般訛為散財童子，為觀世音菩薩之脅侍，與龍女合稱金童玉女），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泛養為懷。」（同注5，頁19~20）；高昌王仍欲強行將玄奘留下」玄奘說：「玄奘來者為乎大法，今逢為障，只可骨被王留，神識未必留也。」高昌王仍堅其所持，更增加供養，玄奘乃以絕食以示其西行意志堅不可移，「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同注5，頁20），及至第四天，麴文泰察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禮謝云：『任法師西行，乞垂早食。』」（惙音イメエ、意為停止），乃指佛為誓，並由高昌王之母張太妃出面，使玄奘與高昌王結為兄弟，任由玄奘西去求法，希望回程時到高昌弘法三年，接受供養，但先在高昌停留一個月宣講《仁王般若經》<sup>6</sup>，並在這一個月期間為法師備置西行沿途所需之用品，玄奘同意此項安排，於是在高昌為官民宣講《仁王般若經》，為了能容納更多人聽講，特別搭了一個可容納三百個人的大帳，作為玄奘講經之所，自張太妃以下，高昌王及統師等大臣都來聽講，每到講經時麴文泰都手執香爐親自迎引，玄奘要登上法座時，高昌王低跪為墮（或作蹬），以便於玄奘登上法座，可見其信奉之誠，一個月講經期間，日日如此，麴文泰之按佛於焉可見。

在玄奘講經的一個月間，高昌王命人為玄奘準備法服三十套，又以西域（今中亞）冬季期間風大且寒冷，為玄奘特製面衣（應即面罩）、手衣（手套）、靴、韁等各物，此外，又準備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

<sup>5</sup> 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頁19。

<sup>6</sup> 《仁王般若經》又稱《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是法華宗崇尚的護國三經之一，見維基百科。

疋，足充法師二十年所需，又給馬三十疋、手力二十五人，派高昌殿中侍御史歡信護送玄奘一行到西突厥葉護可汗汗廷，按葉護可汗為西突厥射匱可汗之弟及其繼承人，其汗廷在碎葉城郊（今吉爾吉思斯坦共和國托克馬克附近，相傳有詩仙之稱的李白誕生於此城），葉護可汗又作統葉護可汗<sup>7</sup>，時西突厥汗國統治整個西域；另以果味兩車獻送葉護可汗，在呈可汗書中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婆羅門國（指天竺，即印度），願可汗憐師如憐奴，仍請敕以西諸國給鄖落馬遞送出境。」（鄖落馬，係突厥語 *ulaq* 之音譯，其意為驛馬）；除此之外，又修書二十多封（應為突厥文或粟特文），交玄奘西行經過屈支等二十四國時<sup>8</sup>，交各國王請給予照顧，麴文泰對玄奘法師西行，所做之各項準備，可說是至為周詳，玄奘對高昌王自是深為感激，西行時特致書麴文泰表示感謝，該書以四六對駢體文采極為華麗，《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錄有全文（見該書頁 22~23），此處從略，玄奘自此西行既有足夠馬匹，又有一些服伺人員與足夠的物質，並得到西域各國的照顧，以是順利到達天竺。

### 關於《大唐西域記》

玄奘法師既到天竺，遂展開學習梵文與尋經任務，周遊印度各邦國學習經典，如在磔（磔）迦國「仍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在至那僕底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在闍大闡達那國學《眾事分毘婆沙》……<sup>9</sup> 可說是極為用心，如同海綿般吸收佛學知識，玄奘西行經歷一百多國，其中親見者一百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自唐太宗貞觀三年（西元 629 年）首途西行，至貞觀十九年（西元 644 年）返回長安，頭尾十七年，攜回佛教經論六百五十七部，可說是「大豐收」。

按玄奘之西行，係私自「偷渡」出關，違背當時大唐律法，因此當玄

<sup>7</sup> 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1992 年，頁 284。

<sup>8</sup> 屈支即龜茲（讀若丘慈），在高昌西，或作曲先、庫車，地當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庫車縣。

<sup>9</sup> 參見《大正大藏經》卷五十，但此處係轉引自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頁 102~103。

奘東返到于闐時，立即「使高昌小兒」隨商隊到長安，陳述當年前往天竺求法，及今得返于闐，詳細上表朝廷，此表文情並茂，頗值一讀，茲引錄如次：

沙門玄奘言。奘聞馬融該贍，鄭玄就扶風之師，優生明敏，晁錯躬濟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求，況諸佛利物之玄蹤，三藏解纏之妙說，敢憚塗遙而無尋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無顧身命，遂以貞觀三年四月，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浩浩，陟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峻之塗，熱海波濤之路。始自長安神邑，終於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萬餘里。雖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憑恃威，所至無梗。仍蒙厚禮，身不苦卒，心願獲從，遂得觀者闍崛山，禮菩提之樹，見不見跡，聞未聞經，窮宇宙之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欽思，歷覽周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闐，為所將大象溺死，經本眾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不獲奔馳早謁軒陛，無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sup>10</sup>

玄奘一方面等候朝廷之答覆，一方面在于闐為諸眾講《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以一日一夜的工夫，把這四論宣講完，于闐王及一般道俗歸依聽受，每天均有上千人聽講。經過七、八個月，派赴長安之馬玄智返回于闐，唐太宗降敕曰：

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喜無量，可即速來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經義者，亦任將來，朕已敕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力鞍乘應不少乏，令敦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善於沮沫迎接。

至是玄奘法師欣然啟程東返。按唐廷自攻滅東突厥汗國並捕獲其可汗後，北方已經安然無虞，但卻與西突厥汗國接壤，西突厥控制西域，而唐廷對兩域之地理及各國情況，所知有限，而玄奘遍歷西域各國，可能曾面見西突厥葉護可汗，而此正是唐廷所亟欲知曉之「情報」，以是唐太宗敕書

<sup>10</sup> 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頁122～123

中稱「可速來與朕相見」，對於十七年前偷渡出關之事，已是船過水無痕，隻字不提。

玄奘法師得到大唐皇帝敕書准其返回長安，且派人前來迎接，對之前私自出關有違法紀犯之事，隻字未提，顯然已蒙赦免，自是歡欣不已，於是從于闐王城向東行三百餘里，至罽摩城（此係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稱東行三百餘里，但《大唐西域記》作「東行三十餘里，兩者差距頗大，未省孰是」），至於罽摩城，早於玄奘西行一百多年（西元 519 年），北魏後期之宋雲前往西域時，也曾經過此城<sup>11</sup>，時稱的捍麁城，可能為漢代所稱之扞彌國，但確否仍有待進一步考證，《大唐西域記》稱在罽摩城「有雕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帖同貼），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sup>12</sup>《宋雲行記》也有相同描述（見注 11），可見此一傳記已流傳數百年，可能在伊斯蘭化後，此一傳說自然消失。

此後經尼壤（今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過流沙東至沮末（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縣），再東北行經古樓蘭故地，當時樓蘭故地已是一片廢墟，再東行進入大唐國境沙州（今甘肅省敦煌市），西元 645 年，也即唐太宗貞觀十九年正月，玄奘法師回到長安，次月，玄奘謁見唐太宗，初步寒暄之後，唐太宗最先問的是西域各國的物產、風俗，玄奘對答如流，唐太宗大悅，立即要玄奘將經過西域之見聞撰著成書，「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sup>13</sup>玄奘婉拒了還俗為官之請，但同意將見聞筆之於書，玄奘黠慧過人，自然明白唐太宗的心意與企圖，遂由玄奘及其弟子辨機只用了一年就將往返這十七年的經歷撰就成書，全書共十二卷，其中僅卷一及卷十二部分涉及西域，但為投皇帝之所好，將全書定名為《大唐西域記》，可見其有極高之政治敏感度，可稱得上是睿智天成，由是扭轉了唐代重道教輕佛教的局面。

《大唐西域記》所載西域各國情況，雖僅有一卷半，但對當時西域政治卻有較真實之呈現，此也為唐太宗所急於要知道的「情報」，因此在與玄

<sup>11</sup> 見陽銜之《浴陽伽藍記》范祥雍校注本，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頁 265。

<sup>12</sup> 見《大唐西域記》季羨林等校注本，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頁 1026。

<sup>13</sup> 見《大正大藏經》卷五十，頁 253 中，但此處係轉引自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頁 111。

奘會面之後，即要求玄奘將西行見聞筆記成書。綜觀全書記錄了一百多個「國」（許多只能稱為地方性部落或土邦），文字雖有多寡，但對都城大小、地理形勢、農、商業、風俗、文藝、語言、文學、貨幣、國王及宗教等均有提及，而這些資訊，也都可視為極重要的「情資」，對之後唐朝之經略西域，提供了許多「知彼」資訊，茲以文字為例，《大唐西域記》之記載為：

阿耆尼國：文字取則印度，微有增損。

屈支國：文字取則印度，粗有改變。

跋祿迦國：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少異。

窣利地區：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共流浸廣，粗有書記，堅讀其文，遞相傳授，師資無替。

怖捍國：語異諸國。

覩貨邏國：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右文記漸多，逾廣窣利。<sup>14</sup>

以上所稱窣利地區之文字，就是粟特文，流行於唐時廣義西域昭武九姓諸國，曾隨昭武九姓商賈傳入突厥、回紇；而覩貨邏國也即吐火羅，其語文流行於天山南北兩沿諸綠洲國家，經過許多學者專家研究認為吐火羅語可分為甲、乙（或作 A，B）兩種<sup>15</sup>，玄奘指出覩貨邏文字「逾廣窣利」，這對經略西域，至有助益。

《大唐西域記》所載西域，印度諸事，均極詳實，按印度是個不重視歷史記載的民族，對許多古佛寺建築並未作詳細記載，經過風霜歲月，許多知名古建築，經不起歲月的洗禮已不見蹤跡，而又無文獻記載，使這些曾經在一千多年前知名的佛教勝地，巍峨華麗佛教寺院，形同不曾存在過的虛無之說，所幸《大唐西域記》對這些印度古佛教文化、古佛教寺院（印度已不信奉佛教，大部份改宗印度教，另有頗多穆斯林或其他宗教）均有較詳細記載，如按圖索驥，都能找到這些古建築的遺跡，以是印度史學家阿里（Ali）曾直言：「如果沒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

<sup>14</sup> 見《大唐西域記》以上各國之記載。

<sup>15</sup> 關於吐火羅語文詳情，可參見法人；伯希和，列維著馮承鈞譯《吐火羅語考》，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王欣《吐火羅史研究》，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02年；日人羽田亨著耿世民譯《西域文明史概論（外一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等書。

全完不可能的。」<sup>16</sup>由是可見此書之價值。

《大唐西域記》於十九世紀已有法文及英文譯本，二十世紀初又有英文重譯本，而日本對此書投入更多，計有日譯本及注釋本：堀謙德之《解說西域記》，1912年在東京出版；小野玄妙譯《大唐西域記》，列入日本《國譯一切經》史僧部十六，於1936年出版；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記の研究》上下兩冊，於1942～1943年出版；水谷真成《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大唐西域記》，於1972年在東經出版等；之後德國、蘇聯也譯為德文、俄文出版。此外，若干國家更專門成立對此書之研究會等學術文化研究社團，各國學者皆認為此書涵蓋面既廣，且在敘述上不僅客觀且詳細，近代若干考古學家根據此書之記載，進行考古發掘，往往獲得滿意的結果，可見此書所載除神話傳外，幾皆為事實。中國史傳所載除對開國君王誕生帶有神話色彩外，其他內容大多可信度極高，如《魏書》所載「鮮卑石室」及所鑄刻之祝禱文，一千多年來，由於未能尋找到「石室」，以致有人懷疑《魏書》所載之「鮮卑石室」及祝禱文係屬子虛烏有，及魏收所杜撰者，但1980年大陸考古工作者未文平團隊，在內蒙古自治區鄂倫春自治旗，也即大興安嶺北段發現「嘎仙洞」，就是《魏書》上之「鮮卑石室」，面對嘎仙洞左側石壁鑄刻有文字，與《魏書》所載之祝禱文，幾乎一致，從而可見中國（指歷史、文化上之中國，不指某一王朝或政權）史傳所載內容既廣，可信度也高，美國學者威廉·蒙哥馬利·麥高文（William Montgomery McGovern）在其所著《中亞古國史》（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一書原序中就稱：「中國史料的正確和豐富，可說遠勝其他一切資料的總和。」<sup>17</sup>《大唐西域記》正合於此評價。

## 兩則和親與蠶絲西傳之傳說

《大唐西域記》卷十三《竭盤陁國》，稱此國：

<sup>16</sup> 見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校注前言，頁137。其中提到法顯係西元四世紀末至五世紀時人，於西元399年（後秦姚興弘始元年，東晉安帝司馬德宗隆安三年）從後秦長安到天竺，東返將見聞著為《佛國記》章巽為之校注，題為《法顯傳》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出版。馬歡，係十四至十五世紀時人，為穆斯林，曾三度隨鄭和下西洋，曾到過印度，著有《瀛海勝覽》。

<sup>17</sup> 見麥高文著，章巽譯《中亞古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

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大石嶺，背徒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連屬，川原隘狹。谷稼儉少，菽麥豐多林樹稀，花果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俗無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獷暴，力亦驍勇。……文字語言大同併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sup>18</sup>

查「竭」字音妾，竭盤陀國，據丁謙考證，此地《唐書》作渴盤陀，即塔什庫爾干 Tashqurgan；今為新疆喀什地區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新唐書·西域傳上》作：「喝盤陀，或曰漢陀、日渴館檀、亦曰渴羅陀。」《北史》卷九十七稱：「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嚙噠。」<sup>19</sup>按塔什庫爾干，其中之「塔什」Tash，在突厥語中，其意為「石」，如「塔什干」譯為石國，「庫爾干 Qurgan 意為「塔」或「城堡」，可見竭盤陀是立國於石頭眾多之地。至於「徒多河」就是葉爾羌河，此河源於葱嶺。

另據《新唐書》卷二二一上所載有關此國情形為：

喝盤陀，或曰漢陀、曰渴館檀、亦謂渴羅陀，由疏勒西南入劍來谷不忍嶺六百里其國也。……治葱嶺中都城負徒多河，勝兵千人，其王本疏勒人，……後魏太延中始通中國（太延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第一個年號共六年，西元 435～440 年），貞觀九年（西元 635 年）遣使來朝。開元中（開元為唐玄宗李隆基年號，共 29 年，西元 713～741 年）破平其國，置葱嶺守捉，安西極邊戍也。<sup>20</sup>

對此項史料，法國漢學大師沙畹（Edouard Chavannes）指出其中「徒多河」應為「徒多河」之訛<sup>21</sup>，極是。

《大唐西域記》對當時（玄奘回程時應為西元 642 年左右）竭盤陀國王的描述為：「今王淳質，敬重三寶，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

<sup>18</sup> 見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頁 983。

<sup>19</sup> 見《北史》標點本頁 3232。

<sup>20</sup> 見台灣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新唐書》，1971 年卷二二一上，頁十二背面。

<sup>21</sup> 見沙畹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年，頁 116，注三。

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咀羅。」<sup>22</sup>此處之「至那提婆瞿咀羅」，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作「脂那提婆怛羅」<sup>23</sup>；其實都是梵文 *Cina-devagotra* 之音譯，其意為「中國（*cina*）與天神（*deva*）之種（*gotra*）」，在這國有一則美麗的傳說，在《大唐西域記》中把這則傳說記錄下來，原文如次：

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利刺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巡夜。時經三月，寇賊方靜，欲趣歸路，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迎婦，屬斯寇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也。宜推首惡，或以後誅。」訊問喧譁，莫究其實。時彼侍兜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岸上築宮起館，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主，建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事，子稱尊號。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鄰域異國，莫不稱臣。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奕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逼強國。<sup>24</sup>

《大唐西域記》記下這段傳說，由於沒有具體的時間，缺乏詳細的人物姓氏，因無法推定是那一朝代與波斯（即書中之「波利刺斯國」）和親，這段傳說大意是：中國某朝代與波斯和親，將公主嫁波斯國王（在中外和親史中，中國往往以宮中良家子或宗王之女冒稱公主，甚少以皇帝之女外嫁），按自漢代與匈奴、烏孫和親以來，送親使團、陪嫁財物及陪嫁人員如：服

<sup>22</sup> 見季羨林等校注本頁 984。

<sup>23</sup> 見該書頁 118。

<sup>24</sup> 見季羨林等校注本頁 985

伺之宮女、各類工匠，侍衛人員，總有四、五百人之多，《漢書·西域傳·烏孫》稱：「漢元封中（元封漢武帝年號，西元前 110～前 105 年），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妻烏孫昆莫），賜乘輿服後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sup>25</sup> 從而和親公主之規格，大多類此。傳說中這次嫁波斯王的中原王朝公主，其陪嫁規格也應如是，只是這次迎親使團在西去途經葱嶺時，遇到戰亂，只得將公主暫時安置在一座孤峯上，臨時築一城堡以居公主，三個月後戰亂雖平，公主卻有了身孕，如繼續西歸，必被處死，如留在此地，波斯王也將會派兵前來討伐，不知如何是好，必須查出使公主懷孕之人，但終究未能查出，正在進退兩難之時，和親公主的侍女出來說：這是天神來相會的結果，因每天正午時分，有一男子從太陽中騎馬來與公主相會，因而有孕；迎親使者認為那該如何才好，眾人都說與其西去送死，不如留在此處過一天是一天，於是便在該地石峯上建起周範三百多步的宮室，再圍著宮室建造城池，自成一個政治團體，擁立公主為主，並設官分職、制定法度，屆期公主生下一個男孩，相貌英俊，母親秉政，兒子稱王，傳說他能凌空飛行駕馭風雲，威德播及四方，鄰近諸國莫不向之稱臣。這個國王壽終正寢後，安葬在大山岩的石窟之中，屍體已然風乾，看上去好像一個瘦弱之人，彷彿像睡著的人，人們按時為之更衣，恒常安放香花，由是代代相傳以至於今，由於他們祖先的母親是漢地之人，而父親是日天神於是自稱是「漢日天種」，王族的人容貌像中國人，頭戴方帽，身著胡服。這一段美麗的傳說，很難做詳實的考究，但英國探險家同時也盜竊中國古物的斯坦因（Aurel Stein）曾在新疆塔什庫爾干縣境南部塔格敦巴什河的一條峽谷中發現一座用土磚與松枝相間壘成的古城堡，當地人稱之為「公主堡」（Qiz-Qurghan），傳說是古代一位中國公主遠嫁波斯，特建此堡以保安全<sup>26</sup>，這與《大唐西域記》所載相合。

這個和親公主，在途中有孕，實為整個和親史中所未曾見者，當代大陸學者崔明德曾著有《中國古代和親史》巨著，多達三、四十萬言，出嫁及迎娶之公主，多達數百人<sup>27</sup>，均未提到在前往和親途中懷孕之事。竭盤陁

<sup>25</sup> 見《漢書》標點本頁 3903

<sup>26</sup> 見斯坦因《古代和闐》但此處係轉引自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頁 986～987 注釋。

<sup>27</sup> 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多達 765 頁，在該書後記中曾提到筆者。

國之先係遠嫁波斯之和親公主，因途中有娠，而停留在今塔什庫爾干，與「日天神」會而有孕，產下一子遂成為揭盤陁國之首任君王，像這種非與人配而有孕，在北方遊牧民族中頗為常見，如西元二世中期東漢桓帝劉志時（西元 147～167 年在位）鮮卑族檀石槐崛起，稱雄於北方，其疆域之廣，不亞於匈奴盛時，東漢想封之為王及與之和親以為羈縻，均為所拒，關於檀石槐之出生，據史傳所載有如下一段傳說：

（檀石槐之父）投鹿侯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有子（即檀石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畫行聞有雷震，仰天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姪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sup>28</sup>

鮮卑投鹿侯之妻因吞閃電有孕生檀石槐；再看高句麗之始祖朱蒙誕生之傳說，據《魏書》卷一百《高句麗傳》：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之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尤不食，棄之與豕（豕，音世；即豬），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後棄之野，眾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即河伯之女），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sup>29</sup>

此處稱河伯之女因日影所照而有孕，遂生朱蒙；且看成吉思汗鐵木真的祖先孛端察兒·蒙合黑是如何誕生的：蒙古朶奔·篾兒干其妻為阿蘭豁阿，這對夫妻生有二子，朶奔·篾兒干死後，阿蘭豁阿又生三子，其幼子為孛端察兒·蒙合黑，先前的兩個兒子懷疑孛端察兒是其母阿蘭豁阿與家中僕人有染而生，但阿蘭豁則說：

（你們尚不知道呢！）每天夜裏有個黃白色的人，藉着天窗和門額上露天地方的光（蒙古包頂端有天窗），進到帳裏來，撫摩

<sup>28</sup> 見《三國志》卷三十《烏丸鮮東夷傳》標點本頁 837。

<sup>29</sup> 見《魏書》標點本頁 2213。

我的肚皮；光明滲透了我的腹中。出去的時候，藉著日月的光，儼如（黃狗一般冉冉的飄升著出去了。）你們休造次的亂說！這般看來，顯然是上天的子息！不可比做凡夫俗子；久後他們（指丈夫死後所生的三個兒子）做了萬民的可汗，到那時黑骨頭的凡人纔能理會呢！<sup>30</sup>

這又是藉著光與撫摩肚皮，就能懷孕的傳說，以此看來，竭盤陁開國者之母和親公主，與日天神交而生，在那個時代有此傳說，並不奇怪。

再看另一位與西域綠洲國家瞿薩旦那和親公主的傳說，所謂瞿薩旦那，是《大唐西域記》採用音譯的名稱《史記》作于賓，兩《漢書》、《魏書》、《梁書》、《周書》、《隋書》、兩《唐書》、《北史》，兩《五代史》、《法顯傳》，《洛陽伽藍記》等史傳均作于闐，其地就是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

三藏法師玄奘在取經東返時，曾親臨此國對此國之記載為：

瞿薩旦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壤土隘狹，宜穀稼，多眾菴。出氈氈細氈，工紡績絕紬，又產白玉、鑿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好學典藝，博達技能。眾庶富樂，編戶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儻。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絕紬白氈。儀行有禮，風則有紀。文字憲章，聿遵印度，微改體勢，粗有沿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sup>31</sup>

玄奘法師之所以把《史記》兩《漢書》等史傳所載之于闐，乃是由於此一崑崙山下的綠洲國家自身建國傳說，歷代史傳均未提到此傳說，由是《大唐西域記》之此項建國傳說更顯珍貴，其原文如次：

（瞿薩旦那國）王甚驍武，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昔者此國虛曠無人，毗沙天於此棲止。無憂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被抉目已，無憂王怒譴輔佐，遷其酋豪，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

<sup>30</sup> 見姚崇吾譯註，札奇斯欽校補《蒙古秘史》此書列台灣大學文史哲學第九期 1960 年，第二十一節頁 26。

<sup>31</sup> 見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頁 1001～1002。

牧，至此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譴流徙，居此東界，羣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辭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守？因獵決戰，未盡兵鋒。宜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旗鼓相望。旦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土，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峙其基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剋，自古以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耋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往毗沙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遐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地乳所育，因為國號。<sup>32</sup>

此處所謂「毗沙門天」，原為印度古老之神，佛教創立後，奉為四大天王之一，為守護北方之神，于闐以之為保護神，更自認為是毗沙門天神之後裔：《大慈恩寺三藏法傳》卷五頁 120 對此國記載頗有自相矛盾之處，如「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這兩句自相矛盾，既是毗沙門天之胤，則其先祖就不能是無憂王之太子，當係玄奘弟子慧立、彥悰誤讀《西域記》所致。至於「東土帝子蒙譴流徙」之「東土」，當係中原某王朝，惜未指明何一王朝，難以作進一步之考究，但傳說往往也有幾成可信度，俗云：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顯示于闐與中原或有血胤混融情事，據《周書》卷五十《異域下·于闐國》稱：「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國（指于闐），貌不甚胡，頗類華夏。」<sup>33</sup>

按《周書》為唐·令狐德棻等人奉敕撰著，成書於唐太宗貞觀十年（西元 636 年），其時玄奘法尚在印度，自不可能看到《周書》而令狐德棻更不

<sup>32</sup> 見《大唐西域記》1006~1008。

<sup>33</sup> 見《周書》標點本頁 917。

可能預知其後玄奘會撰著《大唐西域記》，有關於闐部分傳說「東土帝子蒙譴流徙」于闐之事，《周書》與《大唐西域記》兩者有關於闐之記載，完全無關，但說到當時（唐代）于闐人「貌不甚胡頗類華」，與「東土帝子蒙譴流徙」于闐，兩者卻極吻合，華夏血胤西傳，有其可信度。

《大唐西域記》之所以稱于闐為「瞿薩旦那」者，實因其王由毗沙門神像額上剖出，且依靠地上冒起之乳房乳汁餵食始成長，按梵文瞿薩旦那之原讀音應為 Gostana，其意 Go 為乳牛，Gostana 當作「牛地」<sup>34</sup>；伯希和對和闐（按即于闐）一名之含義，曾作如下之解釋：「總之，和闐一名的古音（西元前二世紀）當為 Godan，到公元初又作 Gostana 的，與前一名稱同時存在。二者都為 Go 地（國）之意……」（同注 34）。

在于闐王城東南五、六里處，有麻射僧伽藍（伽藍即佛教寺廟），是先王妃所建造的，以前于闐國沒有桑樹，更不知如何種桑樹，自然也不知怎麼養蠶，曾經派使者向東方的國家（應是中國）求取，可是東方的國家把養蠶和種桑視為機密，不肯給于闐使者，還嚴令邊境關防不得讓蠶桑出境，於是：

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婚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國君應指中國某個王朝的君王），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誠曰：「爾致辭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以持來，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女，指東國的公主），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指蠶卵及桑樹種子），置帽絮中。既至關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桑蠶種子）遂入瞿薩旦那，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葉餌之（餌音飼，意也同）。自是厥後，桑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織。<sup>35</sup>

沒想到一個和親公主竟成了「商業間諜」，私自將禁止出關之桑樹種子及蠶卵藏在帽冠中，偷渡出關到于闐，從此西域有了絲織品，根據吐蕃

<sup>34</sup> 見季羨林等校注之《大唐西域記》頁 1003，之注釋。

<sup>35</sup> 見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頁 1022。

文（即藏文）《于闐國史》也有類似記載，而吐蕃之有文字為時甚晚，是松贊干布迎娶大唐文成公主之後（文成公主嫁吐蕃王松贊干布，事在西元 641 年，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命吞彌桑布扎去印度留學，而後仿梵文創制吐蕃字母<sup>36</sup>，拼寫吐蕃語，按文字從創制到始用並以之記錄史事，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所以《于闐國史》之面世，應晚於《大唐西域記》，因此玄奘法師不可看到《于闐國史》而採用其說，應是于闐自身之傳說；此外，托瑪斯於其《關於新疆的藏文文獻和文書》中稱：

據《于闐國史》云，自 Vijaya-virya 王建立婆摩若僧伽藍以後，連續兩代沒有建立伽藍。其後 Vijaya-java 王從中國娶了一個名叫 Pu-ne-svar（可能來源於梵文的 Punya-isvara，即福德自在的意思）的王女，那個王女在出嫁的時候暗中帶來了蠶種，飼養在名叫 Ma-Za 的地方了。<sup>37</sup>

可惜沒有指這位 Vijaya-java 的于闐王是什麼年代的人，否則就可推測中國是那個王朝。不過在于闐國廢墟今和田地區丹丹烏里克，西元 1900 年十二月，英國人探險家斯坦因曾到丹丹烏里克一座古寺廟廢墟進行考古發掘，存廢墟發掘到一塊版畫，畫中央繪有一個盛裝貴婦坐於其間，貴婦左邊有一人，右邊有二人，這位貴婦，頭戴高冕，女郎跪於兩旁，長方形畫版之一端有一籃，其中充滿形同果實之物，另一端有一多面形之物，左邊之人（應是女侍）左手指向貴婦人之冕，由是對於畫像的意義「恍然大悟」，這位婦人就是嫁給于闐王的和親公主，冕下就是和親公主從中國偷運出境的蠶種，畫版另一端籃中所盛之物就蠶，一端則是紡絲用之紡車，茲將畫版複製貼上<sup>38</sup>。

斯坦因發掘之佛教，寺廟廢應就是《大唐西域記》中提到之麻射僧伽藍，由是益可證明玄奘法師之《大唐西域記》所載之事，大多信而可徵。

<sup>36</sup> 見恰白·次旦平措、諾章·吳堅、平措次仁著，陳慶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許德存譯《西藏通史》，西藏社科院、中國西藏雜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年，頁 79。

<sup>37</sup> 見季羨林等校注本《大唐西域記》頁 1023，注釋文。

<sup>38</sup> 以上文字及圖片見英、斯坦因著，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60~61，按此書早在 1940 年代已翻譯出版，另台灣中華書局也曾出版。又向達（1900~1966 年）係湖南土家族人，為知名之歷史學家。



圖說：在丹丹烏里克發掘而得之公主（傳說中之傳絲種至和闐者）像畫版

### 結語

《大唐西域記》是一部地理、歷史、佛教方面重要著作，但以其文字雖簡潔優美，卻頗艱深，不能算是一部歷史地理佛教方面科普著作或大眾讀物，全書十二卷，對西域之記載僅有一卷半，另十卷半均記載印度各邦國佛教事蹟，可惜印度各民族對歷史觀念淡薄，且印度曾被已突厥化之蒙古巴拜爾所建之莫兀兒王朝統治三百零六年之久<sup>39</sup>，接著又淪為英國殖民地，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於1947年始告獨立，從此才對既往之歷史進行探索，但是許多歷史古蹟已因時代久遠而灰飛煙滅，印度本身又缺乏文獻記載，以致無蹟可尋，不過中國一些向印度取經的佛僧，倒留下了明確的記載詳述古代印度各邦國佛教寺廟之地理方位與佛教情況，如法顯之《法顯傳》、玄奘之《大唐西域記》，慧超之《往五天竺國傳》……等，這給當代印度學界探求古印度史事的絕佳指引，印度知名歷史學家馬宗達（R. C. Majumdar）於其所著《古代印度》（Ancient India）一書中就說：

我們記述的有關曷利沙伐彈那絕大部分事實都來自一個游方僧的驚人的記載，此外這些記載還給我們描繪了一幅印度當時情況的圖畫，這種圖畫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sup>40</sup>

馬宗達對法顯、玄奘、義淨（著有《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北京中華

<sup>39</sup> 關於莫兀兒王朝詳情，可參見劉學銚《君臨印度的蒙古莫兀兒王朝》一文，該文輯入劉著《蒙古論叢》一書頁215~233，該書於1982年由臺北金蘭文化出版社出版。

<sup>40</sup> 引自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卷首《玄奘與“大唐西域記”》頁137。

書局於 1988 年曾出版由王邦維之校注本) 的評論稱：

(他們，指法顯、玄奘、義淨)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相當厚的書，這些書有幸都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並且譯成了英文，三個人都在印度呆了許多年，學習了印度語言，法顯和玄奘廣泛游覽，幾乎游遍全印。在這些方面，他們比希臘旅行家有無可懷疑的有利之處。(同注 40)

要重建印度歷史，《大唐西域記》絕對一部重要的指引。

# 近年出版的涉藏史料：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概述

陳又新  
前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摘要

《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整冊是近年來出版的涉藏檔案，其中包含：（一）達賴坐床經費案 11 件、（二）班禪轉世案 14 件、（三）駐京代表案 48 件、（四）中央與藏局往來函電案 65 件、（五）拉薩小學案 15 件、（六）慶祝蔣主席壽辰 32 件，以上共計 185 件。它是已出版的民國時期涉藏書面檔案文件的極小部分，然有助於補足當時的史實，因此受到重視。

然而，這一批 1940 年至 1949 年間的駐藏辦事處檔案為何未與前已出版的《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一至十四冊同時出版，卻延到十四年後才出版？《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所呈現的主要內容為何？都引人興趣。當然，除了閱讀檔案的出版品，能有所了解外，但卻難以完全說明前述問題。為了敘明這批檔案出版的進程、內容等情況，本文從檔案的蹤跡、檔案的外觀、檔案的內容等三方面概況，略述其來源始末。

**關鍵詞：**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中央、西藏地方、檔案

## 前言

中華民國自在中國大陸建國以來到遷至台灣以前，期間所面臨的內戰、外敵入侵、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等等各方面的挑戰，這段史實也

都記錄在中央與地方、各國勢力的官方或私人相關檔案中。以民國在大陸時期的涉藏檔案而言，除了英國、印度、俄國等國所存的檔案外，主要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主管蒙藏地方興革等事務的蒙藏委員會，以及西藏地方的官方檔案記載文書。在 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6 月間，蒙藏委員會陸續出版《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一) 至 (十四)，共十四冊，引起廣泛關注。時隔十四年，於 2021 年 12 月，文化部出版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 (十五)》一冊，補充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在前者扉頁出版的話裡表示：「2017 年 9 月 15 日蒙藏委員會配合政府組織改造，併入文化部，辦公室於搬遷時，發現有一批 1940 年至 1949 年間的駐藏辦事處檔案，內容包括電報、信件，公文等資料，經比對內容尚未收錄於前十四冊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是以審慎整理編目完成，出版為第十五冊，完整呈現檔案原件樣貌。」<sup>1</sup>

上述的說明，除了宣告蒙藏委員會走入歷史之外，對於這一批 1940 年至 1949 年間蒙藏委員會的駐藏辦事處檔案為何未與前十四冊被同時出版？卻延到十四年後，在蒙藏委員會併入文化部後才得以出版？檔案所呈現的主要內容或重要性為何？都難以在簡短出版的話中敘明，其中所顯現與隱含的意義與內容，更值得深入了解。雖然閱讀出版品能對這批檔案進行了解，但卻無法涵括前述問題的答案。為此，提出這批檔案出版的原由、進程與內容等概況，是為本文撰寫的基本目的。

## 檔案的蹤跡

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即宣示對蒙古地方和西藏地方的主權，對其興革與民族交流等其他有關蒙藏各項事務，一直就有專司單位負責處理。1928 年，蒙藏委員會升格為行政院所屬部會，便有了自己獨立機關與分署辦公，除了分別在蒙古地方和西藏拉薩設立辦事處之外，其主要辦理公務地點，隨中央政府的遷移，與各部門從南京到重慶，再從重慶回到南京，其因辦理公務所需的公文書等檔案的集中與保存，可謂不易。

<sup>1</sup> 海中雄主編，〈出版的話〉，《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 (十五)》，臺北市：文化部，2021。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蒙藏委員會初設置於中央政府所在的台北市外圍泰山疏散辦公室辦公。後陸續遷入台北市中心，分別借用台灣大學位於公館地區獨立三樓平房辦公、經建會所屬位於總統府周邊原美軍顧問團所留寶慶路舊辦公樓、租用位於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忠孝西路一段商業崇德大樓六樓，到 1991 年與大部分中央政府機關遷至現址徐州路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另外，蒙藏委員會在台灣師範大學附近青田街章嘉大師靈骨供奉處逐年進行改建，於 1993 年完成啟用，作為蒙藏文化展示中心與編譯室辦公與圖書收藏處所。自此，蒙藏委員會在台所藏圖書、檔案等分由總務處所屬檔案室與編譯室負責管理保管，而整理泰山疏散辦公室及所存文書檔案也在前述二單位合力進行中。

1988 年，蒙藏委員會在清理泰山疏散辦公室時，發現仍保存有駐藏辦事處相關文書檔案五千二百餘件，<sup>2</sup> 於是自 2003 年，在國史館協助下開始整理編目，最後在 2005 年 3 月至 2007 年 6 月間陸續出版《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一）》至（十四）冊。不過，同屬於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一件由六小包綑成的文書檔案文件，即《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的原件，並未被一併整理出版，而是被專門自其中挑揀出，每小包封面書名六種檔案名稱，合綑成一件，單獨存於藏事處處長室內，直到 2009 年 6 月，這批檔案以密件等級轉存於總務處檔案室。<sup>3</sup> 2017 年 9 月 15 日配合政府組織改造，蒙藏委員會併入文化部，辦公室於搬遷時，發現有一批 1940 年至 1949 年間的駐藏辦事處檔案，即此六包涉藏檔案，開啟檔案公開出版歷程。在沿襲《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一）至（十四）冊出版規格與形式基礎下，由專人小組負責辦理，歷經多次會議討論確定，到原件拆封、逐一編目、拍攝、審校定案、印刷出版等，歷經二年有餘，《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終於在 2011 年 12 月以單冊形式印行出版。

<sup>2</sup> 郭玉琴主編，〈序言〉，《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一）》，臺北市：蒙藏委員會，2025。

<sup>3</sup> 撰者本人曾於 1995 年 6 月至 2002 年 4 月與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6 月，二度擔任蒙藏委員會藏事處處長，多次接觸該批檔案，於 2009 年 6 月辦理退休前，將之簽報歸檔。

## 檔案的外觀

《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整冊中的文書檔案，其原來的樣貌主要來自於六小包文書檔案文件，每一小包皆以牛皮紙資料袋獨立裝存，各資料袋內各以細麻繩將六封牛皮紙袋妥捆為一落，每小包內存以舊式牛皮紙包覆檔案，歸類為六包，每包封面以毛筆書明案件名稱，內頁卷首浮貼一紙，載明案件件數。

六小包中每包內的文書檔案文件，除了紙質因經年代所致而略顯泛黃外，餘皆字跡清晰可辨。由於《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是以原件彩色掃描方式印製，<sup>4</sup>因此很容易辨認文書檔案的一般與其內容外觀。

### 一、一般外觀

經拆封後的六小包涉藏檔案，每包內所含的用紙樣式不一，它的一般外觀包括：1. 公文函紙：為印製完成，印有收發文機關紅線的公文紙。2. 公文函稿紙：為印製完成，印有擬稿紅線各承辦人與最後批示劃格的公文擬稿紙。3. 委員長行轅用箋：吳忠信進藏行轅臨時便條紙，主要為委員長及其秘書所用。4. 行轅便箋：吳忠信進藏行轅臨時便條紙，規格小於委員長行轅用箋，行轅所屬人員皆可取用隨時記錄用箋。5. 駐藏辦事處用箋：駐藏辦事處所屬人員皆可取用隨時記錄用箋。6. 蒙藏委員會便箋：蒙藏委員會所屬人員皆可取用隨時記錄用箋，至裁撤前仍在使用。7. 直行格紙：A4 大小印製完成的直行格紙，作為函稿紙內容文字續頁。8. 橫行格紙：A4 大小印製完成的橫行格紙，作為函稿紙內容文字續頁。9. 西藏函紙：由西藏地方使用的橫式函紙，格式大小不一。10. 電報碼紙：郵電局所拍發電報碼紙。11. 白紙：用以防止前後頁文字印染的空白紙。

六小包內存的涉藏檔案，每包內的使用文字與書寫工具並不一致，包括：正楷漢文、藏文草書、電報編碼、英文、打印文字。書寫工具為毛筆、鋼筆、鉛筆、印刷文字與藏式用筆。

<sup>4</sup> 海中雄主編，〈出版的話〉，《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

## 二、內容外觀

六小包的涉藏檔案中，每包內的內容直觀性質不一，包括：1. 正式公函：政府機關已繕打（或謄寫）使用機關印信，用以敘明機關立場的函文。2. 公文函稿：政府機關內部由初級承辦員，中級初核，上級首長或主官判決，用以敘明機關立場的函文稿，已奉首長或主官核批公文公文稿等公文擬稿流程，尚未繕打（或謄寫）與使用機關印信的公文稿件。3. 電報編碼及譯文：郵電局所拍發電報碼紙及其上的譯文，譯者簽名或章印。4. 漢藏譯文及核批：西藏地方所發函文及其上的譯文，譯者以及核批者的簽名或章印。5. 草稿：尚未經上級批核，辦事員或譯員所草擬或譯出的文件。6. 附件：補充或充實完整函文內容的附屬文件。7. 名冊：補充或充實完整函文內容的附屬名冊以及收支明細等。8. 告示：機關或單位對外界發布的告示或周知內容。9. 浮貼文字：每包檔案名稱首頁的浮貼標明案名文字。10. 電信收發報人注意事項：郵電局例行印製的電信收、發報人注意事項文字。11. 空白紙：用以防止前後頁文字印染的空白紙。

## 檔案的內容

關於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在大陸時期涉藏的文書檔案的出版，已陸續在 1991 年，中國藏學出版社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以重新繕打、合編方式出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1992 年出版《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1993 年出版《黃慕松 吳忠信 趙守鈺 戴傳賢 奉使辦理藏事報告書》、1994 年彙整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蒙藏委員會檔案，出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等等。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間，蒙藏委員會陸續出版《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一）至（十四），共十四冊，引起廣泛關注，至此。民國時期涉藏的中文書面檔案大多呈現。

2011 年出版的《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整冊的內容，雖然不及前述檔案史料的數量眾多與全面，而是數量極少，且多涉歷史片段的細節檔案，但對於上述有關涉藏史料具有補足之處，其中計有：（一）達賴坐床經費案 11 件、（二）班禪轉世案 14 件、（三）駐京代表案

48 件、(四) 中央與藏局往來函電案 65 件、(五) 拉薩小學案 15 件、(六) 慶祝蔣主席壽辰 32 件，以上共計 185 件。

### 一、達賴坐床經費案

達賴坐床經費案只有 11 件，是六小包文書中最少的一部份，是中央政府因應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在拉薩舉行坐床典禮而補助四十萬經費的檔案之一，但卻是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從「國民政府令開：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靈異特著。查係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抽籤，特准繼任第十四輩達賴喇嘛，此令。……其坐床大典所需經費著由行政院轉飭財政部撥發四十萬元，以示優異，此令。」<sup>5</sup>前述經費撥交蒙藏委員會轉發西藏地方，分別知會西藏的攝政熱振圖旦絳白益西杰稱呼圖克圖（*ਸ਼ਿਦਾਚਿਨ੍ਦਿਨਾਂਦਾ* ਸ਼ਿਦਾਚਿਨ੍ਦਿਨਾਂਦਾ ਮਾਂਗਲ ਮਾਂਗਲ ਮਾਂਗਲ ਮਾਂਗਲ，1912-1947）、噶廈，以及駐京辦事處負責人，確保補助四十萬元經費的順利撥出。

中央明令撥發四十萬元作為西藏地方辦理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大典所需經費的時機與數目，正是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奉派進藏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坐床典禮之時。在此之前的 1938 年，西藏地方按照傳統方式，在青海省湟中尋得祁家村（藏名當采（*ਧਾਂਚੈ*））的拉木登珠（*ਲਾਮੁੰਦੁੰਗ*，1935-）為第十三輩達賴喇嘛昂旺洛桑土登嘉措季卓曲傑南嘉（*ਅਨੁਦਾਨੁਦੁੰਗ*，*ਅਨੁਦਾਨੁਦੁੰਗ*，1876-1933）的轉世靈童，引起青海省府馬步芳主席的覬覦，趁機強索經費。在 1938 年 12 月 24 日，由行政院第三九四次會議議決：「(一) 呈請國民政府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主持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事宜 (二) 電請青海省府派員護送格烏昌及西寧靈兒至西藏邊境，並特給旅費五千元。」<sup>6</sup>馬步芳正式向中央表示所核撥的五千元遠遠不足需求，而是：「路費

<sup>5</sup> 海中雄主編，〈趙不廉來電國民政府令青海靈童拉木登珠查係第十四輩達賴喇嘛轉世應即免予抽籤特准坐床經費四十萬元（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六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5。

<sup>6</sup> 中國藏學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行政院為呈請國民政府派員主持十四世達賴轉世並電青海省府護送靈童赴藏事給蒙藏委員會指令〉，1938 年 12 月 24 日，（蒙藏委員會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頁 162。

及到藏交際各費，約需一十萬元，恭請轉請發給，俾得按限起程。」<sup>7</sup> 馬步芳除了向政府索要撥給的靈兒入藏護送費之外，同時直接向西藏尋訪團索要拉木登珠的身價十萬元大洋（හු.අභ්‍යන්තර.ජාති.ප්‍රජා.පා）。尋訪團設法籌錢給付之後，馬步芳更又另外要三十萬元，<sup>8</sup> 尋訪團在無力支付下，設法在當地找到了幾位要經拉薩到麥加（මාගා）朝聖的回教商人（තු.මිධි.ප.කේ.ක්ද.ස.ඩාල.ම්භා）同意借給現款，到了拉薩再償還。

西藏尋訪團在青海接受馬步芳的條件，並未讓中央政府知曉。一直等到拉木登珠安抵西藏之後，被索要鉅款終於公開，並設法籌措還款。此時，也是中央已派出主持靈童坐床典禮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一行已經整裝出發，在經印度前往西藏的路上。吳忠信獲得在拉薩屬員張威白的急電告知後，認為此事關係重大，因而立即回電表示：「所陳青海靈兒用款四十餘萬元擬由中央發還一節，本人可負責向中央請求撥款，藏方勿庸另向英人借款償付。本人明午飛港，一切俟到藏後再面商辦理。按此事關係重大，務望斟酌情形秘密妥善應付為要。」<sup>9</sup>

隨後，吳忠信直接請示蔣介石：「查該員（張威白）電稱各節，如係確實，似應由中央照數償發藏方，以維國家威信。擬請先予批示，以便忠信到藏後有所秉承。」<sup>10</sup>得到的回覆是先入藏查明後再核，<sup>11</sup>且「如果屬確實，自應准由中央以補助靈兒登座大典經費之名義，償付藏方，俾其歸還借款。俟吳委員長查明電告實情，及款項確數後即予撥發。」<sup>12</sup>

<sup>7</sup> 〈馬步芳為請發給護送靈童費用事致蒙藏委員會電〉，1939年6月15日，（蒙藏委員會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200。

<sup>8</sup> 《ଦୂରାଶୀଯୁଦ୍ଧାଦା ବିଦ୍ୟାରଣ୍ୟା》 (《吾土吾民》), Darjeeling: Freedom Press, 1963, p.19.

<sup>9</sup> 〈吳忠信為尋訪靈童用款可向中央請撥勿向英借款償付事致張威白電〉，1939年10月20日，（蒙藏委員會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261。

<sup>10</sup> 〈吳忠信為西藏尋訪靈童用款似應由中央撥發以維國家威信事致蔣介石電〉，1939年10月20日，（蒙藏委員會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261。

<sup>11</sup> 〈蔣介石為西藏尋訪靈童用款待入藏查明後再核之意復張威白事致吳忠信代電〉，1939年10月20日，（蒙藏委員會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262。

<sup>12</sup> 〈蔣介石為尋訪靈童用款待查實後准由中央以補助坐床大典經費名義償付事致吳忠信電〉，1939年10月20日，（蒙藏委員會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262。

對於尋訪團在青海因拉木登珠被索鉅款的額度，根據吳忠信的查實：「茲據負責人員確實報稱，藏方於青海尋覓靈兒時先後付款兩次，第一次由西藏駐京代表自重慶農民銀行兌交馬主席者，計法幣十萬元，又送秘書陳耀堂法幣一萬元；第二次由該省護送靈兒副專員馬輔臣到拉薩檢收者，計大洋三十二萬九千元，折合盧比二十六萬餘元。以上兩項，共為四十三萬九千元。此項已用之款，既經忠信詳查屬實，擬請中央以頒發第十四輩達賴坐床大典名義，特給以法幣四十萬元。」<sup>13</sup> 後經行政院第四五〇次會議，議決通過：由「國民政府頒布明令特准以該靈童拉木登珠繼任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並發給坐床大典經費四十萬元，以示優異。」<sup>14</sup> 該筆經費並由行政院所屬的財政部撥發。<sup>15</sup>

上述由中央以頒發第十四輩達賴坐床大典名義，特給以法幣四十萬元，作為西藏方面償還被馬步芳索要的經費，其後續的撥付，以及藏方如何取得與流向的部分細節，除在此檔案中載明外，也分別在〈駐京代表案〉與〈中央與藏局往來函電案〉中呈現。

## 二、班禪轉世案

班禪轉世案共 14 件，期間集中在 1948 年 9 月 7 日到 10 月 25 日之間，主要是第九輩班禪額爾德尼圖丹曲吉尼瑪（呼·噶·圖·圖·吉·尼·瑪，1883-1937）轉世靈童的認定、坐床等事宜，中央與西藏的噶廈、札什倫布寺往來文書。

1922 年，西藏設立「財產調查辦公室處」後，即向札什倫布寺徵收了

<sup>13</sup> 〈吳忠信為請准拉木登珠中免於掣籤頒發坐床經費事致趙不廉電〉，1940 年 1 月 28 日，（蒙藏委員會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 288。

<sup>14</sup> 〈行政院為請發布明令特准拉木登珠繼任十四世達賴喇嘛並發給坐床典禮經費事致國民政府呈〉，1940 年 1 月 30 日，（國民政府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 289。「案據蒙藏委員會吳忠信拉薩感電稱：據西藏攝政熱振呼圖克圖來函略稱，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轉世一案，…。茲擬擇期夏曆正月十四日（即國曆二月二十一日）舉行坐床典禮轉請中央核奪等情。忠信復查所述靈兒各節均屬確實擬請轉呈國民政府頒布明令特准以該靈童拉木登珠繼任第十四輩達賴喇嘛，並發給坐床大典經費四十萬元以示優異。等情。據此當經提出本院第四五〇次會議，議決：通過，轉呈國民政府頒發明令。」

<sup>15</sup> 〈國民政府特准拉木登珠免予抽簽繼任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及撥發坐床大典經費令〉，1940 年 2 月 5 日，（國民政府檔案），《十三世達賴圓寂致祭和十四世達賴轉世坐床檔案選編》，頁 289。「拉木登珠業經明令特准繼任為第十四輩達賴喇嘛，其坐床大典所需經費，著由行政院轉飭財政部撥發四十萬元，以示優異。」

約 30000 克青稞和 10000 銀幣的年附加稅。<sup>16</sup> 1923 年，頒布〈水豬年法令〉進一步規定札什倫布寺的所有佃戶都必須支應噶廈所派的駒畜等差役，此外也對第九輩班禪的個別親信以親漢罪名進行逮捕，干涉到了札什倫布寺的內部事務。對於拉薩方面的這些舉措，雖然班禪通過多次陳述和解釋，但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均不加理睬，<sup>17</sup>，終於導致 1923 年冬第九輩班禪暫時離開西藏。

班禪從藏北經甘州、涼州到了內蒙古，隨後抵達北京，向大總統曹錕報告了西藏政局和整飭邊防的意見，期間也到山東、南京、上海、杭州、甘肅、青海、東北、內蒙等地傳法講經。1929 年，在南京設立班禪駐京辦事處，之後又在北平、四川、西康、山西、綏遠、青海等地設立辦事處。1931 年，參加國民會議，中央贈予「護國宣化廣慧大師」的稱號。1935 年，第九輩班禪前往青海拉卜楞寺駐錫，並作重返西藏的準備，但卻受到西藏噶廈的多方阻撓，無法成行。1937 年 12 月 1 日，圓寂於青海省玉樹結古寺的甲拉頗章宮。終於 1941 年 2 月 4 日，班禪靈柩運回札什倫布寺建寶塔供養。

第九輩班禪額爾德尼轉世靈童的尋訪、轉世靈童的確定與返回西藏成為焦點。早在 1935 年，國民政府公布了〈管理喇嘛寺廟條例〉八條，<sup>18</sup> 對於藏傳佛教的轉世、任用、獎懲、登記皆由蒙藏委員會負責。1936 年 2 月，蒙藏委員會公布了〈喇嘛轉世辦法〉十三條。其中第三條對於達賴喇嘛或班禪額爾德尼的轉世明定：「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圓寂後，應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備案，由其高級徒眾尋找具有靈異之同年齡幼童二人以上，以為各該喇嘛之呼畢勒罕候補人，報由該管地方最高行政機關，轉報蒙藏委員會查核，分別掣籤。」

1940 年 7 月，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電知：「達賴、熱振卜卦及乃穹降神，均謂班禪已轉生東方，並謂照舊例由班禪屬下人等自行

<sup>16</sup>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110-112.

<sup>17</sup> 《*ཇུང་བ་ཞིང་འཇིག་ཞིང་འཇིག་ཞིང་ལྷ་འཇིག་ཞིང་*》（《天界有寂之頂莊嚴殊勝自在·恩深無比的偉大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傳記大海要略殊勝寶鬘》），Dharamsala : Tibetan Cultural Printing Press , 1984 , pp. 542-543 。

<sup>18</sup> 該〈條例〉於 2003 年 6 月廢止。

尋訪。」<sup>19</sup> 1941年4月，班禪駐京辦事處電以班禪行轅全體同仁一致敦請羅桑堅贊委員（原任班禪駐京辦事處處長）前往青海主持尋訪班禪靈童事宜，經行政院同意並發給旅費後，羅桑堅贊於7月初開始分派人員赴青海、西康、甘肅等各處正式尋訪，至9月間，已訪得身、口、意化身同庚而有靈異者十數人，被迎至塔爾寺再複驗。<sup>20</sup> 為確定人選，1942年2月28日，蒙藏委員會擬定班禪轉世辦法呈報行政院，年3月3日，行政院會議通過：「一、班禪轉世靈童由班禪徒屬尋訪。二、班禪呼畢勒罕候選人，准由西藏宗教首領就班禪徒屬所報中負責認定。三、呼畢勒罕候選人三名決定後，由西藏政府呈報中央派員在拉薩大招舉行掣簽，簽定一名為呼畢勒罕。」<sup>21</sup> 上述辦法除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外，也在中央主導支持下，班禪轉世靈童人選陸續在青海等地區被尋獲。但西藏地方政府表示尋找的方向並不完整，且必須尋得確定分別具有前輩班禪的身、口、意三位轉世靈童後，班禪轉世靈童再送至拉薩掣簽認定。於是再分二路再度尋訪。

<sup>19</sup> 〈藏蒙藏委員會為報羅桑堅贊尋訪靈童經過情形事致行政院呈〉，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五日，（二史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 2807。

<sup>20</sup> 〈藏蒙藏委員會為報羅桑堅贊尋訪靈童經過情形事致行政院呈〉，民國三十年十一月五日，（二史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 2807-2808。

<sup>21</sup> 〈徵認班禪呼畢勒罕辦法〉，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二史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2810。

<sup>22</sup> 〈羅桑堅贊為報在塔爾寺舉行官保慈丹受戒入教儀式事致藏蒙藏委員會代電〉，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三日，（二史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2814。

<sup>23</sup> 〈陳錫璋函許世英關於班禪靈童事藏方有意取消官保慈丹祇迎八宿喇嘛至拉薩刻正籌畫派員迎接（民國三十七年九月三十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24。

在蒙藏地區各大藏傳佛教轉世活佛「電請中央明令公布靈童官保慈丹為第十輩班禪正身，並隆重護送入藏，或援例先在青海塔爾寺坐床派遣大員主持坐床典禮。」<sup>24</sup> 的請求下，中央依據班禪轉世辦法正式明令官保慈丹為班禪轉世靈童，8月20日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正使、青海省省主席馬步芳為副使在塔爾寺主持第十輩班禪額爾德尼坐床典禮，<sup>25</sup> 正當中央政府陸續撤至台灣前夕，班禪額爾德尼轉世案終告落定。

### 三、駐京代表案

駐京代表係指西藏地方駐京的代表，本案共 48 件，期間從 1940 年 9 月 23 日到 1949 年 5 月 6 日之間（1949 年只有五件），主要是當時的西藏駐京代表過世，新任代表就任、離職等相關檔案。

1913年第十三輩達賴喇嘛自印度返回西藏，採取自固政策，以排漢與陳兵在西康地區與中央政府所屬軍隊相抗，自此西藏地方與中央的親密關係難以進展，1928年冬，西藏地方駐五臺山堪布羅桑巴桑（ဆုန်းရွာဝါးရွာရှင်းရာရွာ）奉達賴指示前往南京見蔣介石，羅桑回藏後轉交蔣介石致第十三輩達賴喇嘛的信，開始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接觸的腳步。次年，蔣介石派任北平雍和宮堪布貢覺仲尼（ဗုဒ္ဓကျော်အကျော်ရွာရှင်းရာရွာ）為「赴藏慰問專員」。1931年，西藏地方噶廈正式委派楚臣丹增（ကျော်မြို့ရွာရှင်းရာရွာ）等人到達南京，成立了「西藏駐京辦事處」，作為西藏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聯絡機關。此檔案中呈現的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為格登卻丹（格敦恪典）（ဂုဏ်သွေးရွာရှင်းရာရွာ、ဂုဏ်သွေးရွာရှင်းရာရွာ），1940年9月17日因霍亂病故，除暫由崙珠（ဗုဒ္ဓရွာရှင်းရာရွာ）科長代理外，西藏地方噶廈也另派出具有堪布（အရာရွာရှင်းရာရွာ）（義為經師）、卓尼（ခုရွာရွာရှင်းရာရွာ）（義為知賓）、洛札哇（အုရွာရှင်းရာရွာ）（義為譯師）等資格的堪、卓、洛（အရာရွာရွာရှင်းရာရွာ）三員前往重慶就任。噶廈所任命的西藏駐京辦事處新任代表羅桑札喜（ဆုန်းရွာဝါးရွာရှင်းရာရွာ）、土丹參烈（ဗုဏ်သွေးရွာရှင်းရာရွာ）、圖登生格（ဗုဏ်သွေးရွာရှင်းရာရွာ）三人取道西康前往重慶就任。

<sup>24</sup> 〈行政院為院會決議並呈奉總統明令公布官保慈丹為十世班禪並在塔爾寺坐床事致蒙藏委員會指令〉，民國三十八年六月十一日，（二史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 2837。

<sup>25</sup> 〈行政院抄送關吉玉呈報十世班禪坐床典禮致蒙藏委員會通知〉，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二十日，（二史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 2837。

羅桑札喜等人抵達康定後，即因水土不服滯留當地，同時著手處理中央補助第十四輩達賴坐床典禮法幣四十萬元，在當地大肆蒐購茶葉駄運，<sup>26</sup>並請政府派專人送入西藏地區。<sup>27</sup> 1941年12月，羅桑札喜抵達重慶就任後，曾多次探詢色拉寺及其家屬現況。1942年2月間，西藏加派阿旺堅贊（དྲླྷ རྩླ རྩླ རྩླ རྩླ）到京，為駐京總代表，並兼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sup>28</sup> 於1944年3月間，羅桑札喜即向噶廈告假離職。<sup>29</sup> 西藏駐京代表羅桑札喜棄職原因，與西藏內部政爭息息相關，由於他是由前任攝政熱振所派出身色拉寺的駐京代表，在西康處理中央補助第十四輩達賴坐床典禮法幣四十萬元而購買茶葉駄運進藏者，此對於新任大札（ସ୍ଵାମୀ ଶାକ୍ତି ଦେବାଦେବି）攝政公開反對前任熱振攝政的商賈行為，<sup>30</sup> 透過任命新的噶倫等官員，清理色拉寺內部等手段，以清除前任攝政的勢力。對於出身色拉寺的西藏駐京代表羅桑札喜而言，自是如坐針氈，再以西藏新派由阿旺堅贊擔任駐京總代表，他的去職將是遲早的事。為了得以順利返回西藏，在1945年4月間，羅桑札喜將中央贈給西藏的迫擊砲、機關槍、手槍及所配彈藥如數帶回，並向達賴與攝政稟報，得到了讚許，<sup>31</sup> 結束了其奉派離開西藏，擔任駐京代表的五年餘職涯。

1949 年年間，正當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政權風雨飄搖，準備撤至台灣之際，西藏駐京代表在尚未收到噶廈指令下，自行撤離南京，在 3 月間，已取道廣州抵達印度。<sup>32</sup> 與此同時正值藏曆新年，拉薩也加強管制措施，<sup>33</sup> 真實反

<sup>26</sup> 〈蒙藏會函詢康定西藏駐京代表有關中央補助達賴坐床款項處理情形及各代表近居何處等事（民國三十年六月六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58。

<sup>27</sup> 〈駐京代表電復藏方康定多茶易購但馱運手續耗時因即赴渝請派專人赴康處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59。

<sup>28</sup> 〈行政院頑國民參政會議第三屆第一次大會所作工作報告〉，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史館藏國民參政會議檔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2021-2022。

<sup>29</sup> 〈蒙藏會電駐藏辦事處轉堪窮羅札向噶廈請假一事現不必化錢活動（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83。

<sup>30</sup>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369.

<sup>31</sup> 〈噶廈為贈送武器事謝蔣介石電〉，藏曆木雞年（1945年）四月七日，（西藏館藏原件藏文），《云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2075-2076。

<sup>32</sup> 〈駐藏辦事處函蒙藏會噶夏詢西藏駐京代表返印前逕赴廣州曾否接洽事（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二日）〉，《蔣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88。

<sup>33</sup> 〈蒙藏會致駐藏辦事處通告所轄人民關於藏曆正月十五日晚達賴與攝政打札外出看燈時八角路上居民商號應遵之則（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89。

映出蒙藏委員會與駐藏辦事處在面臨變局下，仍持續關注西藏局勢的發展。

#### 四、中央與藏局往來函電案

中央與藏局往來函電案共 65 件，期間從 1940 年 4 月 20 日到 1944 年 5 月 23 日之間。

自從 1933 年 12 月 17 日（藏曆 10 月 30 日），第十三輩達賴喇嘛圓寂後，西藏地方推出熱振呼圖克圖擔任攝政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的關係日益密切，尤其是在黃慕松組團進藏致祭，隨後成立駐藏辦事處，以及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的尋找、吳忠信組團進藏主持坐床典禮得以順利，而班禪轉世靈童的尋訪方向也得到明確的方向，西藏駐京代表也如期順利更迭。1941 年元月間，熱振呼圖克圖辭去攝政職位，返回熱振寺，在 2 月底（藏曆金蛇年元月初一日），由大札繼任西藏攝政，西藏地方內部的政爭不斷，與中央的建立起的密切關係也受到影響。

1942 年 5 月間，西藏地方掌權者改由大札攝政，包括中央首長：軍委會委員長蔣中正、立法院院長孫科、考試院院長戴傳賢、國民黨主席林森、與西藏地方負責人員往來文件，除了肯定前任攝政熱振的擁護中央之外，也恭賀新任攝政，持續維持關係。1942 年 2 月間，阿旺堅贊擔任為駐京總代表，並兼西藏駐京辦事處處長後，自茲中央與西藏關係日臻密切。<sup>34</sup>阿旺堅贊除曾獲選擔任國民參政會議第三、四屆參政委員，<sup>35</sup>出席會議之外，也向中央爭取贈送西藏「迫擊砲四門，各配彈百發；機關槍八枝，各配彈二千發；手槍十六枝，各配彈百發，堪窮羅桑札西已如數帶回，並向怙主和攝政稟報，均甚喜悅。」<sup>36</sup>

除此之外，這部分檔案也集中在與安欽及其相關人員的往來文書。安欽丹增吉美旺秋（安欽丹增吉美旺秋，1884-1947），曾任札什倫布

<sup>34</sup> 〈行政院頃國民參政會議第三屆第一次大會所作工作報告〉，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史館藏國民參政會議檔案），《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 2071-2072。

<sup>35</sup> 〈國民參政會議西藏參政委員名單〉，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公佈、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公佈，（二史館藏《國民政府公報》），《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 2975。

<sup>36</sup> 〈噶夏為贈送武器事謝蔣介石電〉，藏曆木雞年（1945 年）四月七日，（西藏館藏原件藏文），《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 2975-2976。

## 五、拉薩小學案

拉薩小學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成立的第一所學校，本案共 15 件，期間從 1944 年 3 月 22 日到 1945 年 12 月 30 日之間。

在 1938 年，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在其二樓建立拉薩小學的教室，開始為當地子弟進行語文學習等教育。到了 1941 年，中央批准將該小學正式改名為「國立拉薩小學」，隸屬教育部主管，由蒙藏委員會在拉薩的駐藏辦事處協助，就近督導。

<sup>37</sup> 〈一四二、教育部函駐藏辦事處併案澈查拉薩小學辦理情形暨張致中是否宜於辦學（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164。

<sup>38</sup> 〈一四四、駐藏辦事處就拉薩小學辦理情形調查報告及建議密函（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175。

<sup>39</sup> 〈一五二、教育部復駐藏辦事處有關拉薩小學與札什倫布小學教職員名額事（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187。

<sup>40</sup> 同前註，頁186-188。

## 六、慶祝蔣主席壽辰

慶祝蔣主席壽辰共 32 件，期間從 1946 年 10 月 24 日到 1949 年 5 月 30 日之間。

1945 年，中國對日侵略的抗戰最終勝利，隔年的 1946 年，適逢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的六十歲壽辰，舉國各界進行慶祝活動。遠在西藏地方的拉則薩由駐藏辦事處發動，從會議、捐款購物送壽禮、並於 10 月 31 日當日舉行祝壽典禮與宴客等活動，以表達擁護輸誠之意。辦事處發起的一連串祝壽活動，除了聯繫當地情誼外，計共來自十餘筆捐款名冊，共收到捐獻「藏銀一萬七千六百八十九刀，其中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三刀五刀支付製作金插屏，剩餘二千九百五十五刀五刀。」<sup>41</sup> 其中金插屏及時送至內地作為祝壽禮品，餘款則於 1949 年 5 月 3 日，駐藏辦事處送給拉薩聯歡社用於購置圖書報章。<sup>42</sup>

在駐藏辦事處積極舉辦祝壽活動中，鉅細靡遺的羅列出席活動者、捐獻經額與捐款者名單，參與的主要團體，除了拉薩駐藏辦事處之外，包括了拉薩電台、拉薩小學校、拉薩測候所、北平同鄉會、雲南同鄉會、川幫、回幫以及當地保正。<sup>43</sup> 再從捐款名冊中分為：1. 中央各機關工作人員 31 人、2. ? 人（名冊從缺）、3. 雲南同鄉會 12 人、4. 北平同鄉會 10 人、5. 川籍民眾 89 人、6. 回教民眾 113 人，共計 255 人，<sup>44</sup> 將在拉薩地區的友好藏族關係與來自內地的大部分居民完全暴露出來。

1949 年 7 月，西藏噶廈公開發電中央以：「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戰事正在進行，凡中國政府官員及其軍隊所在地，亦即產生共產主義與動亂。因此，……吾人必須遣走一切可疑之共產黨秘密工作人員，為驗出可疑之共產黨秘密工作人員，不使彼等任何一人喬裝寄跡於西藏。西藏僧俗大會

<sup>41</sup> 〈一八四、興記號列報蔣主席六十大慶各機關團體獻金及捐款收支明細（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239。

<sup>42</sup> 〈一八八、駐藏辦事處函拉薩聯歡社將祝蔣主席壽辰捐獻餘款用於購置圖書報章（民國三十八年五月三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243。

<sup>43</sup> 〈一五九、駐藏辦事處通知拉薩電台及拉薩小學校等蔣主席六十壽辰慶祝典禮於十月三十日上午九時於聯歡社舉行〉，《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198。

<sup>44</sup> 〈一七〇、蒙藏會呈拉薩中央各機關員工、雲南同鄉會、北平同鄉會、川、回民等眾祝蔣主席六十壽辰捐款清冊（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頁 212-219。

特別請求中國代表及其隨員、無線電報員、學校教師、醫院工作者、及其他一切可疑之人，必須在規定期限內，各自回返其原籍。」<sup>45</sup> 此外，「其他還有三、四百人，其中大多部分是漢人，也被朗色寧（Namseling）（時任西藏赤本（tsipon））認定為間諜，被照相和記錄在案，並在驅逐漢人官員的同時，把他們驅逐出西藏。」<sup>46</sup> 可見前述因參與祝壽活動的單位或團體及個人，幾乎被掌握無餘，他們難逃被驅逐出西藏的命運。

綜觀以上六案的文書檔案內容與期間，明確瞭解到：拉薩小學案與慶祝蔣主席壽辰案的檔案是駐藏辦事處所存，其餘四案當屬蒙藏委員會本部所存檔案文書，且各案期間與內容多有集中之處，並非零散或自大量檔案中抽出，係經辦或主管該業務人員，尚未及時將之歸檔，隨中央政府撤出大陸到台者。

### 結語

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十五）一冊，原為蒙藏委員會自大陸攜出的涉藏六小包檔案，從拉薩到重慶，再由重慶遷南京，最後到台灣，它歷經戰亂、機關多次搬遷、輾轉多人之手。由於包裝完整，以及妥善保管，使內含的檔案文書並未流失，且外觀清晰可辨，真實反映當時代政府官員處理公文書流程，而其仍能在蒙藏委員會裁撤後，順利以彩色照相印刷出版，實屬不易，彌足珍貴。

儘管蒙藏委員會在大陸期間施政的檔案大多數仍留在南京，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檔案選編共十五冊的內容，尤其是第十五冊的檔案，多涉當時歷史片段的細節，自都再需補充大量史料，才得以一窺所述案名全案的史實。除了備受矚目的「達賴坐床經費案」與「班禪轉世案」悉依前清傳統慣例，依法辦理之外，數量最多的「中央與藏局往來函電案」與次多的「駐京代表案」，說明了中央積極促進與西藏地方關係發展的進路。屬於駐藏辦事處的檔案：「拉薩小學案」是反映政府對於健全西藏地方教育發展

<sup>45</sup> 〈噶廈為限令中央駐藏人員離藏事致國民政府電〉，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九日，（二史館藏蒙藏委員會檔案原件英文），《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第七冊，頁2938。

<sup>46</sup>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p. 614.

的重視；「慶祝蔣主席壽辰」，則反映了當時人心所向。這些被帶到台灣的歷史片段檔案，都證明了中華民國在堅持西藏是固有領土的前提下，中央與蒙藏委員會積極增進與西藏地方關係的施政史實。



## 書評：劉學銚著《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

### 前言

劉學銚教授，現任中國邊政協會名譽理事長，一貫以教學相長、經常發表新書而蜚聲海峽兩岸。在推出《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2023)之前，曾經出版過《成吉思汗傳略》(1975)、《匈奴史論》(1983)、《鮮卑史論》(1994)、《五胡史論》(2001)、《西夏王朝：神祕的黑水城》(2012)等力作，可說著作等身，筆耕有成。

而在《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這本新書中，劉學銚教授繼《五胡史論》(2001)一書，再度深入詳細談論那個大時代的人事時地物，當然更有其可觀的一面。

### 論述

現在先將這本新書的基本資料做一番簡述，讓讀者對該書有一些初步印象。作者：劉學銚、書名：《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出版社：台灣英文新聞、出版時間：2023/07/01、頁數：406、定價：\$420.00 等。

接著，再將書中各章節內容進行簡要概述，以便讀者能透過這個簡介，從中了解該書的大致內容。

摘要：說明本書的主要內涵。本書從匈奴冒頓單于擊破東胡部落聯盟之後說起，匈奴原本獨強於中國北方，東胡則向東亡匿於今大興安嶺山脈深山密林之中，以鮮卑，烏桓之名為中原所知曉。一直到兩漢擊敗匈奴後，鮮卑、烏桓又漸次南下，西進占有匈奴故地。到東漢中葉之後，鮮卑

出一強大領袖檀石槐，建立了鮮卑大帝國，也從此掀起北方胡族建立政權之先河。及至西晉惠帝時，匈奴遺緒劉淵更起而建立漢魏式政權。在一百多年間諸胡族在中原建立十數個漢魏式政權，最後由鮮卑族拓跋氏所建之「魏」所統一，而與東晉分庭抗禮，甚至成為胡族所建的第一個「正統王朝」。本書所敘範圍，從檀石槐所建帝國到最後盧水胡沮渠氏北涼滅亡的諸胡列國，加以分析描述。

壹、前言：論述華夏與夷狄的區別，以及本書所談論的時空範圍。

貳、鮮卑族的崛起：解釋「鮮卑」的發音及意義，作者認為「鮮卑」是因有族稱而定名為「鮮卑山」，而不是因有「鮮卑山」而定名其族稱。

參、檀石槐與柯比能的鮮卑霸業：分述檀石槐、柯比能如何崛起，以及其霸業內容。

肆、東漢魏晉時胡族內徙：詳述一、匈奴、二、鮮卑各部、三、羯族、四、氐族、五、羌族。六、盧水胡、七、雜胡等各邊疆民族，從東漢到魏晉時期，移居到中原的過程，此處所謂「雜胡」應包括（一）烏丸、（二）稽胡、（三）丁零、（四）契胡等四種。

伍、諸胡列國（上）：一、匈奴系所建政權，包括（一）漢或前趙、漢趙、（二）夏、二、盧水胡所建國度「北涼」、三、羌族所建政權為後秦，後秦在國君姚興的治理下，政治頗上軌道，有以下三項特色，足為典範，即（一）頗重人權、（二）尊尚儒學、（三）提倡佛教。

陸、諸胡列國（中）：細數鮮卑系所建政權，包含一、前燕、二、吐谷渾、三、後燕及北燕、四、西燕及南燕、五、代、六、乞伏氏的西秦、七、禿髮部的南涼等七個。

柒、諸胡列國（下）：論述包含一、氐族所建的國家、（一）李特及其後人所建的成、漢、（二）苻氏的前秦、（三）呂氏的後涼、（四）楊氏的仇池、二、羯族所建的後趙、三、丁零（勒）族翟氏所建魏政權。

捌、諸胡列國時期漢人所建的政權：作者認為，所謂諸胡列國時期，當指匈奴劉淵於西元 304 年建立「漢」為國名的政權開始，到鮮卑拓跋氏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於西元 460 年，將盧水胡沮渠氏、北涼沮渠安周滅亡為止的一百五十六年之間為斷限。不能獨厚胡人所建立的國度，而排斥記述漢人所建立的政權，其中包括一、張氏的前涼、二、李氏的

西涼、三、冉閔的魏等三個政權，都有其可觀之處，不應忽略。

玖、結語：諸胡列國的「時代特色」，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一、諸胡列國是國史上最混亂時代，發生了許多政治上不公平的案例，例如（一）在人事任用上獨厚同族、（二）在民族地位上揚胡抑漢、（三）在法律上輕縱胡人，都使得社會上糾紛四起，動盪不安、二、諸胡列國時期是民族大融合時期，由於遷徙、通婚等因素，使得民族間相互融合，區別愈發不明顯、三、諸胡列國時期是胡漢文化的大融合時期，由於政治制度、宗教、生活習慣、語言的趨同，使得胡漢文化開始兼容並蓄，案例包含（一）在文學上的影響、（二）在佛教上的影響、（三）在音樂上的融合等三方面，都相互間引發顯著的變化，並且匯合成一體。

此外書中還附有一個外篇，寫於 357 至 406 頁，名為：〈中國境內阿爾泰語系各民族紀年方式初探〉，提及中國北方各民族紀年方式，頗為特殊。這個論述與五胡十六國史關聯不大，但對古代「胡人」，也就是現代所說「少數民族」的生活背景，有更廣泛的說明與探討，可當作對邊疆民族有興趣深入研究者的參考資料。

最後，把一些觀察結果，作為劉學銚著《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的書評，約略的分為三點說明如下：<sup>1</sup>

### 一、五胡亂華

劉學銚教授在該書中章節〈壹、前言〉中提到「五胡亂華」一詞，並且加以評述如下：

胡族在國史上既有其重要地位，自有加以探究之必要，尤其既往史傳所稱之五胡十六國史事，更有探究之價值，以往所謂「五胡十六國」，事實上不止匈奴、羯、鮮卑、氐、羌五種胡族，另有盧水胡、稽胡、柔然、高車等胡族，所建之政權也不止十六國；至於所謂「五胡亂華」一詞，尤屬不當。蓋古往今來從無一個律

<sup>1</sup>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於民國 113 年（2024）6 月 1 日（星期六）召開，會議中通過了一項臨時動議：「《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為劉學銚最新編疆史論述，由台灣英文新聞出版，建議請秘書處撰寫書評，刊於中國邊政雜誌以廣週知」。既然有會議決議，基於職責，我當然就得照案執行。

法規定中國大地只能由華夏（或漢人）之族命王稱帝，如有胡族建元立號，則稱之為「亂華」，這是何其不當的詞彙，而且充滿大漢族沙文主義思維，因此本書稱之為諸胡列國較為適宜。如果更進一步看，如所周知土地先乎人類，沒有一個人、一個氏族乃至一個民族到這世界來時，帶來寸土尺地，連一顆泥砂也不曾帶來，土地從來不屬於人，人只是土地的過客，沒有那一塊土地必須屬於某一個民族，試看大漠南北，自秦漢以至清末，先後生息其間的民族有匈奴、鮮卑、柔然、敕勒（高車、鐵勒）、突厥、回紇、蒙古、漢人，何曾為某一民族所獨有？綜上所述，說某地為某民族所有，純屬無稽之談，荒謬之說。<sup>2</sup>

這個論點，貫穿全書，並沒有新潮或高深的理論鋪陳，純粹只是就事論事。所用的說詞，也都是常情常理，看似普通，卻很能發人深省，並突破了以往的窠臼。所謂「以往窠臼」，並非毫無根據的天馬行空。例如劉義棠的經典之作《中國邊疆民族史》，流傳甚廣，就不曾認為所謂「五胡亂華」一詞，有何不當，以致書中屢屢提及該詞，最早的一次如下：

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八〇，吳天紀四年）吳主孫皓（皓）乞降，中國遂又一統。惟武帝才具平庸，缺乏政治見識，晚年又耽於遊宴，以致毫無經國遠圖。武帝崩，子惠帝嗣位，為昏愚之君，賈后又擅政。八王之亂起，晉室國力因之大衰。五胡遂乘機蜂起，終迫晉室南遷，中原為邊疆民族所佔據，是為「五胡亂華」。<sup>3</sup>

「五胡亂華」一詞在《中國邊疆民族史》中多處出現，如 162、166、172 等頁中繼續引用，似乎並不覺得有任何不妥之處存在。

然而對於所謂「晉室南遷，中原為邊疆民族所佔據，是為『五胡亂華』」一事，史家的看法，卻也未曾定於一尊。例如程光裕、王吉林所編著的《中國通史》，就不提常見的「五胡亂華」之說，而是以「五胡十六國時代」

<sup>2</sup> 劉學銚，《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臺北市：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 11 月，初版二刷），頁 10。

<sup>3</sup> 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民 71[1982]，三版（修訂本）），頁 161。又原書中「吳主孫皓乞降」，當為「吳主孫皓乞降」，現已修正如上。

代之：

西晉亡後，宗室琅邪王睿在建康（今南京，原稱建鄴，避愍帝諱改名）即位，開創東晉新局。北方自此出現長期之分裂，至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北涼統一北方為止，前後一百二十餘年間（三一七～四三九），入徙各族紛紛在中國北方建立國家，或大或小，歷時或久或短之二十個胡族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時代。<sup>4</sup>

此外海峽兩岸，對於晉室南遷，中原為邊疆民族所佔據的情勢，也有類似劉學銚教授所發的不平之鳴。例如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黃壽成教授，就曾多次為文指出，所謂十六國北朝時期的「五胡亂華」之說，應當僅是歷史上的一個誤解。黃壽成教授的講法，不只從民族屬性、職官制度上辨識，還從漢文化認同上理解，所謂胡人「亂華」的真相，不過是有人想乘天下大亂情勢，割據一方而已，並非是想以所謂胡人身份乘機消除漢文化：

早在唐代就有人認為十六國時期曾出現過“五胡亂華”的現象，這似乎已成為定論，可是事實未必如此。因為建立前燕、後燕、南燕政權的鮮卑慕容氏等少數族首領具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有的甚至還有著述。前燕、後燕、南燕各政權又多以漢魏舊制為職官制度，至於前燕、後燕政權雖然曾一度實施“一國兩制”，但這只是一項權宜之計，其職官制度仍然是以漢魏舊制為主，匈奴的單于制為輔。此外，鮮卑慕容氏從心理上也認同漢文化，與司馬氏的晉王朝多有聯繫，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宗藩關係。因此說在慕容燕政權時期以鮮卑慕容氏為首的少數族並非是想以所謂胡人身份“亂華”，而只是想乘天下大亂之際割據一方，可見所謂十六國北朝時期“五胡亂華”之說當是歷史的一個誤解。<sup>5</sup>

<sup>4</sup> 程光裕、王吉林編著，《中國通史》（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2013[民102]），頁101-102。

<sup>5</sup> 黃壽成，〈從慕容燕政權看所謂“五胡亂華”之說〉，《社會科學輯刊》（瀋陽市：遼寧社會科學院，2019年5月，03期），頁119。

當然這不是在說，黃壽成教授的講法，較劉學銚教授的論證，更為高明。因為其實劉學銚教授在《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的許多地方，都提到了胡人相當認同漢文化，甚至還致力造成民族、文化上的大融合時期，可知大家的看法其實是相當一致的。這點可以參見劉書第 341 至 353 頁關於文學、宗教、音樂方面具體融合情形，十分簡明扼要，在此就不贅述了。

## 二、五胡十六國

五胡十六國，相互攻伐，垂百餘年之久，而《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一書，對這方面的探討，描述得十分詳細，正是該書優點之一。

以往談這方面的著作很多，劉義棠所著《中國邊疆民族史》裡，有一個「五胡十六國表」，<sup>6</sup>是傳統說法的權威代表，頗具參考價值，現摘錄如下見表一：

表一「五胡十六國表」

順序	族系	國名	建國者	都城	興亡年代	滅其國者
1	漢	前涼	張祚	姑臧（甘肅武威）	301-376	前秦苻堅
2	匈奴	漢趙	劉淵	平陽（山西臨汾）	304-329	後趙石勒
3	氐	成漢	李雄	成都	304-347	東晉桓溫
4	羯	後趙	石勒	襄國（河北邢台縣西南）	319-351	冉魏
5	鮮卑	前燕	慕容皝	龍城（熱河朝陽）	337-370	前秦苻堅
6	氐	前秦	苻健	長安	351-394	西秦乞伏乾歸
7	鮮卑	後燕	慕容垂	中山（河北定縣）	384-409	北燕馮跋
8	羌	後秦	姚萇	長安	384-417	東晉劉裕
9	鮮卑	西秦	乞伏國仁	苑川（甘肅靖遠西南）	385-431	胡夏赫連定
10	氐	後涼	呂光	姑臧（甘肅武威）	386-403	後秦姚興
11	鮮卑	南涼	禿髮烏孤	樂都（青海樂都縣）	397-414	西秦乞伏氏
12	鮮卑	南燕	慕容德	滑臺（河南滑縣）廣固（山東益都縣西北）	398-410	東晉劉裕
13	漢	西涼	李暠	敦煌	400-421	北涼沮渠蒙遜
14	匈奴	北涼	沮渠蒙遜	張掖、姑臧	401-439	北魏拓跋珪
15	匈奴	胡夏	赫連勃勃	統萬（陝西橫山縣西）	407-431	北魏拓跋珪
16	漢	北燕	馮跋	龍城（熱河朝陽）	409-436	北魏拓跋珪

<sup>6</sup> 劉義棠，《中國邊疆民族史》，頁 163-164。

表一「五胡十六國表」，是按照立國年代來排序的。這裡的所說的五胡，即匈奴、羯、鮮卑、氐、羌等五個民族，代表晉朝時曾經統治過北方諸國的各主要邊疆民族。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實際上北方諸國的統治者不只五胡，竟然包含了漢人（包括排序第 1 的前涼、第 13 的西涼、第 16 的北燕等）、丁零人（翟魏，未列在表一之中）、盧水胡匈奴（排序第 14 的北涼）與鐵弗匈奴（排序第 15 的胡夏）等民族。像是表一的排序第 14 的北涼算是屬於泛稱的匈奴族系，但實際上卻是「盧水胡匈奴」。原因是該族原為一支居住在張掖一帶的小月氏人，在被匈奴擊敗後，由匈奴右賢王管轄。而當地有盧水流過，常被漢籍稱為盧水胡或河西胡。盧水胡原隸屬於匈奴，隨著南匈奴歸附漢朝，盧水胡被視為匈奴別部，見表一排序第 14 的北涼。

又鐵弗匈奴即鐵弗部，是漢代末期南匈奴的一個部族，即表一中排序第 15 的胡夏。源起於北方民族稱匈奴父、鮮卑母的人為「鐵弗」，因此而得名。鐵弗部，又稱雜胡，歸屬於泛稱的匈奴族系。

對於東晉時期，由漢人所建立的北方諸國，包括表一中排序第 1 的前涼、第 13 的西涼、第 16 的北燕等國，在劉義棠所著《中國邊疆民族史》裡，詳論一律從缺。推測其原因，不外是這些國度，都是由漢人所建立起來的。而書名《中國邊疆民族史》，理當不能提及漢人政權。因此即使當時晉室南遷，漢人衣冠南渡，中原充斥著胡人，導致前涼、西涼、北燕等國，與其餘由五胡建立起來的諸國，國民屬性差異並不明顯。何況試想前涼建都於姑臧，當今甘肅武威一帶、西涼建都敦煌、北燕建都於龍城，當今熱河朝陽，也就是位於遼寧省朝陽市雙塔區北大街龍城遺址處，這些地點在當年都地處邊陲，與西晉國都洛陽、長安，相距遙遠，不是邊疆又是什麼。但由於建國者是漢人，就一律避而不談，實在讓人感到有些遺憾。

不過這些不足之處，在劉學銚教授所寫《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書中，已經獲得圓滿的解答與補充了。該書的：「捌、諸胡列國時期漢人所建立之政權」項下「一、張氏之前涼」、「二、李氏之西涼」，都列有詳細的說明。前涼部分，從 286 頁至 303 頁，共計 17 頁。西涼部分，從 303 頁至 319 頁，共計 16 頁。對這兩國的介紹，可說相當詳細。這部分資料，在一般通史、民族史書中，是不容易查閱到的，對讀者來說可是意義非凡，彌足珍貴。

至於馮跋所建立的北燕，劉義棠所著《中國邊疆民族史》裡，說馮跋是漢人。然而在劉學銚教授所寫《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書中，馮跋卻是一個鮮卑化的漢人，因此歸類於「陸、諸胡列國（中）鮮卑系所建之政權」，理由詳述如下：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諸胡列國時長樂郡地當今山東省德州市與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市之間），小字乞直伐，應是鮮卑語之音譯，其意已不可解，但可知其已鮮卑化。其先畢萬之後，畢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遂以馮為氏。<sup>7</sup>

由於這裡說馮跋其先畢萬，而畢萬是周文王庶子畢公高的後裔，春秋時期晉國的大夫，因此馮跋的漢人族屬性質是毫無疑問的，《中國邊疆民族史》裡的歸類並無錯誤。只是馮跋已經鮮卑化了，這也是事實。所以說北燕屬於鮮卑系所建之政權，同樣有其道理存在。

此外前涼這個國家，在程光裕、王吉林所編著的《中國通史》中，稱其建國者為張軌，興亡年代是 317-376，與劉義棠所著《中國邊疆民族史》裡的張祚建國，興亡年代是 301-376，不只建國者不同，國祚也相差了 16 年。誰是誰非，想找尋答案，當然又非得到劉學銚教授所寫的書中尋覓不可了。關於前涼的世系，劉學銚教授將之表列如下表二「前涼世系表」：<sup>8</sup>

表二「前涼世系表」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1. 張軌 (301-314)			7. 張祚 (327-355)	
	2. 張寔 (271-320)	4. 張駿 (307-346)	5. 張重華 (327-353)	6. 張曜靈 (344-355)
	3. 張茂 (277-324)		9. 張天錫 (346-406)	8. 張玄靚 (350-363)

從以上表二可以明顯看出，原來前涼的建國者真的是張軌，《中國通史》並沒有說錯。不過張軌可算是西晉朝廷的官員，他於永寧元年（301）

<sup>7</sup> 劉學銚，《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頁 208。

<sup>8</sup> 劉學銚，《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頁 302。又《全晉文·卷一百五十四·前涼》「張天錫」項下：「天錫字公純，小名獨活，駿少子，興寧元年殺嗣主立靚，自立為涼州牧，太和初詔拜大將軍、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在位十三年，為苻堅將姚萇所敗，入秦為侍中比部尚書，封歸義侯，淮肥之役歸國，詔拜散騎常侍左員外，復爵西平郡公，進金紫光祿大夫，隆安中拜廬江太守。」可知原表及頁 301-303 中所有「張天賜」均為「張天錫」之誤，本文表二「前涼世系表」中已予以更正。

被任命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奠定了前涼政權的基礎。其曾孫張祚於和平元年（354）才正式稱帝，相當於東晉永和十年、前涼建興四十二年、代國建國十七年、前秦皇始四年、前燕元璽三年等。張祚改元「和平」建國後，追諡其曾祖父張軌為武王，廟號太祖。《中國邊疆民族史》即以此作為依據，把前涼這個國家的立國者，說成為張祚，看來也是正確的。

### 三、格式探討

文章的格式，是一個作者與讀者溝通的重要管道。如果格式正確，則雙方管道順暢，相互理解，皆大歡喜。否則，可能引起無謂的誤會，那就不是著書立說的本意了。因此這個問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在此也列為讀後書評之一，略加討論，或可以當作以後改進時的參考。

#### 1、引文中的括弧

在劉學銚教授所寫《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中，引文中經常出現括弧，加註了他的評論、註釋。這種風格，是他近來著作的特色。從好處來看，及時評論與註解，可收立竿見影之效，省去一些繁文縟節。現代人講究精簡，或許這麼做，可以投其所好，增加市場價值。

但是從壞處來看，及時評論與註解，會使原文遭到破壞，觸發不必要的誤會，不可不慎。例如匈奴人所建漢趙至劉聰時更張了官制，而有以下句子：

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

（置）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sup>9</sup>

引文中出現括弧「（置）單于左右輔」，相當顯眼。經查《晉書·載記第二·劉聰》項下，各個版本，都沒有「（置）單于左右輔」裡（置）的字樣，而是簡單的「單于左右輔」，可見這是外加的文字。

即使在早期劉學銚教授自己所寫《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書中，相關的引文裡，也沒有「（置）」這個字。當時是這樣寫的：

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

<sup>9</sup> 劉學銚，《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頁 117。

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sup>10</sup>

由此可見，「（置）」字的加入，只是近來一時的心血來潮，甚至並未深思其作用何在，否則上次未加「（置）」字，又做什麼道理講？

不過「（置）」字既然加了下去，在解讀原文上，就會產生一些歧義，這可能是原作者所意料不到的。簡而言之，沒有「（置）」字的《晉書》，可以表示「單于左右輔」是因襲舊制，而非新置。而加了「（置）」字的《晉書》，可能表示「單于左右輔」是一個新制，算是劉聰大定百官時的一種變革。然而有「（置）」字的文本，根本就不是《晉書》的原意。無論怎麼解讀，都有節外生枝，徒增困擾的顧慮。因此建議書寫格式上，需要慎之又慎，避免在引文中使用括弧表達意見，還給引文一個原始的樣貌，以減少引起誤解的機會。

再看一處例子，來自書中章節〈壹、前言〉，所採用《晉書·四夷·北狄·匈奴傳》卷九十七中的一段文字。所說提到漢朝末年，丞相曹操處置胡人的事蹟，其引文如下：

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

建安中（建安係東漢獻帝劉協年號，189—220年在位，建安共二十四年，196—219年），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魏武指曹操，其時曹操，為丞相，魏武帝係曹丕篡漢建立魏政權後，追尊其父曹操為魏武帝，《晉書》稱魏武帝，不妥）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sup>11</sup>

類似文字，同樣是質疑曹丕篡漢後，追尊其父曹操為魏武帝「不妥」的史料，出現在書中章節〈肆、東漢魏晉時胡族內徙〉處，該引文襲自《三國志·魏書》卷二十五《楊阜傳》所載，其文附述如下：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冀縣地當今甘肅天水市西北），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東漢時下辯地當今甘肅省隴南市微縣之西北），太祖（指曹操，按曹操並未稱帝，其太祖之廟號，係曹丕

<sup>10</sup> 劉學銚，《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臺北市：昭明出版社，2005，初版），頁124。

<sup>11</sup> 劉學銚，《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頁11。

篡漢後所追尊者）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楊）阜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指令西安）、扶風、天水（今甘肅天水）界者萬餘戶，…會帝崩（指曹操）。<sup>12</sup>

以上兩段引文，都有作者劉學銚教授的意見，表示該段史料，不該稱呼未曾稱帝的曹操為太祖。其實無論《晉書》或《三國志》，都有其原作者唐朝房玄齡、蜀漢陳壽等人「文責自負」，實在犯不著為古人操心。引文的作用，主旨為討論胡人進入中原的晉朝，而非題外誰是正朔的漢朝。因此在引文中加括弧註解，只會模糊了焦點，並無絲毫益處，或宜適當節制。

## 2、引文的長度

有的引文的長度過長，超過三頁的如頁 141-144、頁 183-185 等。過長的引文同樣會打斷閱讀者的思路，影響著作整體的氣勢。因此建議將長度過長的引文，放置於章節末端附錄中，或許較為適宜。

## 3、索引的使用

索引（Index），又稱引得、通檢、備檢，是一本現代書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索引會把書中的重要詞彙，排序後羅列出來，並附註所處的頁碼，以方便讀者查詢。

新文化運動的奠基人胡適認為「對材料進行索引式的整理，是釋放學者精力的有效辦法。」因此主張：「把一切大部頭的書或不容易檢查的書，一概編成索引，使人人能用古書。」<sup>13</sup> 這種觀念，並非胡適所首創。追究索引的應用，顯然是來自於西洋。因為洋人的書籍，普遍附帶索引，且行之有年。而中文書籍，多尚無此習慣。建議劉學銚教授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踏入更高的境界，在書中建立索引，則讀者、學界幸甚。

其實自從電腦普及之後，建立索引即已經放棄了早期的字卡法。以往曾聽中研院李學智先生說過，早期的字卡索引，一本書的索引片可以裝滿一整個大皮箱，加上人工抄寫、排序，耗費相當驚人。而電腦索引，當然較為節省，但也不是一蹴可幾。困難當然還是會有的，只是在電腦協助之下，已經容易了許多。不過同樣必須經歷不斷的篩選，界定重要詞彙為何，才能達成目標。

<sup>12</sup> 劉學銚，《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頁 78。

<sup>13</sup> 吳家駒，《古籍叢書發展史》（南京市：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第 1 版），頁 134。

建立電腦索引還有一個重要的邊際效應，那就是勘誤。一般電腦排版，常會忙中有錯，經常把字詞搬動離開了原處位置，卻懵然無知。例如本文註 2 的引文中曾提到：「如所周知土地先乎人類，沒有一個人、一個氏族乃至一個民族到這世界來時，帶來寸土尺地，連一顆泥砂也不曾帶來」，這裡的「寸土尺地」，經過打字、排版後，在書中竟然變成了「土寸尺地」，閱讀起來，感覺十分怪異。而劉學銚教授以往文章中，也曾經說過類似言論，所寫的就是正確的「寸土尺地」，<sup>14</sup>因此沒有理由在《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裡出錯，判斷這真是手民之誤。不過話說回來，要是當時設有建立索引的關卡，這個錯誤就可以在「全文索引」時釜底抽薪，經過索引、勘誤、修正，而扳回一城。<sup>15</sup>

#### 4、圖表的定名、編號

圖表的定名與編號，是許多論文中常用的格式。對於文章的指向、標定，精確的定位，幫助甚大。翻閱手頭上劉學銚教授所寫的《西夏王朝：神祕的黑水城》（2012）一書，圖表雖無統一編號，但是卻建有詳細完整的名稱體系。例如隨意找到一個圖案，名稱是：「西夏漢文貨幣，天慶元寶・中國國家博物館」、<sup>16</sup>表格名稱是：「党項或西夏的世系表」等。<sup>17</sup>如此完整的名稱架構，無疑可以避免文章所指含糊的問題。

然而《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無論圖表，不知何故，皆未曾採用定名與編號，讓人略覺遺憾。例如在書中「貳、鮮卑族之崛起」有一幅圖案，下方寫著「石刻真象，已風化的難以辨識，如以手摸尚可能覺得確有字跡。（照片由劉學銚提供）」<sup>18</sup>，觀之卻不像是一個標題。如果要下個標題名稱，或許這張照片應該寫為「鮮卑石室的風化祝文石刻圖」，而非現在這種類似註解的說明文字。

也由於圖表都沒有定名與編號，以致在行文時，時常會遇到所指為何

<sup>14</sup> 劉學銚，〈渤海國概說〉，《渤海與肅慎》（臺北市：台灣英文新聞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5 月，初版），頁 77。

<sup>15</sup> 意思是如果做過「全文索引」，即使連本文所提註 8 中「張天賜」、「張天錫」之誤，也不至於發生了。

<sup>16</sup> 劉學銚，《西夏王朝：神祕的黑水城》（臺北市：風格司藝術創作坊，2012 年 12 月，初版），頁 119。

<sup>17</sup> 劉學銚，《西夏王朝：神祕的黑水城》，頁 208。

<sup>18</sup> 劉學銚，《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頁 39。

的難題，往往只能模糊以對。例如書中「伍、諸胡列國（上）」有一段文字如下：

西元 313 年，晉愍帝司馬鄴即位於長安，劉聰命劉曜及司隸喬智明、武牙李景年等寇長安，晉軍敗績，愍帝逃奔射雁樓，劉曜返平陽，這年有流星，由牽牛星入於紫微，劉聰之后劉氏死，後宮大亂，也就在這一年，劉聰制定官制（見前），確定雙軌政制。<sup>19</sup>

問題出在「劉聰制定官制（見前），確定雙軌政制」的「（見前）」二字。因為在這段文字之前，竟出現了兩個表格，都與「雙軌政制」有關，然而都沒有定名與編號。於是讀者就得花心思去猜測，作者所指的，到底是其中的哪一個表格。經過仔細研判，近處的第 119-120 頁的「諸胡列國大單于雙軌政制比較表」好像不是，而更前面第 118 頁的「匈奴劉氏所建之漢政權胡漢分治表」倒比較接近答案。<sup>20</sup> 但是這也只是猜測，或許兩個表格都對，也說不定。因此沒有圖表名稱與編號，對讀者的閱讀方面，難謂友善。

## 結語

著書立說，頗不容易。常見許多人口才極好，口若懸河，能像瀑布一樣，滔滔不絕。但是下筆時卻有如挑起千斤重擔，寸步難行。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寫論文要心中有譜，得有憑有據，才能千秋萬載流傳，遠非信口開河那麼簡單。

而劉學銚教授，正是那種少說多做的代表。除了教學上課時非說不可之外，劉老平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這種一板一眼的嚴肅態度，使得他能下筆千言，有如行雲流水，順理成章。

常人在八十高齡時，或許已經體力衰退、智力減半。不過劉學銚教授依然身體健朗，能奮力投身筆耕，甚至著作一本接著一本，本本相連到天邊。常聽他說，人不能服老，那是自甘墮落，可見律己甚嚴。尤其他願將

<sup>19</sup> 劉學銚，《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頁 123-124。

<sup>20</sup> 即使這兩個表格，也同樣沒有名稱。所謂「諸胡列國大單于雙軌政制比較表」、「匈奴劉氏所建之漢政權胡漢分治表」都是現在為行文方便，所臨時編訂所加上的。

畢生所學，繼續應用於邊疆史學研究之中。這種精神態度，著實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期望他能在完成《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這本巨作之後，<sup>21</sup> 再度推出新產品。除了嘉惠莘莘學子、社會同好之外，更能讓邊政學繼續閃閃發光。

---

<sup>21</sup> 其實早在民國 112 年（2023）10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當時協會的游麗卿監事為了桃園新楊平社區大學教學需要，千里迢迢，從桃園趕來劉學銚名譽理事長於新店二十張路的住家專訪時，我就曾陪同前往。當時已經得到《諸胡列國史論：五胡十六國史》這本新書，同時也已經拜讀過了。那是該書 2023 年 7 月初版的第一刷。短短時間，至 2023 年 11 月，能連刷兩次，頗不容易。趁此機會，將當時的一些感想，撰寫成書評，可謂借花獻佛，順勢而為。

## 歐亞北部民族葬禮中的斂面、截耳與剪髮

江上波夫著  
已故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朱振宏譯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 一

在歐亞大陸北部民族的葬禮中，送葬者划破自己的臉（譯者案：以下稱為「斂面」）、截耳、剪髮、流血號哭的習俗，自古以來即在東西方文獻中有所記載。

首先，關於匈奴的斂面，《東觀漢記·耿秉傳》記載，東漢的耿秉作為征西將軍贏得南單于的匈奴部眾民心，在他死的時候，出現了：

南單于舉國發哀，斂面流血。<sup>1</sup>

相同的記載，也見於《後漢書·耿秉傳》：

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面流血。<sup>2</sup>

關於突厥的斂面習俗，《北史·突厥傳》記載道：

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斂而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sup>3</sup>

由此可知斂面的細節。《隋書·突厥傳》對此總結為「以刀劃面，血淚交下」。<sup>4</sup>此外，史載唐玄宗在寶應元年（762）過世時，「蕃官斂面割耳者四

<sup>1</sup> 《東觀漢記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卷十〈傳五·耿秉〉，頁355。

<sup>2</sup> 《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卷十九〈耿秉傳〉，頁718。

<sup>3</sup> 《北史》（中華書局，1974年）卷九九〈突厥傳〉，頁3288。

<sup>4</sup> 《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卷八四〈北狄傳·突厥〉，頁1864。

百餘人」，<sup>5</sup> 這裡所說的蕃官，應是指受到唐朝冊封的突厥、回紇者。其次，女真也有斂面的習俗，《遼史·天祚帝紀》記載，天祚帝崩逝時：

女直主（阿骨打）聚眾，斂面仰天慟哭。<sup>6</sup>

看起來女真有斂面的習俗是沒有問題的。另外，南宋末年趙珙在《蒙韃備錄》中提到白韃靼，也就是汪古族時有云：

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為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斂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醜惡，其腮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sup>7</sup>

據此可以推斷，當時的汪古族也是如此，在遭遇到父母之喪時斂面，臉頰上留下刀痕者不少。

另一方面，從羅馬宮廷詩人克勞狄安（Claudian）的詩句中，可以窺見西方匈人（Huns）的斂面：

帶著可怕的傷口，  
他們在粗糙的額頭上斂面，  
為他們被殺害的父母服喪。<sup>(1)</sup>

根據柏郎嘉賓（Plano Carpini）的觀察見聞，高加索西麓的切爾克斯人（Cherkesses, Tscherkessen），據說是薩爾馬提亞人（Sarmatians）的後裔，也有類似的習俗。柏郎嘉賓說，凱爾吉斯人（Kergis）——柏郎嘉賓所說的切爾克斯人——當父母去世時，悲痛欲絕，他們從臉上的兩耳之間剝下一條皮，以示哀悼。<sup>(2)</sup>

<sup>5</sup> 《資治通鑑》（中華書局，1995年）卷二二二〈唐紀三十八〉，肅宗寶應元年建巳月乙卯條，頁7123。

<sup>6</sup> 《遼史》（中華書局，1971年）卷二八〈天祚紀〉，頁332。

<sup>7</sup> 趙珙，《蒙韃備錄·立國》（中華書局，1985年），頁16-1。

<sup>(1)</sup> J. H. McBride, *Barbarian Invasions of the Roman Empire*, Boston, 1926, p.116.

<sup>(2)</sup> E. Risch, Johann de Plano Carpini,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und Reiseberichte 1245-1247*, Leipzig, 1930, s.155. [カルビニ・ルブルク、護雅夫訳，《中央アジア・蒙古旅行記》，桃源社，1970年，頁39]

其次，關於服喪時所進行的截耳，在《梁書·滑國傳》中記載了嚙噠（Ephtalites）的葬禮：

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sup>8</sup>

鄂爾渾碑銘（毗伽可汗碑銘）〔南面第十二行〕在已解讀的部分中，記載了突厥可汗葬禮，小野川秀美寫道：

眾多人民剪髮、〔截〕耳  
bunča budun sačin qulqaqin [……b] ičdi……<sup>(3)</sup>

由此可知嚙噠及突厥之間有截耳的風俗。特別要指出的是，後者在提及截耳時，同時還記載了剪髮。

作為喪葬儀式之一的剪髮習俗，在蒙古北部諾彥烏拉（Noin-Ula）匈奴王侯的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的髮辮（圖1），對此，伊茲（W.P. Yetts）、涂雷維爾（C. Trever）等人推測，送葬者將各自的髮辮剪下並埋葬，是將其作為服喪的一種表現。<sup>(4)</sup>從突厥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此外，從匈奴時期開始就深受北狄影響的于闐國（Khotan），在南北朝時期有斂面和剪髮的葬禮儀式，根據《洛陽伽藍記》所收錄的《宋雲行記》，有如下的記載：

于闐國……居喪者翦髮劈面為哀戚。髮長四寸，即就平常。<sup>9</sup>

在西方也是如此。古代希羅多德（Herodotus）曾記載，當斯基泰人（Scythians）遇到國王的送葬隊伍時，他們割下一隻耳朵、剪掉頭髮、手臂上留下傷痕，並用刀割額頭和鼻子、用箭頭刺穿左臂，這表明他們之間有斂面、截耳、剪髮等喪禮儀式。<sup>(5)</sup>大約在十八世紀初，諾維茨基（G.

<sup>8</sup> 《梁書》（中華書局，1973年）卷五四〈諸夷傳·滑國〉，頁812。

<sup>(3)</sup> 小野川秀美，《突厥碑文訳註》（滿蒙史論叢第四，日滿文化協會，1943年），頁313，註165。但是〈毗伽可汗碑〉的這一部分有缺字，拉德羅夫（W. Radloff）判讀為“*So viel Volk, scene Haare und Ohren……streute aus*”（“*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Erste Lieferung*, St. Petersburg, 1894, s.70）我認為小野川秀美的解釋為更恰當。

<sup>(4)</sup> W. P. Yetts, “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48, p.2; C. Trever,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1924-1925)”, *Memoirs of the Academy of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 III*, Leningrad, 1932, p.11.

<sup>9</sup>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平凡社，1990年）卷五〈城北·聞義里〉，頁266。

Novickiy) 觀察了鄂畢河流域的 斯查克人 (Ostyaks)，他們拔下頭髮，撒在死者身上，並用指甲抓傷臉頰等，類似的葬禮儀式記載。

另外，雖然不屬於歐亞北方民族，但由於同樣是騎馬遊牧民族，因此在社會、文化特徵上與前者有很多共同點的阿拉伯人 (Arabs) 之間，也有同樣的葬禮儀式。據報導，貝都因人 (Bedouin) 的服喪者會抓撓自己的臉 (Jerarrešen wugih)，尤其是死者的姐妹和女兒會剪掉頭髮 (Jekussen râshen)，並將頭髮掛在墳墓上或放在墳墓上。<sup>(6)</sup>

## 二

如上所述，通過文獻與遺物可知，歐亞北方各民族之間自古以來就存在著斃面、截耳、剪髮的喪葬習俗，現在對這些葬禮進行一些考察。

首先，從這些葬禮的施行場所和方式來看，斃面又被稱為劃面，是用刀割傷臉部，但應當注意的是，斃面處通常是在額頭和臉頰等部位。另外，從上述奧斯查克的例子可知，有時也會用手指的指甲完成。此外，從切爾克斯的案例中也可知，有時會剝掉臉部一部分的皮膚而不是割傷臉頰，這些都可以說是斃面的一種變體。

關於截耳，相傳嚙噠和斯基泰人是割掉一隻耳朵，他們向死者表達哀悼的方式就是割掉一隻耳朵，這對我們思考其他歐亞北方民族的情形，可以作為參考。

關於剪髮，像匈奴人和斯基泰人一樣剪掉頭髮的情形是很常見的，但像 斯查克那樣拔掉頭髮，目的似乎沒有太大區別。也就是說，匈奴將髮辮放在死者墳墓中， 斯查克將頭髮撒在死者身上，都是服喪者將自己的頭髮獻給死者。拉施特 (Rashid al -Din) 《史集》(History Collection) 所見察合台汗葬禮的場景中，蒙古族婦女們在棺木前號哭，解開髮辮，雙手捧著，無疑是將頭髮獻給死者的寫照 (圖 2)。

其次，斃面、截耳、剪髮等喪葬儀式，是與死者有怎樣關係的情形下

<sup>(5)</sup> G. Rawlinson, *History of Herodotus*, London, 1875, Vol. III (Rk, Iv.) , p.58 [ヘロドトス、松平千秋訳，《歷史》中，岩波文庫，1972年，頁43]。

<sup>(6)</sup> A. Musil,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Rwala Bedowins”,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riental Explorations and Studies* No.6, New York, 1928, p.671.

舉行？根據上述案例，我們可以大致將其分為兩類關係。亦即：一種是具有血緣的親子關係，諸如《梁書》中的曇嘵、《北史》、《隋書》中的突厥、《蒙韃備錄》中的白韃靼、匈奴、切爾克斯等，都屬於此類；第二種是對上位者，尤其是國君的場合。《東觀漢記》與《後漢書》的匈奴、鄂爾渾碑銘的突厥、《遼史》的女真、希羅多德中的斯基泰等案例，皆屬於此類。這樣看來，在諾彥烏拉墓葬中出土的眾多髮辮中，肯定不僅有作為墓主匈奴王侯的直系後裔供奉的，恐怕也有他們的臣下所獻納的。

再者，斂面、截耳、剪髮這三者之間是否有共存關係？前揭于闐國、奧斯查克、斯基泰的情形，除了可以通過文獻確認其中兩者或三者共存的例子外，對於匈奴，文獻中只提到了斂面，而在諾彥烏拉墓塚的遺物中，則清楚地顯示了他們的剪髮行為；對於突厥，《北史》和《隋書》等中國文獻只有斂面（劃面）的記載，但鄂爾渾碑銘使人們認識到他們存在著截耳和剪髮習俗。根據這些案例看來，歐亞北部民族的喪葬儀式，似乎兩者或三者同時舉行比單獨進行更為常見，其共存關係的存在可以說是毋庸置疑的。

最後，讓我們來思考一下斂面、截耳、剪髮在喪禮中的意義。

在《東觀漢記·鄧訓傳》中，看到了暗示斂面的意義，即下文傳記中記載的：

（鄧）訓病卒，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或以刀自割，  
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皆死耳。」<sup>10</sup>

這裡所說的「以刀自割」，指的是斂面，還是像切腹一樣更加嚴重的自刃，目前還不清楚，但無論如何，服喪時的自殘（mutilation）風俗，可能含有殉葬之意，並成為一種形式化，從他們的話語「我曹皆死耳」不難看出。若是如此，在實行斂面風俗的歐亞北方民族之間，廣泛存在著殉葬的習俗，也就不是巧合了。

他們在葬禮上的殉葬風俗，如《史記·匈奴列傳》中，有關匈奴的相關記載：

<sup>10</sup> 《東觀漢記校注》卷九〈傳四·鄧訓〉，頁295。

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sup>11</sup>

至於突厥，在鄂爾渾碑銘（毗伽可汗碑銘）中有所記載：

當我的長子病歿時，我把郭將軍立為殺人石。<sup>(7)</sup>

這句話暗示突厥可汗之子死亡之際，敵將（郭將軍）被殺，以殺人石（balbal）的身份將其立在墳墓中。關於契丹的殉死之風，流傳著太祖阿保機死後，其皇后述律氏召集難以控制的諸將領，要他們為先帝殉葬，她自己沒有殉葬，而是砍下自己的右臂，作為殉葬的替代品，放入太祖靈柩中的有名的故事。關於蒙古，根據拉施特的記載，在成吉思汗死後，從他的首領和將軍的子女中挑選了四十人，給他們穿上華麗的衣服，戴上珠寶，把他們送到另一個世界繼續侍奉成吉思汗。<sup>(8)</sup> 馬可·波羅（Marco Polo）講述了蒙古諸帝的葬禮儀式，並說當皇帝的遺體送到墓地時，他們的衛兵告訴他們「去另一個世界服侍君主」，並將沿途遇到的人全部刺殺。因此當蒙哥汗的遺骸返回時，被殺害的人數達到了二萬人，是非常大規模的強制殉葬。<sup>(9)</sup> 另一方面，希羅多德記載了關於西方斯基泰的殉葬者，他勒死了他的一個愛妾，把她埋在王公的墳墓裡，同時還埋下了他的捧持杯具者、廚師、傳令、愛馬、黃金杯等。<sup>(10)</sup>

殉葬作為喪葬儀式的一種形式，在歐亞北方民族中相當普遍，如斯基泰人、匈奴人、突厥人、契丹人、蒙古人等，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喪葬期間斂面自殘的習俗在歐亞北方民族中也很常見，這並不是單純的巧合，而是兩者之間存在必然關係，可以支持上述推測，即後者可能源於前者，而將其形式化和儀式化。

這樣看來，諸如斂面這樣的自殘習俗，就是殉葬的形式化，這可能是

<sup>11</sup> 《史記》（中華書局，1995年）卷一一〇〈匈奴列傳〉，頁2892。

(7) 小野川秀美，前揭譯註，頁212。

(8) C. D'Ohsson, "Histoire des Mongoles depuis Tchinguiz-khan jusqu'à Timour Be you Tamerlan", Tome II, La Haye et Amsterdam, 1834, pp.12,13；田中萃一郎 訳補《ドーソン蒙古史》，岩波文庫，下卷，頁16〔ドーソン、佐口透 訳注，《モンゴル帝国史》2，東洋文庫，平凡社，1968年，頁66〕。

(9) H. Yule,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London, 1929, vol. 1, p.246〔マルコ・ポーロ、愛宕松男 訳注，《東方見聞録》1，東洋文庫，1970年，頁147。〕

(10) G. Rawlinson, op.cit., vol.III, pp.59, 60〔松平千秋 訳，《歴史》中，頁43、44〕。

主要的意義，但同時，它還有次要的意義，那就是流血號哭。前揭《東觀漢記》和《後漢書》的〈耿秉傳〉中有「舉國號哭，或至斂面流血」；《北史》、《隋書》的〈突厥傳〉中有「以刀斂面且哭，血淚俱流」或是「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伴隨斂面所形成的血淚交加，加上號哭，作為喪葬儀式的元素被一併記載，恐怕不是沒有意義的。一般認為服喪者將自己的血液獻給死者的風俗，在各個民族中相當普遍，其意義被認為是在死者和生者之間形成了一種肉體的結合（corporal union），或者是為了淨化死亡的污穢。不過，韋斯特馬克（E. Westermarck）將此解讀為復活死者的巫術。他說：「在原始的概念中，血就是生命，接受血液就是接受生命，死者的靈魂渴望活著，因此更喜歡血。」。<sup>(11)</sup> 韋斯特馬克的這種解釋，也適用於歐亞北部民族的斂面。從與斂面同時進行的號哭習俗，可以看作是他們有祝願死者復活的意圖。這種號哭是人類最普遍的喪葬禮儀之一，也是為了將死者的靈魂喚回人間的咒術，正如列維·布魯爾（L. Levy Bruhl）在他的《未開化社會的精神動力》中所描述的，流血號哭無論哪一個都有讓死者復活的巫術意義——至少最初是這樣——後來可能自然而然地被儀式化了。<sup>(12)</sup>

因此，歐亞北部民族諸如斂面的自殘習俗，主要的意義被認為是殉葬的形式化，其次是通過流血號哭，將死者復活的巫術行為禮儀化，痛切地表達哀悼之情。

其次，截耳的意義與斂面的意義大致相同，可以推斷前者是和後者一樣，無非是一種自殘的習俗。另一方面，在嘔噦的案例中，割掉一隻耳朵，這是人世間很常見到的一種暗示，通過用部分代替整體的方式，來簡化犧牲的一種方法，契丹皇后割下一隻手臂放入丈夫的靈柩之中，似乎具有相同的意義。正如泰勒（E. Tylor）所指出的，把手指、耳朵、手臂、頭髮等身體中容易截取的部分切掉，以代替犧牲全身的風俗習慣非常普遍。<sup>(13)</sup> 因此，可以將歐亞北方民族的截耳習俗理解為是源於對死者的犧

<sup>(11)</sup> E. Westermarck,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 vol. I, London, 1924, pp.475, 476; vol. II, London, 1926, p.547.

<sup>(12)</sup> L. Levy Bruhl, *Les fonction mentales dans les sociétés inférieures*, Paris, 1922, pp.360, 364 [ レヴィ・ブリュル、山田吉彦 訳，《未開社會の思惟》下，岩波文庫，1953年，頁108]。

<sup>(13)</sup> E.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 vol. II, London, 1929, pp.300-402.

牲，即殉葬的一種便宜化形式。

最後，剪髮（拔頭髮）也是人類極為常見的喪葬儀式，就像截耳一樣，無非是簡化犧牲的一個例子。頭髮作為頭部的一部分，是靈魂的居所，故特別具有重要性，用剪、拔或剃的方式，將頭髮獻給死者，往往被認為是強烈表示達服喪者將自己獻給死者的行為。<sup>(14)</sup>換言之，這是表明殉葬最簡單的方式。因此，也可以將歐亞北部民族剪髮的例子，看作是一種具有類似原始意義的殉葬儀式。

總結以上關於斂面、截耳、剪髮在歐亞北部民族葬禮中的意義進行了考察，可以說，曾經在他們之間廣泛實行的殉葬習俗，已經變得便宜化和儀式化了。上述三種主要的喪葬儀式是由於他們多年來的殉葬習俗而確立，因此，這三種或兩種儀式經常同時進行也就不足為奇了。這只是表明具有相同意義的喪葬儀式一種重複表現。

〔附記〕在歐亞北方民族之間，斂面等行為除了用於喪葬儀式，還用於其他活動。關於這一點，請參看宮崎市定，〈讀史劄記〉，《史林》第21卷第1號、〈五代軍閥の系統〉，收入《アジア史研究》1，東洋史研究叢刊第四，東洋史研究會，1957年等。本文僅涉及喪葬儀式。

本文出處：收入江上波夫，《江上波夫文化史論集3「匈奴の社會と文化」》，東京：山川出版社，1999年10月，頁311—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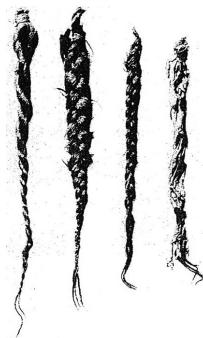


圖1、蒙古北部諾彥烏拉（Noin-Ula）古墓出土的辮髮。



圖2、拉施特（Rashid al-Din）《史集》（*History Collection*）察合台汗葬禮插圖

<sup>(14)</sup> E. Bendann, *Death Customs*, London, 1930, p.94; E. Tylor, op. cit, p.401.

## 《世界史上的中亞：跨越滿洲森林至黑海周緣的四萬年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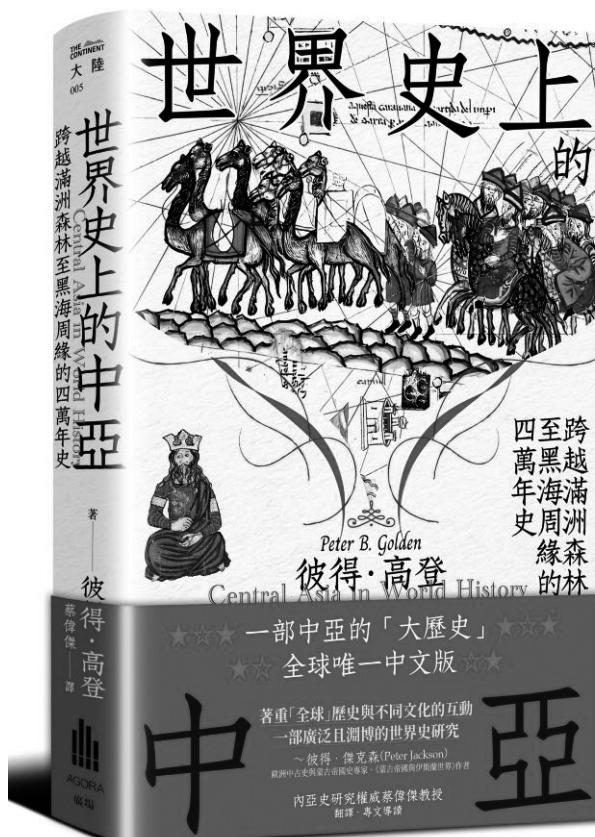
原書名：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

作者：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

譯者：蔡偉傑

出版社：廣場出版

出版日期：2025/01/08





## 譯者導讀：把中亞找回來：重新認識世界史上的中亞<sup>1</sup>

蔡偉傑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中亞是英文 Central Asia 的中譯。狹義上指新近獨立的前蘇聯五個國家：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有時候也會將新疆納入。<sup>2</sup> 然而廣義而言，中亞作為一個地理區域，它占了全球陸地將近七分之一的面積，約八百萬平方英里（合兩千零八十萬平方公里）。

廣義的中亞可以分為東西兩大部分。中亞西部的人群主要是穆斯林，並且由新近獨立的前蘇聯五個國家所組成，包括：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即歷史上所謂的「西突厥斯坦」（West Turkestan）。另外以穆斯林為主的中亞地區還包括了今日中國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亦稱為「東突厥斯坦」（East Turkestan）。位於伏爾加河與西伯利亞西部的森林－草原區也有大量穆斯林突厥人口，其歷史與文化根源則位於中亞。至於中亞東部的主要人口為佛教徒，由蒙古地區（包括被分隔為蒙古國與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與滿洲地區所組成。至於青康藏高原的藏族，儘管在語言上與中亞截然不同，不過在中亞事務上卻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可以被納入廣義的中亞範疇內。這也比較接近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所出版的六卷本《中亞文明史》中對中亞的界定。<sup>3</sup>

相較於東亞或中國在世界史學界中所受到的重視，有關中亞在世界史上的角色一直以來都不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但是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以

<sup>1</sup> 本文部分內容曾刊於〈評 Peter B. Golden, *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全球史評論》第 7 輯（2014 年），頁 292-296，以及〈歐亞歷史上的輻輳之地〉，收入《從馬可波羅到馬戛爾尼：蒙古時代以降的內亞與中國》（新北：八旗文化，2020 年）。

<sup>2</sup> 關於採取這種中亞定義的研究，例如：阿迪卜·哈利德著，黃楷君譯，《被遺忘的中亞：從帝國征服到當代，交織與分歧的中亞近代大歷史》（臺北：時報文化，2024 年）。

<sup>3</sup> 茲傳明等譯，《中亞文明史》，6 卷（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2013 年）。

來，這個問題開始得到注意。例如以研究現代世界體系聞名的德國歷史學家安德烈·貢德·弗蘭克 (Andre Gunder Frank) 就曾經探討中亞的中央性。<sup>4</sup> 他運用世界體系的分析架構，認為在十三世紀成吉思汗至忽必烈汗統治期間的蒙古帝國以及其首都哈刺和林，透過來自周邊文明的貿易與進貢，確實成為了一個世界體系的核心，只是蒙古人無法以其不合適的經濟機制來維持這種核心與邊陲的關係。而十五世紀海權與海上貿易的興起，使得原本的世界體系核心從東方往西方移動，最終使中亞陷入黑暗之中。

另外還有以研究大歷史 (Big History) 聞名的美國歷史學家大衛·克里斯欽 (David Christian)。<sup>5</sup> 他認為內陸歐亞 (Inner Eurasia，約略與中亞重合) 作為一個基於地理學的大型區域，且在歷史上自成一格，因此可以作為世界史分析的單位。他主張內陸歐亞雖然生產力較為低落，但其位於歐亞大陸的中央位置，導致了內陸歐亞社會得以極度集中與動員稀少的資源。然而，如今工業技術的發展已使內陸歐亞位於地理中心的優勢不再，無法彌補其低度生產力的劣勢，也因此內陸歐亞失去了在世界史上作為獨特單位的地位。

前述兩位世界史學者的研究大致上反映了二十世紀八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初期冷戰末期世界史學界如何看待中亞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當時的中亞在共產主義陣營控制下，確實隔絕於外部世界，對於世界史的發展進程影響不大。但是在冷戰結束後，內亞再度向世界開放，在此新局面下，學界又會如何重新估量內亞的歷史地位呢？近來如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教授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 的《絲路上的帝國》便認為，中亞在十八世紀遭到俄羅斯與清朝兩大帝國瓜分後，使得絲綢之路的經濟崩潰，導致中亞陷入貧困與落後。雖然在冷戰過後中亞已經獲得某種程度的獨立，但是仍舊處於政治獨裁與經濟落後的境況。他將此歸咎於蘇聯遺

<sup>4</sup> Andre Gunder Frank, “The Centrality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in History* 8, no. 1 (1992) : 43–97. 中譯參見：安德烈·貢德·弗蘭克著，袁劍譯，〈中亞的中央性〉，《全球史評論》第 11 輯 (2016 年)，頁 16–74。

<sup>5</sup> David Christian, “Inner Eurasia as a Unit of World 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no. 2 (1994) : 173–211. 該作者已有中譯作品包括：王睿譯，《極簡人類史：從宇宙大爆炸到 21 世紀》(新北：遠足文化，2017 年)；拾已安、王若馨譯，《Big History 大歷史：跨越 130 億年時空，打破知識藩籬的時間旅圖》(新北：聯經出版，2018 年)；蔡耀緯譯，《起源的故事》(臺北：馬可孛羅，2019 年)。

產與現代主義。<sup>6</sup> 某種程度上，這種論調仍然暗合前述上個世紀九〇年代以來的看法。

然而針對這個問題，本書《世界史上的中亞》可以作為內亞史學者的另外一種專業回應。本書作者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為美國羅格斯大學歷史系榮退教授，以突厥民族史研究享譽學林。不同於前面三位學者的說法，在這本書中，作者呈現給我們更加豐富的中亞面貌：一個在十五世紀後仍舊作為歐亞貿易樞紐的中亞、一個在美蘇冷戰中仍能獲致社會與經濟進步的現代中亞。以下略述本書各章的梗概。

本書除導言外，正文共分為九章。導言以「民族的層積」為題，說明了中亞的自然與人文地理環境。作者將中亞分為東西兩大部分。中亞西部以中亞五國為主，即歷史上所稱的西突厥斯坦，當地居民主要為操突厥或波斯語的穆斯林；不過中亞穆斯林世界還可以納入今天的中國新疆，即歷史上所稱的東突厥斯坦。而中亞東部則包括蒙古國、中國內蒙古與西藏等地，主要信奉佛教。在語言上，中亞的兩大語系為阿爾泰語系與印歐語系。在歷史上，草原遊牧民與周邊農業國家之間的互動形塑了吾人對中亞的主要知識。而定居社會對於這些遊牧民的歷史記載則充滿了文化偏見。

第一章「遊牧與綠洲城邦的興起」從現代智人（*Homo sapiens*）於距今四萬年前從非洲進入中亞談起，探討中亞的史前史。人類約在西元前 4800 年馴化馬匹，西元前 3700 年掌握騎馬技術，西元前 2000 年遊牧發展成熟。而人類對馬匹的控制加上複合弓的發明，使得騎馬民族取得軍事上的優勢。早期的馬車技術很快就成為明日黃花。動物則是重要的財產與食物來源，其中馬、羊是衡量財產多寡的主要標準，另外還有駱駝、山羊與牛等畜群。遊牧民的領袖一般會設法控制綠洲城市，因為當地的商業與農業能夠為他們帶來食物與稅收，而遊牧民與綠洲城市兩者間有著共生關係。

第二章「早期遊牧民：『明以戰攻為事』」從西元前 3000 至 2500 年間操印歐語的民族在歐亞大陸分為兩支系談起，一支進入中國新疆成為吐火羅人（Tokharians）的祖先，另一支雅利安人（Aryans）則向東進入西伯

<sup>6</sup> Christopher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 12 & Epilogue. 中譯本參見：白桂思著，苑默文譯，《絲路上的帝國：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中亞史》（新北：聯經出版，2022 年），第十二章與尾聲。

利亞、蒙古、中國新疆與巴基斯坦北部。在中亞，操伊朗語的遊牧民被波斯人稱為塞人（Saka），希臘人則稱之為斯基泰（Scythians）。他們以擅長騎射或使用戰車聞名。之後位於蒙古高原的遊牧民匈奴人於西元前三世紀興起，並且與南方的秦漢帝國對抗。而在西元前一世紀的西方，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也逐漸形成。貴霜帝國崇奉祆教與佛教，並且大力支持農業、商業與藝術，融合了印度與希臘羅馬風格的犍陀羅藝術盛行一時。西元 230 至 270 年間，貴霜帝國衰微並被波斯薩珊王朝（Sassanids）取代。在西元四世紀時，後者受到來自北方的匈奴（Huns）襲擊。這個長時段的遷徙也導致了西元 440 年匈奴領袖阿提拉（Attila）入侵羅馬。但無論是匈奴或匈奴，都未能對中國或羅馬造成致命威脅。

第三章「天可汗：突厥與其後繼者」從漢朝與匈奴崩潰後的歐亞局勢談起，提到新興的三大勢力，包括控制中原的北魏拓跋氏、控制蒙古的柔然（即阿瓦爾人），與控制貴霜舊地的嚙噠。這三個國家對整個歐亞產生了漣漪作用。西元六世紀初，柔然的內亂加上鐵勒的反叛成為突厥興起的背景。學界對於突厥的祖源仍舊不太清楚。不過其統治世族名為阿史那，可能源自東伊朗語 *ashsheina* 或吐火羅語 *ashna*，意為藍色，這在突厥以顏色命名方位的傳統（可能借自中國）中有東方之意。在乙息記可汗科羅與木杆可汗的先後統治下，突厥的版圖快速擴張成為史上第一個東起中國東北西至黑海的跨歐亞帝國。而突厥可汗受命於騰格里（Tengri，指上天）的意識形態也成為後世遊牧帝國效法的對象。

第四章「絲路城市與伊斯蘭教的到來」討論的是阿拉伯帝國入侵中亞河中地區以前的絲路城市與貿易。當時控制絲路貿易的商人多半為粟特人（Sogdians），他們多半以家族商號的形式存在，並且在主要城市與地方聚落中設立據點。在中國，許多粟特人也出任官員和將領，或以農夫與牧馬人為業等。其社群領袖被稱為薩寶（*sartapao*，源自梵文 *sârthavâha*，意為商隊領袖）。在當時，諸如塔里木盆地的喀什、焉耆、庫車與和闐等是中亞東部的重要綠洲城市。唐朝與吐蕃雙方都曾試圖控制此處。在中亞河中地區則以花刺子模、撒馬爾罕與布哈拉等為主。當時波斯語成為中亞主要的書面語，但是突厥語則成為重要的共同口頭語。西元十一世紀末編寫《突厥語大詞典》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ûd al-Kâshgharî）就曾經指出，在中亞城市中多數的人口都能使用突厥與粟特雙語。

第五章「新月高掛草原：伊斯蘭教與突厥民族」介紹了突厥帝國崩潰後到蒙古帝國興起以前的中亞情勢。不同支系的突厥民族彼此互相攻伐，也產生了大量的民族遷徙，例如西元八世紀七〇年代被葛邏祿（Qarluqs）逐出中亞河中地區的比千人（Pechenegs）後來被迫遷徙到東歐。另外這個時期是伊斯蘭教從城市傳到草原地區的重要時期，其中波斯的薩曼王朝（Sâmanid）起了重要作用。特別是伊斯蘭教神秘主義的蘇非派（Sufism），由於其形式與突厥傳統的薩滿信仰類似，因此較易被突厥遊牧民接受。而突厥人伊斯蘭化之後則反而逐漸強大，並且控制了原先的伊斯蘭腹地，例如塞爾柱帝國（Seljuk Empire）。

第六章「蒙古旋風」討論的是蒙古如何從一個部族聯盟而發展成為橫跨歐亞的大帝國。成吉思汗憑藉著其伴當（*nökör*，即夥伴）之力於 1206 年統一蒙古各部，並且迫使畏兀兒歸順，征服了西遼、花刺子模，1227 年在遠征西夏時過世，被穆斯林稱為「上帝之鞭」。其子孫延續了其擴張事業，征服了中國、伊朗與俄羅斯。不過後來中亞的蒙古征服者在語言上逐漸被當地的突厥與波斯人同化。蒙古帝國對全球史影響巨大，各種工藝、飲食與商旅都在這個時期產生交流。它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陸上帝國，在歐亞大陸上首次建立了統一的交流管道。部分學者認為這是早期世界體系的開始，也是現代世界的先聲。

第七章「後來的成吉思汗系各支後王、帖木兒與帖木兒帝國的文藝復興」討論蒙古帝國崩潰後在中亞代之而起的帖木兒帝國。蒙古帝國崩潰後，整個中亞在語言上的突厥化與對於成吉思家族後裔的忠誠成為重要特徵。帖木兒（Temür）巧妙利用察合台汗國內部的部族與氏族傾軋，於 1370 年掌握大權。受制於非成吉思汗黃金家族（*altan urugh*）後裔者不得稱汗的原則，他娶了成吉思家族的後裔，並且以駙馬（*küregen*）自居，對穆斯林群眾而言，他則被視為大異密（Great Amîr）。他的勢力從中亞直達印度北部與小亞細亞。其子沙哈魯（Shâhrugh）與其孫兀魯伯（Ulugh Beg）崇奉伊斯蘭教，並且獎掖科學與文藝。天文學、數學、波斯與察合台突厥文學和細密畫等都在這個時期得到發展。另外帖木兒在與鄂圖曼帝國的戰爭中使用了火炮，這也使得火藥在中亞進一步得到傳播。但是當周圍定居帝國的火器技術上日新月異時，中亞卻陷入停滯。這也使得中亞逐漸失去武力優勢。

第八章「火藥時代與帝國崩潰」探討自十六世紀初起，中亞處於周邊帝國的夾縫中，並在競逐過程中逐漸落居下風的過程。在西方，立基於伊朗的薩法維帝國（Safavid Empire）將伊斯蘭教什葉派定為國教，並且切斷了以當時信奉遜尼派的中亞與其盟友鄂圖曼帝國的聯繫。在北方，在征服了金帳汗國的後繼者之一伏爾加汗國後，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立為沙皇（tsar），並視自己為拜占庭皇帝與成吉思汗家族的繼承人以及基督教的保護者。此後俄國的勢力開始進入中亞，並且在中亞傳布東正教。當時中亞的遊牧民正苦於天花與其他疾病肆虐，這也有利於俄國的侵逼。

俄國對中亞的入侵一直到十七世紀後期遭遇由滿洲人建立的清朝才首次受阻。東方的清朝作為藏傳佛教的保護者也正向中亞擴張。另外在這個時代中，蒙古重新信奉藏傳佛教的結果則是造成中亞世界分裂為以穆斯林為主的突厥－波斯世界與以佛教徒為主的蒙古世界。在這個時期，中亞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武力平衡也被逐漸打破。十七世紀中葉，前者的複合弓與後者的火繩槍之間還算平分秋色。但是到了十八世紀中葉，燧發槍已經取得優勢。有些遊牧民拒絕使用槍炮，因為這種武器並不適合其傳統的戰術；有些則願意接受槍炮，但是大部分缺乏量產的工業能力或是足夠的財力來購置。因此總體來說，中亞遊牧民在軍備競賽上逐漸落居下風。到了十九世紀末時，中亞的大部分都已在沙俄與清朝的控制下。

第九章「現代性的問題」從十九世紀初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談起，討論中亞對於外界認識的增長以及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當時俄國治下中亞的哈薩克與布哈拉、浩罕與希瓦三汗國，以及清朝治下的新疆與蒙古，人民的生活條件普遍惡劣，疾病與貧窮困擾著中亞人民。蘇聯成立後，中亞各地紛紛改制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並逐漸演變成今日所見的中亞五國。但是在蘇聯時期所進行的民族識別與國家建構，在中亞傳統的部族與氏族身分上，增加了新的身分認同，在蘇聯解體、中亞五國獨立後仍然持續影響至今。至於在清朝治下的中亞，在清朝崩潰後，外蒙古獨立，成為蘇聯的保護國，於蘇聯解體後放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新疆則被數個軍閥所掌握，直到1949年中國中央政府重新取得控制，但是仍然存在東突厥斯坦分離運動的隱憂。

就本書的特點而言，本書除了引用美國世界史家杰里·本特利（Jerry H. Bentley）、大衛·克里斯欽等人的研究外，似乎也絕少引用世界史學者

的近作，但是這並不表示它自外於新的學術潮流。首先，本書吸納了近年中亞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過去學界認為匈奴與稍早的匈奴之間並無關聯，但是作者指出近二十年來的研究已轉而承認兩者間的關係，並認為是匈奴帝國崩潰後東方遊牧民西遷的結果。

此外，本書也回應了近年來學界對於中亞在近代世界體系中所處地位的爭辯。過去學界認為由於十六世紀歐洲通往東方與美洲的海路貿易發達，加上十七世紀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所造成的氣候變遷與全球危機，導致了中亞的衰退與邊緣化。但本書引用新研究說明近代史上中亞仍然是世界貿易體系的一部分，只是在貨品與通路上有所改變。貨品的流通從過去的東西向改為南北向。中亞成為俄國與中國、印度貿易的中繼站，奴隸、馬匹與毛皮成為主要貨品。但是中亞某些地區確實出現經濟衰退與人口減少的現象，這與沙俄和清朝的侵逼有密切關係，例如哈薩克人與衛拉特蒙古人。據此看來，作者實揭示了這個問題在不同層面上的複雜性。

限於篇幅與作者本人的專業關注，本書在討論西藏在中亞歷史上的影響時，相對而言比較簡略。中文讀者若對這個議題有興趣，可以參考佐藤長、林冠群與王小甫等學者的相關著作。<sup>7</sup> 另外，同樣是近年出版的中亞通史中文作品，還可以參考充滿精美地圖的《全彩圖解中央歐亞史》<sup>8</sup>，以及著重十八世紀中葉以來中亞史的《被遺忘的中亞》<sup>9</sup> 等近作。這些都可以作為本書的延伸讀物。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書先前已有一個繁體中文版譯本，即由李政賢博士翻譯的《一帶一路：帶你走入中亞的歷史》，可惜已不在市面上流通。<sup>10</sup> 新版在翻譯過程中經與作者討論後，修訂了一些英文原版的錯誤，而且增加了作者的中文版序，希望提供一個中文讀者一個更新的選擇。

<sup>7</sup> 林冠群，《唐代吐蕃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2011年）、《玉帛干戈：唐蕃關係史研究》（新北：聯經出版，2016年）；佐藤長著，金偉、吳彥與金如沙譯，《古代西藏史研究》（臺北：新文豐，2019年）；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係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sup>8</sup> 金浩東著，鄒宜矩譯，《全彩圖解中央歐亞史：再現騎馬遊牧民的世界，二千年草原文明演變》（新北：八旗文化，2022年）。

<sup>9</sup> 前揭《被遺忘的中亞》。

<sup>10</sup> 彼得·高登著，李政賢譯，《一帶一路：帶你走入中亞的歷史》（臺北：五南出版，2017年）。

綜上所述，本書可以算是市面上較新近、篇幅最短，且最深入淺出的中亞通史入門書籍，對世界史與中亞史有興趣的學生與社會大眾而言，是不可錯過的好書。

本文摘自廣場出版《世界史上的中亞：跨越滿洲森林至黑海周緣的四萬年史》，導讀，3-18 頁。

## 《蒙古公爵拉爾森（藍理訓）：一位瑞典傳教士的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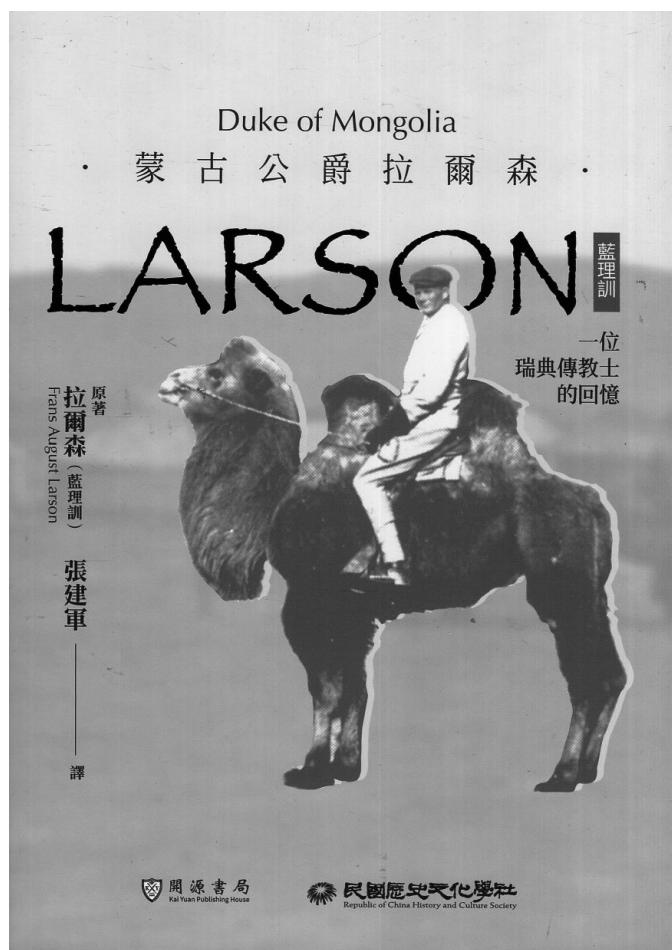
原書名：Larson, Duke of Mongolia

作者：拉爾森（Frans August Larson）

譯者：張建軍

出版社：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4/01/18





## 譯者導言：本書的學術價值及其各種 譯本流變情況

張建軍  
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拉爾森（1870年4月2日——1957年12月19日），瑞典籍傳教士，貧苦佃農出身，自19歲起開始傳教事業，23歲起踏上蒙古高原，進進出出四十多年，將畢生中年富力強的歲月留在了廣袤而美麗的蒙古草原。他「或許是蒙古地區最為年長的外國居民，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最為著名的外國人。在他居住蒙古的41年間，給這裡的許多旗主擔任過顧問職，在1921年被庫倫活佛授予外蒙古公爵之位。」<sup>1</sup>

關於此人的記載，曾有不少文獻提及，唯其名有多種譯法，如拉遜、拉生、拉蓀、拉爾遜、藍理訓、拉爾生等，似不太規範，故本書按拉爾森譯出。關於拉爾森的生平，參見本書所附拉氏生平活動年表。

### 本書的學術價值

拉爾森此書，是作者在蒙古高原生活經歷的追憶和反思，也有他對蒙古社會的認識評價。從內容上看，其學術價值至少有以下幾點：

首先，拉爾森對蒙古社會各種風俗民情進行了詳細的記錄和中肯的解釋。讀者幾乎可以利用文中的一些做法，細膩而逼真地想像出當時蒙古人的生活場景，有一種頗能使讀者身臨其境的極強的畫面感。翻譯過程中，譯者就一些民俗的描寫徵求過民俗學研究者，試圖使譯筆更為當代人理解，但無果而終。由此產生一個想法，拉爾森筆下的蒙古社會風俗在百年

<sup>1</sup> 《內蒙古的未來，難說確定》，《上海泰晤士報》1934年3月13日第4版。

歷史風潮的激盪中漸漸消失。推而及之，當今一些蒙古社會「非遗」項目或許很難言及所謂原生態。

其次，拉爾森一書詳細交代了清末民初蒙古「獨立」過程中的一些重要史事，比較符合當時民初北京政府對蒙政策的實態。我們由此可以更為清晰地理解當時中國政府處理這一邊疆及外交問題的艱難。眾所周知，莫理循是袁世凱著名的外籍政治顧問，知識出版社在1980年代曾出版澳大利亞籍學者駱惠敏所編輯的莫理循書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研究這一時代的重要史料。如果將這一資料集與拉爾森的這一本書進行比對，不難發現，莫理循對於蒙古的看法完全來自拉爾森的判斷。莫理循極力向袁世凱推薦拉爾森，並在給袁世凱親信蔡廷幹的書信中指出，蒙古庫倫當局希望由拉爾森和莫里循作為中俄協議的見證人。（參見該譯本第212、242、279頁）

第三，拉爾森在蒙古高原的長期生活經歷，不僅引起中國北京政府和當時庫倫政權的重視，還引起了西方一些考古學家的青睞。斯文·赫定、安得思等人多次向他提出遠行之約，拉爾森對於考古活動的大力支持，贏得了對方的高度評價。不僅如此，拉爾森還扼要記述了普爾熱瓦爾斯基、科茲洛夫、安特生等在蒙古的考古經歷。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對於我們瞭解當年蒙古高原的考古活動，也有相當裨益。

不僅如此，拉爾森還親身感受了發生在京津地區的義和團運動對北京、張家口一帶的衝擊。拉爾森是一位在政治上不甘寂寞的人，積極參與中俄蒙談判，為中國政府爭取了包括那遜阿爾畢吉呼在內的一些蒙古上層的反正，為儘早結束戰亂和民國的統一做出了一定貢獻。

由上可知，本書具有較高的文獻史料價值，對於今天的我們更好地理解當年蒙古政治與社會風貌，裨益頗多。儘管有些同代人對拉爾森的生活經歷評價頗低，甚至懷疑本書非出自拉爾森本人，歐文·拉鐵摩爾是其中代表性看法。例如，針對拉爾森向蒙古人推廣《聖經》，拉鐵摩爾認為，「蒙古人喜歡買聖經」並非出於宗教虔誠，而是「因為聖經紙厚，很適合做蒙古靴子——『古圖勒』的鞋墊用」。拉鐵摩爾曾向來訪者指認，拉爾森「識字不多，書不是他自己寫的，而是在中國任職的一個英國人的妻子諾拉沃倫根據他的講述以及自己的印象寫成的」，甚至乾脆稱拉爾森為「撞

大運者」。<sup>2</sup>譯者目前尚未找到足夠證據，來評判兩位先輩的是非，但從全書來看，拉爾森的英文水準的確一般，不止一處在敘述邏輯上有跳躍乃至混亂的地方，也無法像很多學者那樣將章節層次分清，在敘述過程中變換主題時，通常以一行空格作為標識，但全書的整體敘述順序是沒問題的。究其原因，也不難理解，正如其後人所稱，英文並非其母語，且拉氏出身貧寒，未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遑論嚴格學術訓練。但他在蒙古高原能活躍數十年，本身就是一種成功，個中原因，絕非所謂「撞大運」所能概括，其對馬匹的熟稔和商業經營，至少與他少年經歷有很大關係。作為研究者，自然不能拿拉鐵摩爾的片面評價，作為臧否拉爾森的依據，否則以莫理循的聰敏，難如彼信賴拉氏。若拉爾森人品低下，豈能在蒙古高原生活數十年之久？！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拉氏後人為抬高其聲譽，稱他為人低調，不與家人提及曾經擁有的「公爵」名號，而書名也是出版商為吸引眼球而加的。其中內情固然無法知曉，但自從其著作出版後，從 1934 年 3 月的兩份英文報紙可知，「拉爾森公爵」、「蒙古公爵」已為當時在華的西方世界所廣知。我們可以這樣推測，或許是《蒙古公爵拉爾森》行銷甚廣，各報記者都有耳聞，或是拉爾森在接受採訪時，常會將其大作示人。

## 本書的出版經過及各種譯本情況

在全書出版以前，拉爾森以文章的形式將書稿的部分篇章投稿於北美著名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該刊於 1857 年創刊於麻塞諸塞州波士頓，以文學、政論為主要欄目。其中，《蒙古的貴族及其婚姻》(刊載於該刊 1930 年第 145 卷 2 月號)一篇由中國學者侯朴譯成中文，發表在著名的上海半月文學刊物《北新》1930 年第 4 卷第 7 期。拉爾森隨後將《蒙古喇嘛》、《馬匹與生意》(Horses and Business) 先後發表在《大西洋月刊》1930 年 3、4 月號。此外，賓秋還將拉爾森對蒙古社會中喇嘛和

<sup>2</sup> 【蘇】馬伊戈爾曼著、陳弘法譯《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紀——二十世紀中葉）》，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92 年，第 258 頁。拉鐵摩爾關於拉爾森的評價，另見 Owen Lattimore, *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15-116.

活佛的描寫，經過翻譯、改寫，以《拉遜氏蒙古社會考察記》連載於《青年進步》1930年第135-136期。遺憾的是，兩篇譯作均為節譯。1930年4月，經《大西洋月刊》組織策劃，《蒙古公爵拉爾森》作為出版叢書之一，由波士頓的小布朗公司和大西洋月刊雜誌社聯合出版。

拉爾森以自己的複雜人生經歷寫就的這本著作，引起了國際上一些學者的注意。1932年土耳其譯本（《蒙古人》）、1936年德文譯本（《蒙古與我在蒙古的生活》）先後問世。1939年11月，日本著名學者高山洋吉將該書翻譯成日文，以《蒙古風俗誌》為書名，經改造社出版。從該書目錄可知，高山將原書各章內容重組，如將第八章「政治史」一章前移至第二章。日譯本的配圖與英文本有所不同，疑為高山自別處選摘，且內容也似較英文本略少，屬於節譯本（英文本僅正文即有296頁，日譯本全書僅267頁）。1997年5月，該日文譯本復由景仁文化社列入《滿蒙地理歷史風俗誌叢書》第191種重印出版。2011年，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將1939年日文譯本列入內蒙古外文歷史文獻叢書之一，影印出版。

1950年，瑞典文譯本《蒙古的悲劇——考查蒙古歷史》在烏普薩拉出版。1952年，又有瑞典文譯本《在蒙古：在狼與土匪中間》問世。2004年4月，《蒙古公爵拉爾森》英文本由Swedish Press再版。2007年，該書以《拉爾森回憶錄》（The Memoir of Frans August Larson）為名，作為蒙古社會專題論文第16期（The Mongolia Society Special Papers Issue 16）出版。拉爾森原著中喇嘛一章，由三卷本《蒙古史》（The History of Mongolia）轉載。該書於2010年，作為亞洲研究系列之一（Global Oriental，2010）出版。據浩尼楚德格日勒圖判斷，該書僅以《蒙古公爵拉爾森》即至少出版過四次。

2015年，蒙古國學者阿·策仁楚倫將該書德文本轉移為基里爾文本，2015年在烏蘭巴托出版。從內容和所配插圖來看，該譯本可能是依據高山洋吉的日譯本轉譯的節譯本。也就是說，日文譯本已屬節譯，基里爾文本內容更簡略。2019年，學者浩尼楚德·格日勒圖以1936年德文譯本為基礎，編譯成蒙古文本的《蒙古與我在蒙古的生活》，由內蒙古文化出版社2019年出版。同年8月，旅居美國的貢楚格·哈斯巴根依據英文原本，由國際蒙古文化研究會出版了《蒙古的拉爾森公爵》，但粗檢個別章節，可知也非全譯。

綜上所述，拉爾森一書自 1930 年出版以來，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雖有多種文本的轉譯，但均為不同程度的節譯本或轉譯本，至今無中文譯本。

海內外對於拉爾森的學術研究尚不多見。目前僅知一本傳記問世。阿克塞爾·奧德伯格 (Axel Odelberg)《拉爾森公爵：探險家、傳教士和商人》(列入瑞典藏書家系列「羅文達爾」書系)，於 2003 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出版，這應是目前國際學術界對於拉爾森的研究最為精細的一部著作。此後，E.O.L Sidenvall 在其著作《瑞典傳教士在中國和蒙古地區的成長》(The Making of Manhood among Swedish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Mongolia, c.1890-c.1914) 中，以「內陸探險者拉爾森」(The Making Of A Domestic Adventurer-Frans August Larson, 1870-1957) 為題，專章描述了拉爾森起伏跌宕的人生 (Brill, 2009)。

衷心希望這本中文譯本的出版，能讓讀者對於當時的蒙古社會有更為深切的理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學術界對於拉爾森本人的研究。

## 譯後記

眾所周知，外蒙古自民初起即與中國政府分分合合，並在 1920 年代後期脫離中國政府的實際控制，但直至 1945 年，蒙古政權當局才在蘇聯史達林的庇佑下，經過「全民公投」正式獨立，國民政府承認了蒙古人民共和國政權。拉爾森是一位瑞典籍的傳教士，固然能夠客觀中立地看待清末民初的蒙古社會，但因與當時很多蒙古上層貴族交往頗多，其政治觀點難免受到這些貴族勢力的影響。雖然拉爾森時代的蒙古並未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仍把蒙古看做一個獨立的區域，因此在原著中多次稱蒙古為一個「國家」。客觀來講，這並非是拉爾森具有明確的政治指向，更多是一種他的主觀認識。

作為一名不懂蒙古語卻時時想學的漢族研究者，在全書翻譯過程中，最犯愁的是遇到諸如蒙古傳統社會生活場景的還原問題，對於百年前草原上的生活，邊翻譯，邊瞭解。特別要值得提到的是，內蒙古圖書館的忒莫勒先生既是本譯本的推薦者，也是本書的第一個讀者，不厭其煩地先後兩次逐字逐句通讀我蹩腳的漢文譯本，提出了許多修改建議，為我隨時答疑

解惑，並撥冗作序，為本書增色不少。本書的翻譯兩度寒暑，甘苦自知。但譯稿中可能還有一些硬傷，都是我的過失。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在最大程度上還原了拉爾森原著的本來面貌。原書並無注釋，譯者在若干處酌加注釋說明，目的是為讀者閱讀提供方便，或糾正原文的一些瑕疵，或增加內容的可靠性。

本書的翻譯過程中，還得到不少前輩和友人的幫助，他們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前社長王凱先生、編審張昱先生、內蒙古大學周太平教授、復旦大學陳曉偉教授、內蒙古師範大學的海阿虎博士與謝詠梅教授、美國德拉瓦大學王元崇教授、深圳大學蔡偉傑教授，以及臺北未曾謀面的那婉君小姐，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衷心感謝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對本書的認可和接納。俗話說，醜媳婦終究是要見公婆的。希望本書的讀者不吝賜教。

## 序

忒莫勒  
內蒙古圖書館研究館員

初聞拉爾森其人及其《蒙古公爵拉爾森》一書，是在 30 多年前的課堂上。記得授課老師對拉爾森的書評價不高，認為以一個普通的外國傳教者和生意人的身份，他似乎不可能與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蒙古上層有深入的交往，以及受中華民國政府的重視和聘用，他很可能是在吹牛，因為書中所說的不少人和事都無從查證。我對這種看法有些懷疑：首先，拉爾森在蒙古地方生活了 40 餘年，應該對蒙古人及其社會有深入的瞭解，其書至少在反映當時蒙古社會和蒙古人生活狀況方面具有重要的價值；其次，此書是在其去世 25 年前問世的，若是不實之作，不僅有悖於他的宗教信仰，也會給他的名譽和事業帶來致命的傷害；再次，在許多史料、尤其是原始檔案尚無法看到的情況下，所謂無從查證也是自然的，不足以作為懷疑的理由。何況我發現，當時國內學者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對外人的著作多持差評，因為他們的記述或看法往往與國內主流思想有異。

多年來，我對拉爾森一直有所關注，通過他的老朋友、著名的探險家、誠實的斯文·赫定先生的著作，瞭解到拉爾森的性格、人品和行事風格：「拉爾森不會得意忘形，他不會講一句不友好的話，他總是心情愉快、友善待人。他什麼時候都不會失去自控，因為他深知，控制不了自己的人永遠也不可能控制別人。他表達意見時的友好和幽默是他贏得所有人尊重和喜歡的秘密。」拉爾森具備「自制力」、「對人的認知力」、「謙和和正義感」等優良素質，「有這樣優秀的管理人才，誰說世界不能被征服。」<sup>1</sup>此書撰成於 1929 年，此時拉爾森已在蒙古地方生活了 35 年。他沒受過系統的教育，更不是文人或學者，也不擅長著書立說。其書既不像書名所標示

<sup>1</sup> [瑞典]斯文·赫定著，王鳴野譯《從紫禁城到樓蘭》（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9 年 11 月），第 30—31 頁。

的那樣，是純粹的個人回憶錄，亦非詳細的經歷日誌或嚴謹的學術著作，拉爾森更多是在講述他所感知的蒙古社會和遊牧文化，以及外人在蒙古的活動，而將自己的一些經歷穿雜其中。無怪乎此書的篇章設置獨特，敘述間經常對時間、地點、人物等交待得不夠清晰，以致不易查證。例如：他最初學習蒙古語的鄂爾多斯某王府是哪個旗的？（我推測是達拉特旗）他曾參加過的七旗那達慕是哪七旗舉辦的？他寫書時待過的蘇尼特旗是左旗還是右旗？（我認為是左旗）都令閱者無從明瞭。

當我披閱張建軍先生的《蒙古公爵拉爾森》譯稿時，深深地感受到著者對大自然的敬畏和尊重，對蒙古高原和遊牧生活的熱愛。那些對蒙古社會和蒙古人生活的講述，如貴族和平民、喇嘛教和活佛，如婚姻、狩獵、集會和賽馬等，細膩而繪聲繪色，令人有親臨其境之感。難怪 1939 年該書日譯本出版時，譯者高山洋吉會把書名逕改為《蒙古風俗志》，並給予了相當不俗的評價。<sup>2</sup>

至於此書的可信度，也早已得到相當程度的證實。拉爾森曾被民國政府聘為顧問，參與調停中蒙關係一事，已發現有民國官方檔案和莫理循的書信記載為證。<sup>3</sup> 他與外蒙古杭達多爾濟親王的親密關係，也有著名蒙古學學者、芬蘭人蘭司鐵的著作可作旁證。<sup>4</sup> 尤其是著者頗為客觀的寫作態度，更增加了其所述的可靠性。儘管拉爾森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杭達多爾濟親王有著頗為密切的朋友關係，他仍如實記述了他們窮奢極欲的購物和揮霍。在講述蒙古民族的全民信仰喇嘛教時，他指出：「許多喇嘛過著平靜而體面的生活，然而另一些喇嘛卻生性頑劣，他們構成了這個國家的數量相當之大的一群盜賊和罪犯。他們本應像其他罪犯那樣受到審判和懲戒，但是因為環繞在他們周圍的那麼多的迷信光環，儘管劣跡斑斑，卻能帶著許多東西全身而退。」他還列舉了一位他熟悉的喇嘛欺騙蒙人和漢商的種種劣跡。

除了對蒙古風土民情的細緻描述外，此書對瞭解近代蒙古歷史亦有獨

<sup>2</sup> 拉爾森的書還有德文版（出版年代不詳）和西瑞爾蒙古文版（蒙古國烏蘭巴托，2015 年）。

<sup>3</sup> 呂秋文著《中俄外蒙交涉始末》，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 年再版本，32–33 頁引《民國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收國務院函》。

<sup>4</sup> [芬蘭] D.J. 蘭司鐵著，泰米爾譯《七次東方旅行記》（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 年 3 月）177 頁。

到的價值，拉爾森對 1913 年中華民國與外蒙古間的戰爭，以及他自己的斡旋努力的敘述，即是典型例證。其中關於外蒙古軍隊將領穆隆嘎之死，「那王爺」叛投民國的詳情等，或澄清民間種種誤傳，或曝露事件內幕。只不過「那王爺」一稱既無全名，又使用的是事後民國政府封授的爵位，以致長期以來人們都沒弄明白：他就是原內蒙古科爾沁左翼後旗輔國公那遜阿爾畢吉呼。而那氏這個嚴重動搖軍心，給予外蒙古當局重大打擊的變節行為，竟是拉爾森這個小人物一手造成的。

總之，拉爾森此書不僅具有獨到的史料價值，而且語言平實流暢，具有很強的可讀性，相信它會贏得讀者的喜愛。也許有人會問：「如此有價值的書，何以今天才有漢譯本？」眾所周知，翻譯出版外人著作的多寡（學科和數量）和及時與否，能看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胸懷、開放程度和學習精神。儘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這方面已有了很大的進步，但與翻譯大國、東鄰日本相比，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在現今學術界（翻譯專業除外）將翻譯書籍不算成果，甚至連工作量都不算的窘境下，我們怎能及時利用外人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又怎能使視野和思想更加開闊？有鑑於此，我要感謝張建軍先生不計名利的奉獻，他使廣大讀者能夠通過拉爾森的敘述，瞭解和感受那時的蒙古社會和蒙古文化，也為中國蒙古學研究的深入做出微小但實實在在的貢獻。

忒莫勒  
於呼和浩特學府花園清風齋  
2023 年 10 月 20 日

## ◆稿 約◆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本刊除了接受學術論文外，也接受學術譯作、書評、學術研究發展動態、學術相關科普類文章。
- 三、學術論文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出處，文長以一萬至一萬五千字為原則。並請附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 300 字以內，英文摘要 200 字以內）、關鍵字（3-5 個）、徵引書目、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寄至 [chinaborderareastudies@gmail.com](mailto:chinaborderareastudies@gmail.com)。
- 四、學術譯作來稿請依上述學術論文來稿規定辦理，但無須附徵引書目；其他稿件僅需附上作者簡介即可。
- 五、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六、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七、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八、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出版

# 中國邊政 協會

中國邊政 半年刊

名譽：劉學銚  
發行人

發行人：楊克誠

社長：劉學銚

主編：藍美華

電郵：[chinaborderareastudies@gmail.com](mailto:chinaborderareastudies@gmail.com)

發行者：中國邊政 協會

<http://acbas.org.tw>

印刷者：信強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